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全国文明城市

东夷文化发祥地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中国市场名城

中国地热城

中国书法名城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

图例

	市、镇、乡
	县(市、区)政府
	乡、镇(街道办事处)
	铁路
	高速公路及国道
	省道、县道
	运河、河流
	行政区划界
	市、镇、乡名

主 办：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秦鸿伟 刘广阔
李洪彦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王培栋 刘兆东
李凤军 刘耀华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钱 进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伊永航 段 洪
于 芹 王卫东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贾 梦
孟玉玉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陈士渠在沂蒙 辛鸿义 04

【峥嵘岁月】

沂水歼灭战 杨明德 08

一位女战士的沂蒙情结
——追忆姚明同志 王 滨 10

口述抗战史：月庄事件 大荒堂主 15

【名人素描】

清代学者许瀚（上） 丁原基 17

李耀德烈士生平事迹考 王勇则 23

【文化掇英】

王羲之之死 刘诚龙 27

临沂出土文物之银雀山汉墓竹简 陈 辉 29

【古城旧事】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30

【诗画赏析】

王学德及其书法艺术 王庆新 36

【蒙山沂水】

“东莞”地名南迁与青、徐士族南渡（二）
李 泮 39

【史海撷萃】

颜真卿：刀光剑影度一生 王爱军 45

【探索发现】

“柞城故城”考 喜上眉梢 50

【影像沂蒙】

临沂保卫战 本 编 52

【史料辑存】

略谈临沂保卫战的某些细节 Gt1952 54

王小古年谱(上) 刘瑞轩 56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周姓(下) 赵丹峰 60

【文史论坛】

从《沂蒙革命根据地志》看沂蒙红嫂和红嫂精神
张 丽 66

【沂蒙名医】

药学校佼的个中三昧
——研读鲍玉琳 刘凤才 70

【沂蒙乡亲】

人生如山，为梦而登 高雪萍 77

【史志动态】

80

封面：银雀山汉墓竹简

(封面文物介绍见本期《银雀山汉墓竹简》)

封底：明·焦竑《花岩寺》/胡石 书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陈士榘在沂蒙

辛鸿义



陈士榘，湖北省荆门市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教导队区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排长、副连长、副营长、副大队长，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参谋处处长、参谋长，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教导营营长，第四师参谋长，红十三军参谋长、代军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晋西支队司令员，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山东滨海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兼西线兵团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兼第八兵团司令员和南京警备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兼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1995年7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陈士榘在进入山东之前，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支队支队长，率部在晋西南进行抗日。1939年，对向八路军挑衅的阎锡山部队进行反击后，转移到晋西北。1940年5月，率部长途跋涉到达鲁南，与一一五师师部会合，被任命为一一五师参谋长。1941年8月，成立以罗荣桓为书记的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陈士榘为成员之一。

1943年4月，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精神，在山东抗日根据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新的山东军区辖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等6个军区，陈士榘被任命为滨海军区司令员。这年夏季，他根据滨海区党委的决定，组织并派出20余支武工队，到各县敌占区和铁路沿线进行秘密活动，反特锄奸，争取并改造伪政权人员，支持群众反抢粮、反抓丁、反苛捐杂税等。武工队被誉为军区的“怀中利剑，袖中匕首”。

11月，与政委符竹庭指挥军区主力发起赣榆战役，相继攻克赣榆城及附近的兴庄、海头等11处敌人据点。俘虏伪和平建国军三十六师七十一旅旅长李亚藩及伪军1200人，粉碎了敌人对滨海沿海地区的“扫荡”和“蚕食”计划，受到山东军区的通令嘉奖。1944年，乘临近春节之际，陈士榘于1月率部拔除了莒（县）日（照）之间公路上的伪军据点石沟崖，活捉日照伪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朱信斋。11月，在山东军区的部署下，由他和滨海军区政委唐亮统一指挥，胜利收复莒县县城，恢复和扩大了滨海抗日根据地。此后不久，又争取诸城伪保安大队大队长张希贤率部1300人反正。

1945年8月，山东军区遵照中央指示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举行大反攻，将一线部队编成8个师、12个警备旅及滨海、海军支队。15日，又部署5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铁路沿线进军。陈士榘和唐亮分别任第二路的前线指挥和政治委员。他们带领部队北克胶县，切断胶济线东段；南占莒县、日照、赣榆，切断陇海路东段，逼近海州、连云港。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代表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美国代表罗伯逊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陈士榘被调任中共代表团整军处处长，后任参谋长。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10月初，叶剑英通知陈士榘：“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要你回华东，协助陈毅指挥作战。”陈士榘乃重返临沂，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总部报到。他被任命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

10月中旬，陈士榘到达华东前线。此时内战已经进行了3个多月。他抓紧时间阅读了中央军委对华东战场的各项指示，新四军和山东军区、华中军区以及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的一些作战文书，各部队关于作战情况的报告，对华东局势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当时正值宿北战役前夕，国民党军为配合伪“国民大会”的召开，拟定一个“结束苏北战事”的军事计划，集中25个半旅，预定于12月13日分4路同时向苏北、鲁南解放区进犯。

12月12日，陈毅召集粟裕、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陈士榘在郯城县马头镇附近的山东野战军司令部，开会研究应对之策。会前，命陈士榘先拟定一个方案。陈士榘认为，此次进犯解放区的4路国民党军，正面宽达600多里，间隙大，相互间应援不便，难以协同。他建议：集中兵力先打敌军一路；作战时要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依靠群众，保障供应；而最重要的是应做到首战必胜。会议同意陈士榘的一些见解，但对他提出的先打鲁南敌军，改为先打由向沭阳和新安镇（今新沂市）进攻的国民党整编第十一师、第六十九师。方案确定之后，便分工组织指挥。陈士榘和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唐亮率领部分部队绕道敌后由西向东打，与粟裕、谭震林指挥



1940年陈士榘、陈光、彭畏三、罗荣桓在沂蒙根据地

的从正面攻击的部队，对敌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意见经上报中央军委批准后，12月15日，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联合发起宿北战役，19日胜利结束。敌整编第六十九师三个半旅及工兵第五团等部2.1万人，全部为解放军歼灭。在宿北战役中，陈士榘不仅参与了筹谋，还分工亲临前线参加了指挥。

宿北战役之后，中央军委电示：“宿北战役结束以后的第二步作战，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庄、峄县、台儿庄，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然而华东部队领导人对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却出现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先歼灭鲁南之敌，并且认为目前是最佳的时机；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宿北战役之后，山东、华中野战军，立即渡运河西进，恢复淮北局面，逼近津浦铁路和徐州，迫使鲁南和两淮的敌军后撤回援。面对两种不同意见，陈士榘认为，只有先打鲁南之敌，才有益无害，乃于22日和唐亮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华东军队领导人主张的不同作战方案及其利弊。电文建议：按原计划集中山东野战军主力回援鲁南，以击溃鲁南之敌，稳定郯、马战局，再配合华中野战军歼灭华中之敌。12月24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先发动鲁南战役，并要求“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此事反映了陈士榘和唐亮发给军委的电报起到了作用。

鲁南战役第一阶段，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右纵队由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向明、鲁南军区政委傅秋涛、副司令员郭化若统一指挥。左纵队归野战军总部直接指挥，陈士榘参加了实际指挥。第二阶段，陈士榘又参加了攻打峄县的指挥。从1947年1月2日至20日的鲁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第五十一师及第一快速纵队5.3万人。缴获坦克24辆、汽车470辆、各种火炮200余门。

194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华东部队进行整编。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番号撤销，成立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和中共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陈毅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担任前线委员会书记；饶漱石任军区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区副司令员，黎玉任军区副政委，陈士榘任军区参谋长兼

野战军参谋长。粟裕、谭震林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的副司令员和副政委。1月下旬，陈士榘受陈毅等领导人的指示，与唐亮共同研究、制定出华东野战军的编组方案。经领导人审定后报中央军委批准，由陈士榘在“鲁南会议”上作了传达。按照方案，华东野战军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共9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步兵纵队按三三制编制，辖师、团、营等建制单位。通过整编，部队统一了组织、制度，调整充实了基层单位，补充了兵员，进一步加强了组织指挥的集中统一，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47年莱芜战役，华东野战军决定留第二、第三纵队，由陈士榘指挥，伪装全军模样，在临沂以南，节节阻击由国民党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的8个整编师对临沂的3路进攻。主力则隐蔽北上，歼击由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的北路敌军。2月15日，南线解放军主动撤出临沂城。陈士榘则奉命于18日赶赴北线，参加对李仙洲集团的围歼战和胶济路的追击战。

孟良崮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重新编组进攻兵团，将主力9个整编师共25个旅，调集到莱芜至蒙阴一线，摆成方阵，于6月25日，再次向鲁中山区发动进攻。华东野战军领导人鉴于蒋军兵力集中，一时难以分割，乃于6月29日，分兵3路：由陈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鲁西挺进；叶飞、陶勇率第一、第四纵队向鲁南挺进；华野指挥部率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在沂水东里店一带对付进犯鲁中山区之敌。

分兵之后，陈士榘、唐亮率部队向津浦路的万德、大汶口实施猛烈攻击，守敌大部逃窜。13日，又渡过汶河，向宁阳、曲阜前进。同时，叶飞、陶勇率领的第一、第四纵队，歼灭费县守敌后，又收复峰县、枣庄，逼近津浦路。由于陈士榘、唐亮和叶飞、陶勇指挥的5个纵队的凌厉进攻，严重威胁蒋军的后方基地兖州、徐州等地，迫使鲁中的敌人在占领沂水、东里店之后，停止向东进犯，于13日开始，调7个整编师回兵西援，企图配合其后方各点守敌，夹击转入反攻的华野五个纵队。留在鲁中山区的敌军只剩下4个整编师。蒋军采取的“重点进攻”企图在鲁中山区击破华野主力的打算遂告破产。

8月6日，华野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由陈毅、粟裕率指挥机关、第六纵队、特种兵纵队，由鲁中山区转赴鲁西南，统一指挥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特种兵纵队，以及配合华野作战的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统称西兵团，实行外线作战。为了加快9月对敌出击，粟裕经过反复思考，拟定了两个作战计划。陈毅认为此仗关系重大，应力求全胜，要他先向陈士榘、唐亮征求意见。足见陈毅对陈士榘、唐亮的倚重。9月5日，西兵团集结于沙土集南北地区，完成了第二方案拟定的战役布局。9月7日，乘守敌国民党整编第五十七师北犯、与敌第五军拉开40里距离之机，华野部队将其合围，经一日两夜战斗，将五十七师全部歼灭。沙土集之战后，陈士榘即率军进入豫皖苏区作战，从此离开沂蒙山区。

陈士榘在沂蒙地区参与筹谋与指挥的几次战役影响很大。1973年春，他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有一次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亲切而风趣地对他说：“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华东战场上的几个大仗，打得不错。”陈士榘对沂蒙大地有着很深的感情。1986年秋，他已届77岁高龄，仍在身边人员陪同下，从北京到日照，视察了他长期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很多村庄的名字仍能清晰的记忆。

沂水歼灭战

杨明德

1944年的初秋，天高气爽，沂蒙山区东北部的沂水城外的田野里，高粱泛红，玉米干缨，大豆叶儿逐渐变黄……到处是丰收的景象。龟缩在沂水城内的1000多日伪军，每到夏秋收获时节，就要出城“扫荡”，抢粮抓人、残害百姓。

正当老百姓准备收拾庄稼的时候，鲁中军区作出了攻打沂水县城的决定。八月上旬，参战的一团、四团、一分区独立团等共约2000人，陆续集结到离县城50里外的鲁家庄一带，迅速投入了战前各项准备。战士们在进行紧张的战前练兵，首长们在精心研究作战方案，司、政、后机关都在进行紧张的准备和部署。大街小巷，大院小院，里里外外都闪现着八路军战士们忙碌的身影。乡亲们听说部队又要打仗，纷纷报名参加支前。我当时任四团后勤处军需股股长，负责作战器材保障工作。那时，我们没有大炮，攻坚主要靠自制炸药包搞爆破，因此，战前要捆扎大批各种规格的炸药包。为保证部队的需要，我和几个战士常常是几天几夜连着干，有的眼睛熬红了，有的被火药熏得晕了过去，大部分都被呛得恶心呕吐，吃不下饭，但没有一个人叫苦。

八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部队早早吃了晚饭，便开始向县城接近。当晚九点左右，按上级作战计划，部队主力部署在沂水城的东、西、北三个关口，小部分在南城墙外防止敌人越墙逃窜。作战部队的任务区分是：一团负责攻城和扫除伪军驻守的外围据点；四团负责攻打城内日军据点；其他负责阻击和歼灭增援之敌。这时，敌人已经发现了我军的行动，胡乱地从碉堡里往外打枪给自己壮胆。

猛然间，只听“刷”的一声，一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攻城战斗打响了！顿时，枪炮声像骤起的狂风，一阵紧似一阵，条条火舌纵横交错，积压在战士们胸膛里的怒火，伴随着复仇的子弹向敌人老巢猛烈倾泻，不到三个小时的工夫，一团就将城门攻破，正在待命的四团一跃而起，与兄弟部队一齐冲入城内，与敌人短兵相接。这时，一团的任務主要是消灭城内残存伪军，四团则直奔城西南角的日军据点。

当夜11时许，城内外伪军全部被歼、被俘或缴枪投降，只剩下城内日军缩进据点，负隅顽抗。此时，我军主力紧紧围住日军据点，与敌展开激战，战斗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拂晓。军区司令部传达首长指示：一、紧紧围住碉堡，不许放走一个敌人。二、消灭马站、临朐等地的增援敌人。

上午八点左右，敌人派出飞机掩护日军，企图赢取时间，以加强增援挽回失败。由于我军没有高射武器，大部队只能暂时隐蔽，小部分人员继续以火力压制敌人。中午12时前后，城东四十里堡和城北马站守敌相继增援，均被兄弟部队打退。

到了黄昏，我们的机枪又吼了起来，在机枪掩护下，一名战士挟着炸药包冲了



鲁中八路军进行攻城训练

上去，可是倒在了敌人的枪弹之下。第二名爆破手随即跳出掩体，捡起烈士手中的炸药包又向前冲去，然而又倒了下去……接连七名爆破手都未能冲上去。此时此刻，战壕里的同志们一个个急红了眼睛，纷纷要求去炸掉敌堡。第八名爆破手又冲了上去，爆破成功了！可惜只炸塌了地堡一个角，地堡里的敌人更加猖狂，依托地堡疯狂射击。见此，担任攻坚的二营刘营长要我给他一个大炸药包，正巧，四团团团长周长胜和侦察参谋戴成功赶来了，团长一见营长，劈头就说：“怎么搞的，到现在还拿不下来！不行你们就撤下去吧！”营长红了脸，没有回答，又迅速组织了爆破组，亲自带了爆破手上，不幸，敌人的掷弹筒弹片打中了营长的头部，刘营长倒在了血泊中。在场的军区和通信班战士泪流满面，使劲地摇晃着“营长！营长！营长……”刘营长静静地倒下去了，可他的两眼却仍然睁得大大的，仿佛要亲眼看到胜利的红旗在沂水城上空飘扬。

这时，营教导员张汉卫一边继续指挥着战士，一边进行政治动员，号召战士炸掉敌碉堡，全歼日本鬼子，为营长报仇。全营干部高喊着“为营长报仇”的口号，擦干眼泪，又开始了猛攻。可是，狡猾的敌人也摸到了我军的规律：机枪齐射，必有人送炸药包，因此，每逢我机枪齐鸣，敌人就拼命地将安上火帽的八二迫击炮弹往下扔，使爆破手无法靠近。怎么办？将计就计！团长决定：再攻击时，机枪停止射击，爆破手趁黑摸上去！这一招果然有效，爆破手借着微弱的火光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机敏地躲过敌人的火力，很快就冲了上去，敌人只注意我军火力，却不知20余公斤的炸药包已经卡在碉堡的墙上了，此刻爆破手安全返回，炸药包上的导火索“哧哧”地冒着火光，似乎在告诉战士们，敌人就要完蛋了！

“嘀嗒——嘀嗒——”警惕号轻轻地响了，隐蔽在碉堡周围的同志们几乎同时习惯地张开了嘴巴，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等待着惊心动魄的瞬间。

这一刻到了，只见火光一闪，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敌碉堡被掀翻了。顿时，敌人鬼哭狼嚎，沂水城之战在这一声巨响后宣告结束，我们除俘虏敌伪军400余名外，其余日军全部被歼。

天渐渐亮了，朝霞染红了东方，那是烈士的热血，是鲜艳的红旗！

（作者杨明德，文中身份为鲁中军区第四团后勤处军需股长。）

一位女战士的沂蒙情结

——追忆姚明同志

王 滨

去年八月中旬，正值盛夏，我想去北京看望姚明同志，惦记着她的哮喘病。按惯例到京后先住下，再电话联系去见她。一般是保姆接电话，这次是她的长女沙红叶接的电话，红叶低沉的声音说，我妈妈去世了，后事已经办完，我马上坐飞机回加拿大，你就不要来我家啦。回忆在2012年5月中旬，姚明应邀参加临沂电视台和市孝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的临沂十孝星颁奖活动，并热情洋溢为大会致辞。姚明离开临沂时，我们全家欢送，姚老抱着我4岁的孙女王帅丹亲切地说，下一次我来，一定送你一件花衣服……没想到姚明这一走就永远回不来了。

姚明的革命生涯主要是在沂蒙抗日根据地度过的。1943年春，她还是一位19岁的高中女生，卖掉了上学骑着的自行车做路费，悄悄地背着家庭，几经周折，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穿过敌人封锁线，蹚过沐河，来到沂蒙抗日根据地。1948年8月，她作为《大众日报》战地记者，参加解放济南战役之后，又随军南下，上海解放后，在《解放日报》工作5年，又回山东，在《青岛日报》、《青岛工人报》工作。姚明常说，沂蒙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一起战斗、生活的父老乡亲农民战友。



姚明（右二）同志
拜访古城村当年一
起战斗工作的民兵
和儿童团长

上世纪80年代，姚明离休后创办了《老人天地》杂志（今《新天地》），我市老领导刘兴武被聘为编委，王滨、宋尚勤作为临沂工作站站长，多次参加《老人天地》在人民大会堂每年十月份举办的敬老座谈会，使我们有机会和姚明在工作上有了接触。

2012年5月，姚明最后的一次沂蒙之行，市委老领导刘兴武委托市华夏文化促进会会长宋尚勤同志接待，后又与沂蒙新红嫂朱呈镕同志相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94岁高龄的抗大老战士、沙洪生前战友王任之在住所亲切会面，促膝谈心，长达三小时之久并合影留念。王老还要我陪姚明去板泉党支部旧址和大店山东省政府旧址、一一五师师部旧址去参观访问。那次姚明走访了艾山古城村及附近的几个村庄，见到了健在的已80多岁的十几位当年基干民兵、儿童团员和烈士妇救会长周大嫂的女儿等，并给他们每人100元钱和食品。古城村是姚带领农民闹翻身，搞土改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村庄里，姚明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7年5月，登门拜访姚明时，她送我刚出版的处女作《路》，书中记述了作者从青年学生直到离休退居二线的漫长时间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作品洋溢着姚老的革命激情，体现着高尚的情操，书中也表达着姚明这位女战士的沂蒙情结。

当年诞生在沂南县东高庄村那首著名经典革命历史歌曲《跟着共产党走》（又名《你是灯塔》）的词作者沙洪，是姚明同志的丈夫，从姚明的青年学生时代，直到90岁高龄离开这个世界，在这漫长的征程中，人生的道路，有时几十年平平淡淡，有时只有几天却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成为一生道路的亮点。

追忆姚明同志光辉一生的几个亮点，以志思念。

1、踏上革命路

姚明如果真要走，父母是不会放过的。还是采取了“偷走”的办法。在学校里递了请假条，对家长说是在学校上学，把骑着上学的自行车卖了当盘缠，与几个同学一起偷偷离开济南奔向解放区。那是1943年的春天，泉城济南黑云压顶，年仅19岁的高中女学生姚明，偷偷离开学校离开家乡，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奔向一心向往的解放区。这是姚明生平第一次乘上去高密的火车，冒雨辗转来到离莒县城12里、坐落在沭河岸边的于家庄，河那边就是解放区。经介绍他们认识了八路军地下交通员、该村村长于邹平。在村长家里吃了一顿热乎乎的庄户饭，于邹平敦促大家说：“咱们快走吧，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天已完全黑了下來，在村子北头，穿过密林和大片芦苇荡，在这里敌占区与解放区两位交通员接头，小心的从敌人的炮楼旁边通过。在沭河岸边，向东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滩，五月天气，河水还是很凉，大家渡过一个浅水区，差不多半个身子泡在水里。渡过沭河，就是解放区，从此，姚明同志踏上了革命的路。

2、囚室悄悄开放了一朵玫瑰花

姚明一行八个同学于1943年春天来到山东解放区的滨海区农村。由于她爱好文艺和写作，被分配到大众日报社通联科。这年冬天，经历了反“扫荡”的考验，回报社不久就开始了“整风”。通联科对从敌占区出来的青年学生，好像都是审查对象，姚明因无意间问过报纸在哪里印刷，就成了特务嫌疑，后来又有人咬了她。

在莒南县南高庄村头老百姓放草、圈猪的一个空院子里，姚明被禁闭了19天。在姚明受审查期间，沙洪同志奉命听这位一肚子委屈的姚明汇报。沙洪默默地听着姚明详详细细、毫无遗漏的诉说，深深凹陷的眼睛，显示出智慧和沉思。“你要经得起冷淡”。这是沙洪说的唯一的话。沙洪的这一句话，使姚明忘记了委屈和孤单，小小囚室变得明亮和温暖。

又一天黄昏，沙洪来了，还是在昏暗的灯光下，默默地坐在地铺的另一端，等候听汇报。沉默，沉默，半晌还没有声音。突然，姚明把字条递给沙洪，这也许是这位

男青年生平第一次受到爱情的冲击，他眼睛直盯在12个字的纸条上，看了好久，好久，把纸条慢慢折叠起来，夹在笔记本里默默的离去。在那残酷的战争岁月里，在沂蒙山村低矮的囚室里，一颗失去自由的年轻人的心里，一朵玫瑰花悄悄开放了。

3、沂蒙情深

1985年5月，姚明同志应大众日报社的邀请，去开报史会并去报社诞生地及报社驻过的地方看望乡亲们。姚明等30多位当年在此战斗过的老战士，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激起对沂蒙老区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及乡亲们的无限深情。

5月7日，首先来到沂水县王庄村去访问报社创刊地。5月9日，姚明、沙洪来到莒南县东良店村大众日报编辑部原驻地。一下车，他们的房东李玉鹤、李玉苗兄弟二人已在村口等候。在房东的院子里，姚、沙二人找到他们当年结婚的“喜房”，原来是间小东屋，现在只能看见房门框的痕迹，房子已经拆掉了。他们重温“喜房”旧情。当年照顾他们的房东老大娘，老大爷已经去世，那时李玉鹤15岁、李玉苗12岁，姚明还记得两个孩子闹喜房时的情景，扒在窗户及门上看新娘，还向她要柿饼吃呢。

5月10日，在莒南县南高庄村，来访的老战士更加觉得亲切，因为报社在这里驻的时间最长。对于姚明来说，这里是她被关过“禁闭”，吃过“逼供信”苦头的地方。在这里还更有万万没想到的地方，在她走投无路、多少次想自杀的时候，却遇上了一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共产党员。姚明对沙洪，由感激到佩服，到爱慕，经过复杂的、痛苦的、幸福的“爱的历程”。在村头，在大街上，熟悉的乡亲们纷纷走向前来拥抱、拉手。当年识字班大姐李玉梅已90高龄，带着她的丈夫，把他们领到她家去。新盖的房子，粮食、花生摆满屋。她亲热地叫着姚明的名字，嘱咐明年再来。李玉梅把姚明送她的茶具摆在五屉柜上，姚明送她的照片，放在她床头上的玻璃镜框里。李玉梅说，她的名字是姚明给起的。

在街上，碰到一个高高胖胖的老大姐，怀里抱着孩子，姚明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不是你给起的吗？董玉清。我们识字班里这些人的名字，很多都是你给起的呀！”

李玉梅陪去姚明住过的房子，她还记得那院子门前，也有一条小沟。姚明后来写道：

我寻觅旧迹，寻啊寻！

旧草房变为新瓦房。

房门朝东变朝西，

猪圈不见了，

草垛不见了，

只有小河沟还在；

它在房门前，它在房门边，

小河沟是旧迹的唯一见证人。

我望着这沟，

望着这沟里的流水，

小河沟，你多么可爱，

是你解开了心底的谜，

我心底的旧迹真地在这里！

4、在古城上了群众路线教育的一课

1946年，姚明拿着大众日报社介绍信来到中共临沂县委，提出了接受严峻考验的要求。县委对这位青年知识分子的做法非常支持。就介绍她到环境最艰苦，斗争最残酷的艾山区工作。开始在东墦大地主的老窝点，后来区委决定在艾山区靠近城前的古城搞一“点”，区里没人去，姚明主动要求只身一人去这里开展工作。

姚明在这里工作，是给她上了群众路线教育生动的一课，学会了爱群众之所爱，憎群众之所憎，与群众建立了血肉般的关系。姚明在报社就提出入党的申请，在“土改”运动中，

姚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姚明深刻体会到，这段经历不仅是路线教育的生动一课，也为她以后几十年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古城联防区，包括北桥、东墩及古城等十多个村庄。按照1946年党中央的“五四”指示，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了解这里的地主阶级剥削和贫苦农民受压迫的情况。在古城，她扎根串连了李光旭、李光仁兄弟俩，他们是苦大仇深的农民。开始动员搞土改，闹翻身，他们都有顾虑，当姚明向他们讲清了“谁养活谁”的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之后，他们就敢于起来闹革命了，经过培养教育和锻炼，李光旭兄弟俩那种威武不屈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令人佩服，同时也深深地感动着姚明。10月份，经县委批准，姚明、李光旭、李光仁先后入党。

1947年3月，王洪九疯狂反扑，夜间枪声四起，这里就处在前线。姚明肩背马枪、手提手枪，与李光旭、李光仁和民兵一起，日夜巡逻保卫乡亲们，保卫胜利果实。残酷的环境使他们结成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

1947年5月，姚明调回大众日报社工作，当时报社转移至胶东。1985年5月，姚明终于又回到沂蒙老区。访问曾经与她风雨同舟的老战友。几十年过去了，李光旭和他的一家一直深深地印在姚明的心理，万万没想到这次旧地重游，得知李光旭已在1947年壮烈牺牲。同时，姚明还得知，妇救会长周大嫂被王洪九还乡团抓走后，狼狈逃窜的匪徒们把她与其他乡亲们，一起在郯城活埋。姚明哭了，哀痛、思念涌上心头。在笔者的陪同下，姚老还几次来古城看望周大嫂的女儿和当年民兵、儿童团员们，送给他们零花钱、衣服和礼品，村里乡亲们都夸姚明好，没有忘记当年的众乡亲。

5、在济南解放的日子里

姚明的街坊四邻欢呼相告：“快来看，姚家大姑娘回来了！”人们纷纷从自己的床底下，桌子底下爬出来，涌进了姚家院子，很快把姚家西小屋挤得满满的，连院子里也站满了人。姚明父母含着惊喜泪水，脸上堆着笑容，与邻里共享这幸福时刻。

那是1948年8月，上级要报社抽一部分人员去参加解放济南，姚明因怀孕在身，领导不让她去，姚明边哭边申辩她去济南工作的很多有利条件，终于得到批准。我军在前边与国民党绥靖区司令王耀武部队激战，等着接管的部队紧跟在后边。敌人在街道两边的屋顶上扔了燃烧弹，火光四处可见。美蒋飞机不断狂轰乱炸，低空扫射，敌人在垂死挣扎。这是关键的一天，这是翻天覆地的一天。仅仅一天之隔，这里天也变了，地也变了。姚明父亲接过群众送来的“军属光荣匾”，在掌声、欢笑声中，二老父母胸前戴上了“大红花”。人们分享着解放带来的喜悦。

6、一床梅花被面的故事

那是淮海战役胜利之后，我军南下渡过长江之前。姚明、隋逸群同志由济南出发，南下至江苏丹阳陈毅处集中，准备解放上海后参加接管工作。队伍途经徐州，组织上给姚明两天假，让姚明、沙洪夫妻团聚一下。沙洪是淮海战役随军南下打徐州，解放后留在那里主办《新徐日报》。

说起梅花被面，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那是我军解放济南后，姚明在家生孩子时她母亲送给姚明的。

那天晚饭后，沙洪带姚明到街上散步，散步中说说去，就是姚明的去留问题，沙洪动员姚明留在徐州，说这里人手少，只要打一纸报告，姚明就能留下来。可是在姚明的心目中，南下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这是神圣使命，虽然留下来，能夫妻团聚，可是姚明仍然执意要走。第二天一早，沙洪上班了，姚明把唯一的行李——梅花被故意晒在编辑部的大院里。沙洪以为被子在，人也还在，哪里知道姚明已经奔驰在征程上呢！姚明到丹阳，立即投身繁忙的集训之中。组织上给徐州拍了电报：“姚明已安抵丹阳，速把她的被包捎来。”后来姚明才知道，梅花被一直晒到太阳落山。晚饭时沙洪等姚明吃饭，就是不见踪影。刚刚解

放的徐州，社会秩序还比较混乱。报社只得向公安局报告。第二天又在报纸上登出了“寻人启事”，直到收到丹阳电报，才揭开了这个“谜”。不久，徐州市委书记周林同志因事去丹阳，才把这条梅花被捐给了姚明。

姚明带着这床梅花被，在解放上海的当天，进入了这座东方大城市，在解放日报社里，做了一名新闻战士。

在上海的日日夜夜，每当看到梅花被的时候，总还不免想起在徐州的沙洪，总要写信向他叙说衷情，可是沙洪没有回音。终于有一天，接到他的复信，内容是四行诗句：

彭城自古多英雄，唱罢垓下歌大风；

前言万语留不住，只恨今朝未同行。

姚明不禁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沙洪终于原谅了她。

7、晚年创办《老人天地》

姚明同志曾不止一次对笔者说，她离休以后最自豪的是，于1983年成功创办了《老人天地》杂志。姚明辛勤耕耘《老人天地》21年，她说，那时正值中央颁布离退休干部政策实施，许多戎马一生的老干部们一下子退离岗位都有点不适应，大家商量，决定创办一份以老人为对象的杂志。这年夏天，她邀请了社会名流赵朴初、周而复、荣高棠、张友渔、曾三、廖沫沙等，讨论这个杂志的名字、办刊宗旨、服务对象等，最后定名为《老人天地》，并请陈云同志题名。艰难困苦，白手起家办杂志，四五个人挤在八米大一间地下编辑部，不要工资，午饭自备。一些费用靠社会支援，靠自己从家里拿。办刊靠的是群策群力，靠的是老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也靠全体工作人员为老同志服务的一份热情与真诚。刊物不仅站住脚，也在不断提高质量，受到社会尤其是老年读者的认可与赞许。杂志发行海内外，最多达到月发行量十几万册，社会知名度也很高。

姚明常常说，我只要活着一天，就要有一天的价值。离休以后的路还很长，这长长的路，要靠我们这些同龄人自己去开拓，去寻求。

从抗战中期到解放战争跟随大军南下，姚明同志是在山东解放区的滨海区和沂蒙山根据地锻炼成长起来的坚强女战士，长期在《大众日报》《青岛日报》和《解放日报》等党的新闻单位工作，1947年她奉命到临沂市艾山区古城村一带搞土改和对敌斗争，与沂蒙老乡结下了浓浓的军民鱼水情，沂蒙人民怀念他，姚明同志给人们留下可亲可敬的美好记忆。

口述抗战史：月庄事件

大荒堂主

沂蒙抗战的壮烈不在于血海横流，而在于大义凛然。许多原生态的资料更使人感动。

马培卿（时任苍马抗协办事处主任，1979年10月16日回忆）

月庄事件，发生在1940年八九月间，8月白涛（即刘白涛，中共苍马办事处书记）去（苍马）办事处，调整人员，充实科长。敌要活捉白（涛）马（培卿），曹庄边沿地区紧张，临沂伪政府建了特别区，任命陈自修为大队长、区长，玉皇庙被占，安了大队。

（国民党）许兰笙力量有发展，在大哨设据点，1940年春许曾假投降。这年的8月中旬邀请我去检阅他的自卫团，写上欢迎标语，我带钟伯荣去大哨的，咱们的情报太差，没察觉其阴谋，到大哨南门，见没有动静，气氛不对，门关着，我叫钟把队伍埋伏在南门外路沟。我与钟到南门，门锁着。上边喊：“哪部分？”答：“动委会首长。”“马主任来了。”据点里开枪打死我们一人。我怕许从文家埠抄后路，我们撤到曹庄。白涛从朱崔到曹庄，研究后决定不回月庄，到朱崔住王子佩、王南昌家，晚十点月庄响枪，沭河水很大，次日我和白涛赶回月庄。怀疑月庄事件有内奸，秘书科长吴汉柏，警卫连与敌有勾结，警卫连两个排被副连长拉走十七条枪。赵汉生说吴汉柏听枪响跑到村西北角，与敌联系。袭击月庄当时怀疑是（东北军）五十七军，其实不是，是朱果、店头、八里巷的吴硕三等土顽。双方巷战，我们损失了两匹马，十几支破枪，没有被逮去干部。

王大昌（时任苍马办事处游击大队副大队长，1979年10月10日回忆）

1940年7月白涛来办事处，我父亲（王卓人，苍马办事处主任）去行署任第三科长。办事处开始没有供给，吃饭靠我从家里拿。要我任大队长，白涛来，我干了一两个月后，我调鲁南专署三分会（高赞非处）动委会工作。

我任副大队长时，（八路军）东进支队住巡会，苍马办事处住月庄，有两个连。汉奸向曹庄进攻，白涛调两个队去曹庄和汉奸打仗，沭河发大水，水涨潮平。五十七军去月庄打了我们的办事处，在月庄小圩子外打了一通，没进小圩子。白涛在河西过不来，有人向南过小河，淹死几个人，这就是月庄事件，时间在1940年七八月间，后办事处拉到了西顶子。

五十七军驻八里巷，名义以国民党县政府（郯东北办事处主任吴硕三）打的，我大队的马被抢了去。

月庄事件出了个大案子，案子其实是假的。办事处发展起来设科，吴汉柏当秘书科长，后传袭击前他家来人，袭击时他跑到树林里去了。与民政科长侯

其民一起被认为是“汪派”逮了。地委书记杨涤生处理的。

后鲁南专署发现有间题，调案去鲁南专署处理，事情弄清楚了，半押半不押，要放了。两人年纪很大，写字画画的。在这过程中，鬼子大扫荡。我机关不敢活动，夜间转移，有天晚上，他俩走不动了，已是五六十的人了，说：“我走不动了，你把我枪毙算了。”鲁南区党委开了很长时间的会，两种意见，争论不休，后两人下落不明。据说在滕县一个山上被用石头砸死了。

侯其民与我父亲（王卓人）是仁兄弟，侯出事后，我父亲不愿再在行署干科长。

吴友三（时任苍马办事处乡长，1979年10月17日回忆）

成立苍马办事处，请出徐金六。吴汉柏是四县边沿封建（帮会）头子，任秘书。

不知从哪里传出，吴汉柏、侯其民是汪派，办事处驻南古（临沭），我去一看，被逮了，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开会中间，刘白涛把我叫到旁边问：“怎么回事？”

吴汉柏、侯其民等人的汪派问题，应找王世超（时任苍马办事处副主任）、刘白涛、杨涤生解决。吴汉柏杀了两个大地主——王立堂、陈立俄，王立堂是王世超的亲叔。吴汉柏任秘书时被陈冠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逮去，是王世超的舅李伯昆出卖的。吴汉柏脱身后，逮了李伯昆，下午就枪毙了。侯其民和王世超也是亲戚，因人命，两家打了多年的官司。

王世超，新中国成立后为副省级干部。

白涛后称刘白涛，解放后与杨涤生均为国家政府副部长。

吴汉柏、王卓人、侯其仁为当地知名士绅，尤其吴汉柏（东八里巷）是临沭数得着的大地主，他们毁家纾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靠名望建立起鲁东南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郯东北办事处（苍马办事处）。一一五师挺近滨海，如鱼得水，他们是真正的水。

临沭县志记载：1940年11月，苍马办事处在南古庄召开士绅名流大会，鲁南三地委书记杨涤生参加大会并作了报告。会上以通敌罪逮捕了苍马办事处工作人员吴汉柏、侯其民等8人。后吴、侯2人被处死，其余6人释放。这就是有名的临沭“月庄事件”的后果。1985年春，中共临沭县委对这个事件重新进行了调查核实，认为当时加于上述8人的罪名为不实之词，予以平反。

这个平反对吴、侯两家或许更加残酷。



沭河洪水

清代学者许瀚 (上)

[台湾]丁原基

许瀚，字印林，一字元翰。山东日照人。生于清嘉庆二年（1797），卒于同治五年（1866），年七十。

印林为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选滕县训导，冷官闲署，一生致力于学问，研究考据之学，搜辑金石碑版不遗余力，平生际遇与顾广圻、严可均略同。而所与交游者，如何绍基、龚自珍、张穆、丁晏辈，皆为笃学向进，不慕声华之士。龚自珍盛称其为人，其《己亥杂诗》云：“北方学者君第一，江左所闻君毕闻；土厚水深词气重，烦君他日定吾文。”自珍不轻许人者，可谓推挹备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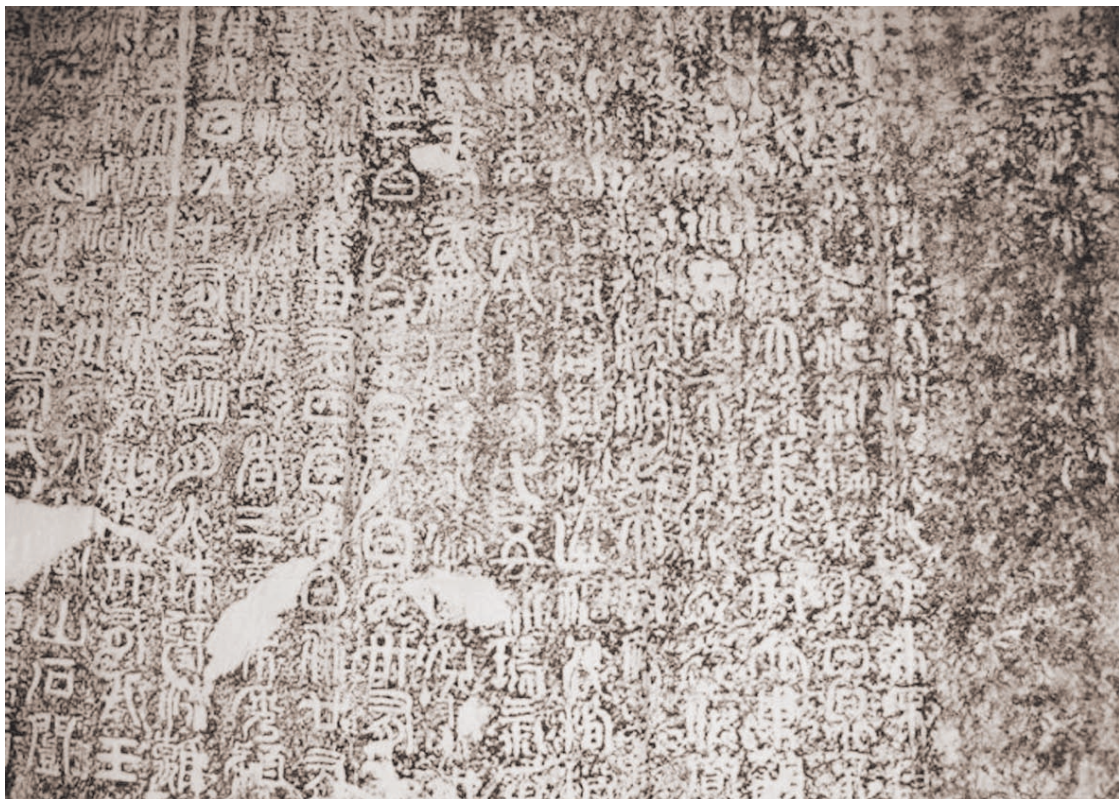
许瀚之生平事迹，以袁行云撰《许瀚年谱》最称详尽。惟《年谱》以年系事，于许氏生平事迹、著述、治学方法及交游等有关一事之始末，不易贯穿了解。今参稽袁著《年谱》及许氏著作、序跋，与友人书札及其他史料，将许瀚一生分为少承庭训，入京应考；南北校书，中式举人；讲学书院，总纂州志；清江刻书，海丰校书；病废家居，抑郁而终等五个时期，分别叙述。

少承庭训，入京应考

许瀚曾祖讳重行，太学生。祖讳贲，庠生。父讳致和，字赉堂，一字肃斋。少苦贫，嗜读，赏牧犊岩陇间，手一卷，诵书弗辍。一日，失牛，家人大恚；由是益攻苦，晏寝早起，邻人夜与作，每以书声为候。其后致和公廩於庠，因养病亲计，遂废科举，以谋馆为业，而好古劬书，毫而益勤，著《说诗循序》、《学庸总义》等。

由“少时攻苦，比于悬梁刺股”“隆冬夜读，忍饥达旦，率以为常”可知致和公之学，得自苦读，此乃实学，自非一般江湖游士，盗虚声、学无根柢者可比也。

瀚年七岁，随父致和公馆于外，时从学者日众，脩脯日丰，田亩略增，生活稍见安乐。未几，母成氏病逝，伯叔析箸；后两年，其父续娶孙氏，生弟许湏、许浚、许濂、许灏，食指浩繁，家贫复如昔。



许瀚藏三国
《封禅国山碑》

许瀚年十七，娶妻苏氏；同年入县学。次年生逢吉。嘉庆二十年（1815），瀚年十九，补州学生员，以专精许郑，受知于学政王引之。仍随侍父身边，亲聆教诲。日照距济南八百里，致和公尝挈瀚应举，徒步往返，攀崖扞葛，扶路诵说，见者以为异人。据《家祭文》云：“不孝廿五，吾父仍挈之舌耕，或劝使别就馆。父云恐不孝放佚自便也。又以吾祖老病，可更翻归省也。实则不孝幼失恃，如慈母之保抱携持，不忍遽去诸怀耳。”鲁一同《许肃斋先生八十寿叙》云：“数十年来海内谈者恻然知有山左许氏瀚之学，而不知其得力于家庭之际盖如此。”

道光五年（1825），瀚年二十九，时何凌汉为山东学政，奇印林诗古文，选拔为贡生。同年进京，住何凌汉寓邸，与绍基、绍业兄弟朝夕过从。次年为国子监生员，六月，应朝考，落第。七年（1827），李璋煜邀校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同时合校者有王筠、许木连、袁练、陈宗彝等。七月，王引之任武英殿总裁，奉命修《康熙字典》，许瀚考充校录。

《家祭文》云：“不孝瀚得选拔，朝考报罢，仍留京师，冀得一官，可资禄养。越岁考充校录，吾父志以诗，谓禄养之将逮也。”

自道光八年（1828）在武英殿校录《康熙字典》，历经四年，至十一年（1831）《字典》修成。因学养湛深，工作勤奋，叙得六品“州同”衔。父致和公得赠修职郎；母成氏、孙氏得赠孺人。

许瀚在京期间，尝谒师门，受业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复与王筠、苗夔、汪喜孙、龚自珍、张穆、俞正燮、吴式芬、刘喜海、丁晏等皆相友善，师友濡渐，讲求朴学，公卿间多有知者。俸资虽薄，仍广收四部要籍；屡观叶志诜、徐松、刘喜海、李璋煜、许木连、吴式芬等人金石藏器，眼界益阔。与张穆为俞正燮排次《癸巳类稿》，在学界已有声望。张际亮《许庶堂六十寿序》云：“山东为圣人之乡，自孔子后至今二千年，士之行谊文学不衰。余在京师四年，见其来游于此者，多质直而秀良，日照许君其尤也。君与余为拔贡同年生，校录武英殿，公卿间多有知者。余久交君，每自顾不及远甚。《寿序》乃道光九年（1829）为许瀚父致和公而撰，所言正是校录于武英殿之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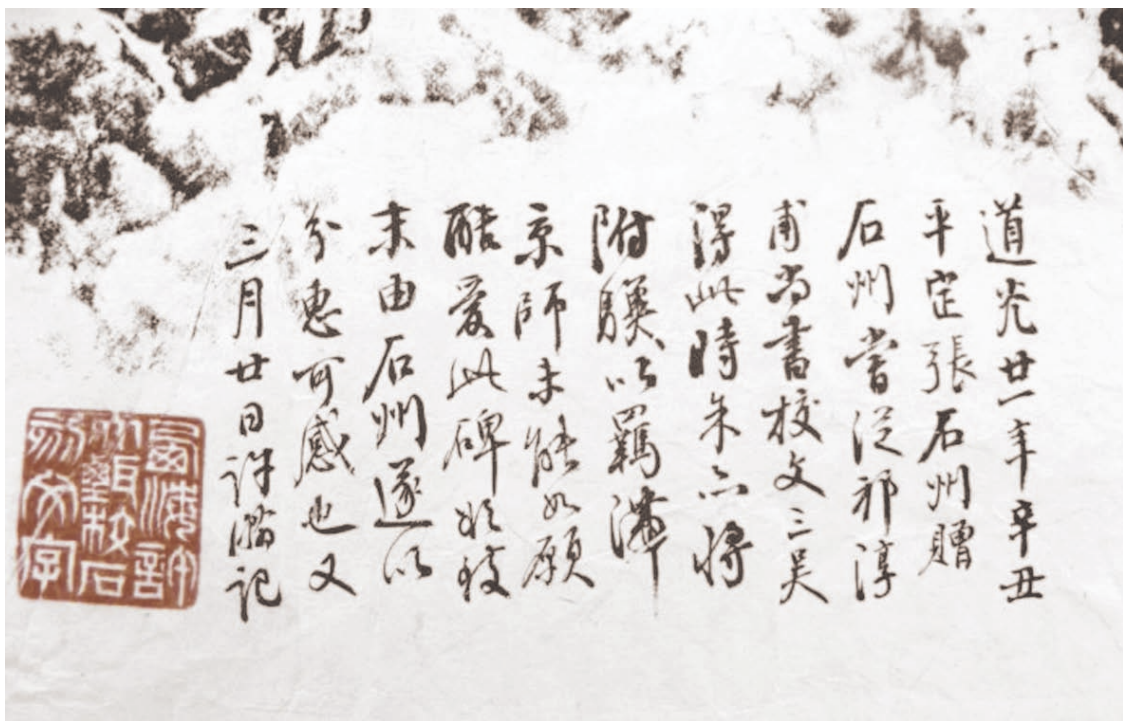
南北校书，中式举人

道光十一年（1832），何凌汉出任浙江学政。十二月，许瀚应师命赴浙，在杭州学署校文，校影宋本《说文解字》（三十卷）、抄校《说文校本》、《五音韵校本》，助严可均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文》等。十三年（1834）正月，何凌汉奉调回京为吏部右侍郎，仍从新任学政陈用光校文。

居杭数年，似为许瀚平生最惬意之时。学署面对吴山，西邻西湖，富湖山盛景。瀚与西湖净慈寺主持六舟上人达受往来结为至交。居使院定香亭侧，定香亭位杭州学使署西园，园有荷池，池中小亭翼然，阮元以“风定池莲自在香”意，名之曰“定香亭”。许瀚辨毛诗名物“莎鸡”，云：“瀚向在杭州学使署定香亭畔，竹树丛密，此物最多。夏夜竞鸣，执烛捉验，一一如邱言。”时同在学署者，除何绍基、绍业兄弟，尚有沈垚、吴廷康、戴熙、俞正燮、苗夔等。何绍基诗云：“家尊视之浙学，特甄朴学士。沈子究地舆，王郎辨族氏。联翩来上国，文誉日腾起。小子获切磋，幸免相夷鄙。俞叟老未衰，精熟文选理。苗翁穷六书，形声发微指。酒光烛影方熊熊，论议飘发开我蒙。忽然四座寂无语，天倪道味相冲融。纸窗夜半明华月，开门飞满一天雪。”可以想见好友欢聚，各抒所长，意气风发之景。

校艺之暇，与何绍基购访秘铸，搜拓石墨，每有所获，互相矜赏。如何绍基跋《影宋本说文解字》，云：“余尝与印林兄言，安得未经李、徐手之《说文》而读之乎？是诚诞想也。孙刻远胜毛刻，行款悉仍之。余读叶石君钞本，因合毛本以校孙本，又恨不即相见周漪堂所藏宋本，毛变为大字耳，而异同甚多。毛本经斧季劊改，又非其旧。道光壬辰（1832）何子贞得毛氏未劊本于武林，携如京师，校其异同，于孙本甚备。又得龚定庵所藏明叶氏抄本覆校贞行复入都，其假叶氏本而卒业焉。他日聚首，瀚将补录于斯。清明之夕许瀚印林识。”知许瀚与何绍基共砚西湖，晨夕欣对，非作放浪形骸之游者可比。

浙江自明清以来为东南文物荟萃所在，公私藏书丰富。杭州有文澜阁，宁波有范氏天一阁。许瀚随学政何凌汉得登文澜阁观《四库全书》，自有其便利处。如能亲登范氏天一阁阅书，实为学者私心倾慕之举。许瀚《汉国命赵君碑拓本跋》云：“赵国令碑真本，予襄观书



许瀚《封禅国山碑》
校跋

鄞县范氏天一阁，见有数本，虽亦半就模糊，有蕴蓄于字书之中，而郁勃于楮墨之外者。”
知其宁波曾登范氏天一阁。

天一阁，位宁波月湖之西，乃明代范钦之私家藏书楼。范钦，字尧卿，一字安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历官赣、桂、闽、滇各地，喜购旧本。辞官返乡，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1561—1566）间，建藏书楼。天一阁藏书多宋元之刊本、稿本、钞本，尤以明刊本为多。其中特多明代之地方志书、政书及诗文集。因范氏族规严守《天一阁禁书公约》，“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因而外人甚难登阁观书。偶有破例者，如清初黄宗羲于康熙十二年（1673）得观其书，撰《书记》志其事。此后登阁者，仅徐乾学、万斯同、全祖望、阮元等硕学鸿儒。许瀚罹夷烜前登阁，亲览名槧孤本，当为南游校文生涯深有价值者。

道光十四年（1834）秋，许瀚自杭州返日照，所带行装，惟书贴四五大篋。应学政吴文镒之招，挈眷北上。许瀚诗云：“举家二十口，衣食肩一身。营营以终岁，冀可资米薪。三载客于越，言归才逾旬。仓惶走历下，明湖寻前因。历云不可攀，驱车燕京尘。四顾何茫茫，旧迹翻为新。感谓昔年恨，泣下沾布巾。春风赖嘘植，托荫桃源津。芳林无雍木，樗栎惭非伦。婆娑逐仙侣，所矢存吾真。风霜迈孤景，岂敢言苦辛。被服轻与暖，饮饌精且醇。十千酒一斗，列鼎羞八珍。忧来不能食，肠中四车轮。是岁风伯虐，流毒东海漭。良苗秀不实，比户空食困。常恐衡门下，饔飧艰夕晨。乐饥谅吾素，其如高堂亲。”诗中怀念浙中生活，不言而喻；而寒士为衣食糊口，奔走四方之悲，溢於言表。其中“感谓昔年恨”句，未明言其意；似指初至京师，不慎得罪某权贵，致错失功名事。

道光十五年（1835）正月，许瀚随吴氏接考大名、广平、顺德、赵州、正定、定州、通州七棚岁试。闰六月，回京岁试八旗。暇时取行篋所携《尚书》、《左传》、《论语》、《孟子》、《孝经》、《管子》、《晏子春秋》、《荀子》、《六韬》、《孙子》、《吴子》等书，紬绎本文，审定韵部，回京而与苗夔商讨之。其自述云：“时从学使校文畿辅试院，苦无书读，暇辄取行篋所携经子，如《书》，如《左氏传》，如《论语》、《孟子》、《孝经》、《管子》、《晏子春秋》、《荀子》、《六韬》、《孙吴》之属，紬绎本文，审定韵部，归而质之仙露。”即言此数月之生活。

八月，在京，由拔贡应顺天乡试，中式举人。本年乡试因“皇太后寿庆”而举行，属“恩科”，应试诸生不限籍贯，许瀚得于顺天应试，题名北闱。次年二月，应会试，落第。此为首次会试，虽落第，然因会试而南北老友聚首京师，其乐无穷。其后潘锡恩继任顺天学政，瀚应潘氏之招，往保定府、大名府等地继续校文。撰《韩诗外传校议》、《大毛公名考》、《毛鲁韩诗同出荀子同用子贡序考》、《驹骄辨》、《壹发解》、《狙獾貉貂辨》、《先生如达解》、《孟子佚文考》、《孟母仇氏考》等。

道光十七年（1837）冬，返日照。因叔父母贫，迎养于家。从兄歿，为遗子置家室，分田贍之。翌年，自日照赴京，过沂州府，访得北齐长盛等造桥残碑、刘道景造像碑、许佺造像碑，喜极欲狂，求知府熊遇泰、琅琊书院山长丁守存，或移学官，或移右军祠。到京应会试，再次落第。

道光十九年（1839），许瀚在京过春节，与龚自珍、陈介祺、汪喜孙等友人研讨金石拓本，撰《周格伯簋考释》、《齐侯罍铭考释》、《古今字诂疏证》等篇。助王筠《说文释例》成书，所撰《说文答问》、《与王荦友论说文或体俗体》、《与王荦友论说文异部重文》等篇，其说多为王筠采入《说文释例》。二月，汪喜孙去济宁河工住所。许瀚随潘锡恩赴通州，校文之暇游居庸关、明陵。四月返京，适龚自珍出都，与留京同年及同官京朝相过从者，如何绍基、何绍业、陈庆镛、吴式芬及许瀚等人，各以绝句别之。赠许瀚诗云：“北方学者君第一，江左所闻君毕闻。土厚水深词气重，烦君他日定吾文。”龚自珍系乾嘉大学者段玉裁外孙，幼受庭训，朴学根柢深厚；此诗非仅推重许瀚，亦肯定许氏治学不囿於地

域，能撷各家精髓而自成一派。本年八月，张穆应顺天乡试，坐摈斥，许瀚代为奔诉。

是年因汪喜孙由户部员外郎保送河工，其地在山东济宁。喜孙至住所后极力向济宁知州徐宗乾荐举许瀚至渔山书院任教，十一月收到关聘及聘金六两。许氏乃于十二月离京赴济宁。计前后在京十余年，藏书不下万签。

讲学书院，总纂州志

道光二十年（1840），印林应山东济宁直隶州知州徐宗乾之聘，主讲渔山书院，并任《济宁直隶州志》总纂。因徐氏崇学务实，重视教育，礼遇贤士，复究心石刻、碑志，许瀚与之相处甚洽；书院中师生和乐融融，弦歌不辍。

徐宗乾，字树人，江苏南通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进士，历官曲阜知县、泰安知县、济宁直隶州知州，后擢福建龙漳汀道、台湾道、按察使，浙江布政使，福建巡抚。著有《斯未信斋文集》。

宗乾治曲阜、泰安各县，时称循吏。既任知州，尤重书院教育。渔山书院初建于道光十年（1830），时知州王镇倡议，于北门内购地五亩八分，西偏建考棚，东偏为阅卷之所，试已即为诸生考业之地。唯房舍落成而经费未备，师生修脯，赖官员分廉俸以济，非可持久。徐氏来济宁后，多方辟措财源。曾撰《增拨膳田记》，略云：“书院何为而设也？崇正学也，端士习也。经正民兴，风化之原也。岂惟是揣摩举业，弋科名云尔哉！尝见通都大邑，每多古刹丛林，金澄紺碧，缙流羽士，饱食逸居，而家塾党庠寒峻子弟糊口而不恐不赡。韦布之士冗坐青毡，舌耕终老，良而慨已。士为四民之首，司牧者其能然置之耶！”此言书院贵在端风正俗，予寒门子弟修业立身之阶也。又筹措书院经费，云：“道光己亥（1839）冬，河帅飭拨道库生息余项二千两，发存运河厅，又筹捐银二千两，分交济宁、临清两卫典肆，均自道光二十年（1840）为始取十一之息。师长之修脯有所出，而生徒之膏火尚未敷也。又与玉露庵僧人达典、常清观道士张永智等议，分僧庵地二百亩，道观地八百亩，各立约契，仍暂交僧道佃种，按年输制钱五百贯，申明各宪立案，一切收支章程备载碑阴，以游闲无益之虚糜，作培养人才之实用。”

徐宗乾礼聘经学名家如许瀚、刘宝楠主讲，并亲至书院授课；每至，必留院一日，殷殷指导学子。夏季增大课，仿依乡会试，主持模拟考试。凡经徐宗乾、许瀚等评定为优异者，其应试必获佳绩。许瀚《和徐树人刺史庚子秋闱纪事诗原韵》四首，其一云：“不负煎煎锁院茶（自注：刺史每值渔山书院课期，必留院一日，训迪殷殷。夏季增大课，依仿乡会试全场条规，必亲入号舍奖励，与诸生同席饮饌），群英九掇桂林花。捷书递见红旗报，深巷轰传白板挝。此日果然能夺锦，当时几度费披沙。元魁况复联乔梓（自注：于第一，张第十，杜第十二，郭氏父子同榜），只惜城南失棣华（自注：杜之胞兄学至已拟中矣，以额满见遗）。”其二云：“蒸蒸士气奋风云，六十年来又冠军。培养深惟沐郁膏（自注：渔山书院向无经费，今捐廉以充膏火。前岁河帅栗恭勤公捐四千金生息，又增拨膳田千亩济之），观摩勤尽借陶分（自注：每月任城、渔山两院五课，兼以大课，计诸生应课之日十有四。作四书文、经文，诗策，凡廿四通）。专门远绍何休诂，独步夙推王粲文（自注：获售者皆穷经稽古，夙擅闻名）。颇怪星轺两伯乐，浑教冀野马空群（自注：试前决科，于、杜与二王为前五名之四，其一为吕铨，主司于批条背面，已暗记一‘中’字，复以小疵见遗）。”其三云：“万古江河属尔曹，岂惟蕊榜姓名高。云中藻耀夸鸣凤，海上烟空问钓鳌。根柢文章须更励，菑畲经训莫辞劳，御沟转眼看新柳，九烈春浓佇染袍。”其四云：“老马识途惭未胜，联翩鹏翮快云兴。禅心纵不同粘絮，僵指何堪试镂冰（自注：余自嘉庆己卯（1819）科后，废八比，非场屋，未尝或作。今主此席，逢兹盛会，只深内愧耳）。惊见鸿文拄坡腹，空劳盥诵服颜膺。诸生解识金针度，好觅新机学织绂（自注：拟程高，挹群言，足为多士法

式)。”瀚并编《齐鲁课士录》，采辑历任各郡邑今昔耆儒未达者，并后学新进诗文，及古近杂体，大课外兼课论、史论、说、考辨诸体佳者，选而刊之。凡此，皆为培养人才之计。

道光二十一年(1841)，许瀚入都，应会试，报罢。此为许瀚第三次落第。在京稍作停留，仍返济宁。徐宗乾于端五日撰诗，有云：“天人五行感吉祥，持君椽笔补新志。(原注：时方延修《州志》)。名山事业争千秋，大才暂屈春官试，今当大书特书麟凤来，国人哗然皆曰先生至(原注：印林主讲渔山书院，京兆试罢回馆，士人转为喜幸焉)”。欣喜印林归返书院之情，溢于言表。

徐宗乾纂修《济宁直隶州志》，聘许瀚总纂。时与分纂者尚有冯集轩、杨铎、李联榜等，皆好金石之学。徐氏《济州金石志序》，略云：“予自戊戌(1838)莅济以后，公事之暇，每届渔山书院课期，辄与山长许印林同年谭及金石一事，娓娓不倦。爰捐廉购求遗文，并遣拓工，于城内四乡及金(金乡)、嘉(嘉祥)、鱼(鱼台)三乡学宫、寺观、深山穷谷，靡不推榻殆遍。日积月累，盈架满箱。”徐氏所言，可知二人相处融洽，志趣相投，因此合作无间。彼时东南沿海因鸦片而起战事，济宁一地尚能敦品励学，传拓遗佚，亦朴实民风之表率也。

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徐宗乾调任四川，将之任。渔山书院肄业诸生咏歌成帙，名《骊歌集》，许瀚作序，叙徐氏政绩与书院师生交谊，诚挚感人，非虚泛酬应之语。《骊歌集序》云：“树人公祖膺荐入覲，擢郡守，将去济而蜀。书院肄业诸生渥沐有年，感恋之诚，不能自秘，发诸咏歌，积成帙，属余弁其简端。余与公仲氏霁吟为同年生。己亥(1839)冬，应公聘，主讲渔山书院。甫入境，见里中父老负暄闲话，藉藉诵刺史贤不辍口，至于妇孺皆然，心固异之。及观其课士，勤勤恳恳，难父兄之于子弟，无以逾焉。每课必亲至，留终日，或二三鼓始去。丹黄甲乙，皆手自点定，不知济事之繁剧也。昔白香山作郡，莅事无多日，政简刑清，无复案牍劳。日与宾客啸咏山水间，清泉白石，为之生色。余之来，公治济二年矣，其得从容暇豫与诸生讲习文艺而不厌不倦者，岂徒有乐乎此哉。”次年正月，徐宗乾离济宁；许瀚仍主讲书院，修成《济宁直隶州志》(十卷)，助编《济州金石志》(八卷)亦成书。

海源阁主人杨以增拟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致函许瀚，延董理校勘之事，遂拟《说文解字义证校例》寄杨氏，因有汪喜孙从中阻挠，故校书、刻书进度甚缓，寻以杨以增调陕，《说文义证》仅于济宁刻一册，遂中止。

道光二十四年(1844)，许瀚赴京，应会试，报罢，此为第四次落第。适逢“大挑”，取二等，例补学官，然未实授。在京闻徐宗乾卸成都府任，升转福建汀漳龙道，纾道过济，欲侍太夫人南旋。许瀚自京师还车，南走三百里，迎晤徐宗乾，谒送济宁东门外。秋，至沂州府，主讲琅琊书院，暇时在境内访碑，先后移至王右军祠。沂州两年，所获新碑拓本甚多，均作跋语，有《沂州石刻题跋》三十种。

二十五年(1845)夏，得牟所书，邀往清江浦为潘锡恩增订章学诚未成之《史籍考》。牟所书略云：“印林大弟同年阁下：昨见河宪潘芸阁先生，据云有《史籍考》一书欲发刻，而校正乏人，非吾弟不可，托兄专书相邀。闻吕鹤田同年(自注：清江书院长)云，馆金似不甚丰(自注：至大不过二百之数)，尚可有两乾馆便可敷衍。且吾弟所到之处，谁不倾倒！此行似不负人，四五百里之遥，就道不难。若惠然肯来，吾兄弟藉图一聚，亦佳事也。如今年有馆，必不能舍彼而就此，可否辞说明年之局，或延至秋间而至，即或延至冬间而至，虽迟迟尚可及也。望速速明白示一回信，至要，至要。”是年秋，离沂州，赴清江浦。

李耀德烈士生平事迹考

王勇则

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〇团（原番号为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三师七团）参谋长李耀德在天津战役中壮烈牺牲。

李耀德烈士的籍贯和姓名

《平津战役烈士名录》中，“团以上干部烈士名录”中均载其姓名为李耀德，籍贯为山东省沂水县。在平津战役纪念馆官网中的“英烈风采”网页上，也能查询到“李耀德，山东省沂水县”。

《天津战役中牺牲的团职干部》载：“李耀德，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七团司令部参谋长，山东省沂水县人。1938年2月入伍，1939年1月入党。1949年1月14日，在总攻天津开始后，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在小西关附近触雷，光荣牺牲。”平津战役纪念馆英烈业绩厅中的烈士生平展墙上，所载李耀德生平与之一致。

不过，其姓名被记载为“李跃德”的情形也不少见，除《平津战役人民解放军团以上干部烈士名录》外，还包括两种版本的《第四野战军团以上干部烈士名录》。

《红星溅飞花满地 层层留与后人看——南开区烈士陵园》载：“南开区烈士陵园坐落在天津市西营门外烈士路中段北侧，该处是当年天津战役主攻部队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的突破口。陵园北端是平顶单檐二层楼的‘天津战役陆军第三十八军烈士纪念馆’。馆内展线长达90米……以重笔描绘了‘不死的旗手王玉龙’、‘舍生忘死的参谋刘春晓’、‘奋不顾身的侦察处长范鲁’、‘身先士卒的参谋长李跃德’等9名烈士可歌可泣的牺牲经过。”

另有《天津战役部分牺牲烈士事迹》记载涉及其生平时，不仅载其姓名为“李跃德”，而且籍贯为山东临沂县：“李跃德，山东临沂县人，在天津战役中，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〇团参谋长。他本应在指挥所里指挥战斗，但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李跃德多次亲自到前卫营检查观看地形。当时，战壕人多拥挤，行走缓慢，为指挥部队，他毅然从战壕上面通过，不幸踩着地雷，牺牲在小西关大街附近。李跃德原是三四一团一营营长。担任营长时，对上级领导的命令和指示坚决执行，从不讲价钱，不打折扣，团结同志，体贴关心战士，作战勇敢，善于组织指挥部队。战斗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集体观念强，顾大局。解放沈阳后，入关途中，调到三四〇团司令部任参谋长。李跃德的一贯作风是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每次战斗，他总是亲临第一线指挥。天津战役总攻开始后，李跃德在指挥所为了更好地指挥部队，亲自到第一线。当时，

炮连正在过护城河，河深无桥，需要人下水抬炮。那时，正是数九寒天，李跃德二话没说，甩掉大衣，就跳到冰冷刺骨的水中，将炮抬过护城河。紧接着他又向冲在全团最前面的前卫营赶去。垂死挣扎的敌人在城防一带的道路上布满了地雷，部队只能在交通壕里前进，壕窄人多，行动很慢。眼看着不能到第一线指挥战斗，李跃德心中像燃烧着一团火，一定要尽快赶到前面去。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地跳出战壕，向前飞奔，在小西关附近，一颗地雷在他的脚下爆炸了。”

杨润身著《故乡情韵》描述：“解放天津市的战斗总攻开始以前，我有幸见到了突击营营长裴飞正及一一四师三四〇团参谋长李跃德、三三七团三连一排副排长王玉龙等同志。李跃德生于山东临沂县农村……李跃德接到妻子的信，妻子告诉他说，已会叫爸爸的女儿还不认识爸爸，盼他打下天津以后，回家休息两天，让他的女儿叫他一声爸爸。”

王凯捷著《天津方式》：“李跃德，山东临沂县人，1938年2月在家乡参加八路军，1939年1月入党。1945年10月，随部队挺进东北。曾任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营营长，先后参加四平攻坚战、‘三下江南’等战斗，以及东北夏、秋、冬季攻势作战。辽沈战役中，率部参加解放沈阳战斗，随后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其间，调任第七团参谋长。他的一贯作风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每当战斗发起前后，都到第一线掌握情况，协助团首长谋划作战行动。天津攻坚战发起后，作为全纵队第二梯队的第三师，于14日14时左右进入纵深作战。为指挥部有序投入战斗，李跃德深入前卫营检查部队进展情况。途中，由于交通壕里人多拥挤，为抢时间，他不顾壕外敌人埋有地雷的危险，毅然跳出战壕向前飞奔，不料在小西关大街附近踩中地雷，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沂水县位于临沂市以北，两县相距约100公里。

还有《华北解放战争实录·天津卷》记载称，“李跃德，山东威海地区人”。今天津市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馆中的烈士展牌上，也载其为山东威海地区人：“李跃德，山东威海地区人，1924年生人，辽沈战役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一团一营营长，后调任三四〇团司令部任参谋长。他作战非常勇敢，也非常善于组织部队。天津战役打响后，李跃德指挥部由西路挺进天津市区。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他亲临第一线指挥。在战斗中，他不幸踩响地雷，壮烈牺牲，年仅25岁。”设在天津市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馆”内的电子书阅读器中，载有《为天津解放而牺牲的李跃德》一文，文中表述与该馆展牌所载内容基本一致。

不过，从沂水至威海，距离超过440公里。尚不知“山东威海地区”之说依据若何。



天津战役

李耀德生前战友刘德胜的记载

天津战役期间，刘德胜任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一团一营三连连长兼指导员，曾是李耀德的下属。刘德胜在回忆录《难忘的戎马生涯》中，多处提及李耀德。

一是，“李耀德，山东沂水人，1939年入伍，参加过大小战斗百余次……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们在一起并肩战斗了5年之久。”“他是我的老领导，他指挥我们连打了很多有名的战斗。”在东北战场上，李耀德曾是刘德胜所在团（即三四一团前身，原称“五八团”）的一营营长。1947年，在其塔木战斗中，李耀德任突击营营长。刘德胜在阵地上负重伤后，李耀德虽然也有伤在身，但仍“带领二连一个排杀回了其塔木，把我抢了回来”。二人后均在位于黑龙江省鹤岗的一家野战医院疗伤。其间，李耀德对刘德胜予以精心照顾。

二是，“在1949年1月的解放天津战役中，身为东北野战军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〇团参谋长的李耀德身先士卒，率领突击营从西营门突破，向敌人发起多次进攻，共歼敌400多人。为摸清敌情，李耀德执意要亲自到前沿探路，不幸踩上敌人的地雷，壮烈牺牲，年仅28岁。”而在前文所引资料中，有生于1924年说（即25岁说）和牺牲时29岁说。

三是，1999年，值纪念解放天津50周年之际，“天津经济广播电台派记者寻找李耀德家乡的亲人。他有个老母亲已经90多岁了，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侄子。记者把他的侄子接到天津。天津经济广播电台在一个广场组织活动，庆祝天津解放50周年，他两个侄子参加了。我在现场讲了李耀德历次战斗的事迹。当时就有好几个单位慷慨解囊，当场给李耀德烈士的亲属捐款……我还给山东民政局写信，建议尽量给他两个侄子安排个正式工作。”“在烈士事迹的感召下，社会一些机构纷纷为李耀德的母亲捐款，累计几万元。此事曾在沂水县引起了很大轰动，很快就掀起了学习烈士事迹、弘扬烈士精神、拥军优属的热潮。”

2007年8月3日，天津《每日新报》刊载题为《八旬“爆破大王”苦寻战友家属》的消息，介绍刘德胜对李耀德烈士的回忆，并称，“后受沂蒙山区通讯条件所限，刘德胜与烈士遗属再度失去联系。”但在该消息中，均写为“李跃德”。

《沂水县志》中载有《革命烈士英名录》，笔者尚未发现其中有对李耀德烈士或李跃德烈士的记载。其姓名到底是李耀德还是李跃德？抑或两个姓名均使用过？其籍贯到底是山东沂水县还是山东临沂县或山东威海地区？

鉴于平津战役纪念馆展牌、《天津通志·军事志》和刘德胜的回忆录中，均明确记载为



解放天津

李耀德和山东沂水县，本文遵从此载为据。

李耀德烈士的牺牲地点

前引资料在缕析李耀德姓名和籍贯时，也涉及其牺牲情况。关于其牺牲地点，有“小西关附近”和“小西关大街附近”、“西关大街附近”等说。

平津战役纪念馆“无尽的思念”流动展牌上，载李耀德生于1924年，牺牲时年仅25岁，并称其牺牲原因为：“1949年1月14日，他坚持在战场一线指挥，及时摸敌情，掌握部队行进动态。他率领团突击营从西营门突破，为尽快跑到队伍前头有效指挥，察看前卫营地形，他跳出战壕去探路，不幸在西关大街附近踩中地雷牺牲。”

《华北解放战争实录·天津卷》记载中的表述更为详细，即：“部队开赴天津后，三四〇团担任师里的先卫团，李跃德负责指挥全团作战。天津战役打响后，他指挥三四〇团由西路挺进天津市区。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他亲临一线指挥。炮连过护城河时，河水冰冷刺骨。他第一个跳下河去，帮助战士们抬炮过河。而后，他又向冲在全团最前面的前卫营赶去，以便观看地形。此时，在夜色中，守军发起反击。守军早已在城防一带的道路上布满了地雷。三十八军战士被阻在战壕里前进，战壕里拥挤难行，行动很慢。李跃德不能到第一线指挥作战，心急如焚。他明知战壕顶上埋有地雷，毅然跃上战壕顶，跑步前行。不幸在西城所（监狱）前边南侧的战壕顶上（如今的小西关大街附近）踩响地雷，一条腿被炸断，当场壮烈牺牲，年仅25岁。”

此文中提及的“西城所（监狱）”，即指位于小西关的河北第三监狱（俗称小西关监狱）。该监狱清末曾称“习艺所”，尚未发现该监狱还有“西城所”的称谓。笔者判断，“西城所”为误植。

“小西关”为地域名，而小西关大街则为街道名。据《天津市地名志（06）·红桥区》载：“小西关大街在红桥区南部。东南起新德胡同，西北至芥园道和阁外大街衔接处。长420米……约1780年建。因地处墙子小西门和此处设有西关税卡，故名。”

而西关大街“东起西马路，西至西关外大街，顺接西营门大街，中与横街子、巨德里、烈女祠、故物场大街、栖流所胡同相交，长770米……因与城西门相接，同时设收税‘关’，故名。”西关大街以西为西关外大街。西关外大街长730米，“东南起西关大街，西北至明善里，顺接小西关大街。”

李耀德的牺牲原因是在天津西线城防一带跃出战壕后踩到地雷。这一点尚未发现异议。很明显，“小西关大街附近”靠近西线城防一带。而西关大街距西线城防一带较远。因此，李耀德的牺牲地点应在“小西关附近”或“小西关大街附近”，并非“西关大街附近”。

结 语

经以上考证可知：在解放天津战场上壮烈牺牲的东北野战军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〇团参谋长的姓名为李耀德，其姓名并非李跃德。李耀德烈士的籍贯为山东沂水县，牺牲时间为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向天津发起总攻之际，牺牲地点为靠近天津西线城防西营门一带的“小西关附近”，牺牲原因为跳出战壕指挥所属部队时踩响地雷。

而李耀德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尚存25岁（即生于1924年）、28岁和29岁（所指可能是虚岁）三说。本文暂持28岁说，即李耀德烈士生于1921年或1922年。对此仍需详加考证。



王羲之之死

刘诚龙



王羲之

史上第一书法家王羲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气死的，想来，真为之叹气。王羲之不是被别人气死的，是被自己气死的。

王羲之也算是得天独厚之人，老天对他蛮偏爱的，出生于琅琊王氏望族，落地便带上了富贵籍；身世既好，人又聪慧，尤天赋了一门书法本事，少年即获得了高誉，左右邻里，上下诸侯，“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将其书法评价为“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确实是的，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冠绝群雄，千多年过去，至今没有超越者。

人生到此，夫复何求？

王羲之到此，却还有太多要求的。

王羲之喜欢与人争闲气，直白地说，就是易生羡慕嫉妒恨。有位叫王述的，与他同门同姓同龄还同宗，生得还蛮有气质，王羲之从小就将王述视为假想敌，“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两王齐名，齐的是身世名，在书法上，王羲之远远地将王述抛在后面。一招鲜吃遍天，王羲之可以傲人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既已足可傲人，更可以虚怀了，一个天下无双的书法大家，跟一个才气上名不见经传的人去比什么？

王羲之却喜欢攀比，其攀比不是一招鲜吃遍天，而是要招招鲜包圆天，书法、文章、地位、家庭、事业、财富、美誉以及琴棋书画茶酒诗词……都不输人，这，活得就苦了。王述，在书道与名气上，比王羲之差很远，但他后来在官阶地位以及在职场的美誉度上，却又高出王羲之很多，“王右军（王羲之）素轻蓝田（王述，曾被封蓝田侯，故叫王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

王述早先声誉并不蛮好，但后来做人与做官，较受好评，升迁也比王羲之升得快，升得高。这下王羲之坐不住了，心里那股火熊熊烧。王羲之在会稽当内史（地方行政长官），恰好王述母亲过世，在会稽守孝，他去吊丧，看到王述在那里哭娘，王述要来跟他打招呼，他转身就走了。心里有嫉有恨，用得着在人家丧母之时，去羞辱人吗？

王羲之还做了一件好笑事。王述当了扬州刺史，会稽恰好归扬州管辖。原先一个在艺界名气大，一个在官场美誉高，地位却基本相当，现在呢，王述要来“领导”王羲之了，这下，王羲之心里啊，无名火烧得更旺了，“初得消息，求分会稽为越州。”打了报告，要从扬州划出地盘来，将会稽升格为越州，自己也因此可以跟王述平起平坐，一样刺史了。就为了与王述斗气，竟要搞行政区域调整，这事说出去，不是笑话吗？“大为时贤所笑”。加上后来可能有把柄落在王述手上，“右军遂称疾去郡”，官场干不下去，辞职了。

王羲之辞职后，有书说他过的是好日子，与人打牌，跟人说书，优游林下……其实，王羲之过得并不那么好。心胸不宽阔的人，难以过上神仙生活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里的说法可能更靠谱：“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

王羲之过世确是早的，终年59岁，未滿花甲。一代伟大的书法家，竟以狭隘心气而英年早逝，太可惜了。



临沂出土文物之

银雀山汉墓竹简

陈辉

1972年4月10日上午，临沂文物组工作人员接到群众报告，说在临沂地区卫生局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古墓。基建工地位于市区南部的一座名为银雀山的山岗上，这里原是一处汉代墓地。于是有关工作人员迅速赶到，并和工地负责人协商有关发掘事宜。

4月14日，临沂文物组工作人员正式清理先前已被建筑工地挖开的一座墓葬，4月17日清理完毕。这是一座岩墓，墓坑直接在岩石上开凿而成，长314厘米、宽226厘米；墓坑内有木质棺槨，木槨长264厘米、宽176厘米；木棺在木槨内西侧，棺内尚有人体尸骨，已腐朽，另放置少量的漆木器、铜镜等随葬品；木槨东侧为器物箱，放置大量的陶器、漆木器、钱币等随葬品。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等竹简就放置在器物间隙之中！

据参与当时挖掘工作的人员回忆，杨殿旭在墓葬中清理器物时，看到一根竹片从水中漂浮上来，不自觉地漂洗了一下竹片上的泥浆（清理墓葬时，墓坑内有积水），并说：“你们看，这上面有字。”他把竹片递给了墓坑上面的人。刘心健经仔细辨认后，确认竹片上写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曰”的字样，他就兴奋起来，大呼：这是古代的竹简！在发明纸张之前，古人把书籍文字写在制作好的竹片或木片上，分别称为“竹简”和“木牍”。文物工作人员当即要求施工人员停工，并安排人员保护现场，同时上报山东省文物部门。山东省文物部门随即派遣山东省博物馆有关专家前来发掘指导。该墓被编号为“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不久在一号汉墓的西侧又发现二号汉墓，也出土一批竹简。事后经初步整理统计，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还有数千残片，除两部兵书外，还有《六韬》、《尉繚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二号汉墓出土竹简32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



《孙子兵法》与《孙臆兵法》的同时出土，证实了《史记》有关孙武仕吴、孙臆仕齐，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使长期存在的《孙子兵法》为后人伪托，及世无孙武其人，兵法为孙臆所作的疑问得以解决，所以墓葬中竹简“兵书”的发现惊天动地。在《文物》1974年第2期发表《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等竹简》的简报及新华社在1974年6月发表了临沂银雀山发现竹简消息的新闻通稿后，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鉴于这次考古发掘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该考古项目被评为“新中国30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0世纪90年代，又被评为“新中国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1世纪初，该项目再次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发掘出土后经保护处理，至今一直存放在山东博物馆。2011年，此批竹简被评选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老城夜话 (连载)

刘家骥

假节烈赈济灾荒 真孝妇带姑改嫁

节烈牌坊和节烈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它不知坑害了多少妇女，但到民国后就不多见了。可在1936年，临沂城就出现一个节妇，而且是未婚妻为未婚夫殉节的姑娘。

当时的魏家巷路北第二户住着一位富户，户主张鸿宾，本是农村的土地主，因进城经营铁货店发了财，成了一个地主兼富商的财主。此人非常吝啬，对穷人从不施舍一文钱，对街坊更是六亲不认。他总结出自己发财的经验是：“奸、吝、矜、毒、狠、肉、牛、哽、滑、煊。”他还放高利贷。1936年，临沂又闹春荒。青黄不接之时，他就开始放粮了。他自称“善人”放粮，实则是市价卖粮，谁若少他一文钱，也休想把粮拿走。住在小新庄卖油条的魏大娘只少一分钱，他都不让拿走，其他人看不惯，替她交上了一分钱，他才放行，从此他的“德性”出了名。眼看到了清明时节，更是青黄不接，他看发财的时机到了，又要将粮食涨价。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他的一个儿子在城墙上放风筝，不小心掉下来摔死了。

这真是祸从天降，而节妇的故事就从此开始了。原来他这个儿子早就和五里堡一陆姓的姑娘订了亲，男孩一死亲也就算了，谁知这个女孩和她嫂子吵架，赌气服毒自杀了，陆家怕他嫂子承担责任，就说女孩是为未婚夫殉节的，将消息报到张家。就在张鸿宾对此事犹豫不决之时，街邻有几个头面人物到他家慰问，并祝贺他家里出了个节妇，说是他光耀门庭的大好时机，让他赶快写好节妇的行状上报政府。当时县政府看状后，答应给节妇竖碑，并赠了四个大字“崇褒节烈”，同时赠给了他50块银元的费用。张喜出望外，就让街邻帮他大操大办，于是“办事”的过程就成了赈济灾荒的机会。几条巷的贫民皆来帮忙，他供大家吃饭，好不热闹。选了个良辰吉日，用一口上面罩着花轿式棺罩的朱红大棺，女方家给扎了套纸嫁妆，吹吹打打送到张家，这算是将节妇迎回了婆家，三天后出殡，去给张家的儿子合葬。这时节烈碑也由张家的西邻、书法家魏理辰书就刻好，选在三月二十五山会时，将碑立在南关阁子门外路东的大路旁，到时还要请县长



清代节考碑

给揭幕。就这样前前后后忙了一个月，灾荒也快过去了，张家的粮食也吃得差不多了。借节妇的事件巧使财主赈济了灾荒，人皆道出此主意者功德无量。

无独有偶，此时临沂城还真出了一个孝妇。住在西正气巷的一个李姓人家，一家三口和和气气过日子，小日子还算过得幸福。婆婆张氏，娘家是东姜园槐树底张家，儿子李兆星是一家服装店的工人，儿媳宋氏的娘家是宋王庄宋家。但天有不测风云，这年儿子被一场大病夺去了生命，祸从天降，这家的生活从此陷入了低谷。既无后人又无经济来源，儿媳改嫁已是必然的去向，前来说媒的人还真不少，但儿媳舍不得离开孤身一人的婆母，为此娘俩哭了好几场。这儿媳真是一个孝妇，居然想起了要带婆母改嫁的想法。她大胆的向媒人提出了这一条件，事有巧合，还真有同意这一条件的好人。原来是住在白庄的一户老实农民吴明义，父母双亡，妻子又去世，只剩下孤身一人，他正愁着建立一个新家庭过日子，当他听到宋氏要带婆母改嫁的消息后，自己去和宋氏见了面，完全同意了条件。婆婆张氏见此人是一忠厚之人，也很欢喜。于是选了一个好日子，用一辆牛车将婆媳接到了他家，亲朋皆来祝贺，从此老实农民吴明义又建立了新家庭。他们两口下地干活，婆婆在家办饭看家，生活非常美满。

儿媳带婆母改嫁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当时的县长范筑先知道后，大为赞赏，称赞这是临沂移风易俗的好例子，特地在县署后花厅接见了这对新夫妻。听说他们种地没有牲口，他又从进德会的经费中提出了款项奖励了他们一头牛钱。从此这一新孝妇的故事在临沂传开了，“天道无亲常与善”，这一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他们夫妻俩勤俭过日子，又生了几个孩子，皆由她婆母看大。解放后他家又分得几亩土地，日子过得更是美满，世人皆道这是“好人自有好报”。

民俗淳朴存古风 旧俗改革倡文明

临沂志书皆曰：“琅琊地介齐鲁，重礼崇义先王之遗风未泯，而计功课利伯政之余习犹存”。《图经》曰：“家家颜闵，人人求由，读先王之书。文质彬彬乎，过人，经诵洋洋乎盈耳，圣人之遗泽也，又曰：人务耕桑，朴而无华，有古风趣”。

查阅孔子弟子，生于今临沂者多人，因二十四孝中有孔门弟子多人，其中有七人是临沂人或与临沂有关，像曾参、仲由、闵损等，可见孝行是临沂的传统美德。临沂不但孝子多，而且还有孝妇。古今闻名的孝妇即在今郯城县，自元朝始名剧《窦娥冤》和后来的京剧《六月雪》，皆是以东海孝妇的故事改写的。

临沂人一向崇礼好学，大公无私。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待人接物讲究礼貌，婚嫁丧娶讲究礼仪。

临沂人好学成风。郯子关于鸟图腾的学说孔子都很佩服。疏广、疏受因学识渊博而被聘为帝师，而他们又是大公无私的代表人物，曾将皇帝的赠金全部捐给穷人。诸葛亮的各种发明创造，何承天的科学研究皆载入史册。

临沂人一向热爱祖国，勇于反击侵略。明末倭寇不断侵犯我区沿海地带，抗倭名将孙镗率众痛击倭寇，立下了赫赫战功。抗战八年临沂人更作出了无私奉献，多少优秀男儿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双烈属的光荣家庭被人民所称颂。

广大农村村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拥护政府，支援前线，村民之间和睦乡邻，有事互助。其中有名的留邻庄的故事广为传颂：为了不让邻居家的孩子爬树跌伤，甘愿伐掉自己家的枣树，不让邻居搬走。河东石河村一刘姓村妇独自集资修建石河桥的故事被刻碑传颂。

值得一提的是临沂还出了不少的红嫂爱护子弟兵、抢救伤员、寄养革命干部子女的事迹，这些事迹更是感人。临沂抗战初期还出现不少舍家抗战的模范人物，像苍山县的万春



莒南坪上孙钟庙

圃、沂南县的刘佛言、莒南县的庄晓光……他们变卖了家产支援抗日战争，为人称颂。

临沂的民俗也有落后的一面，旧志曰：沂俗尚鬼，民有疾不事医药用巫祈祷……此俗特别在农村中盛行，于是村中多巫婆神汉骗人钱财，耽误了医治。农村更有早婚童养媳等习俗。随着解放后的各种改革，这些陋习逐渐革除了。但是也有一些旧习革除较慢，临沂是全省男人剪辫子最晚的地区，直到1935年临沂城的男人还有留辫子的，至于妇女裹足的旧习直到解放后才彻底根除。

“良民证”迫害良民 “共荣圈”居心险恶

众所周知，日寇侵略中国时，实行过“良民证”，以此来迫害中国人民，防止人民对它的反抗，临沂也不例外。这“良民证”由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局制作，用石印印刷，黑字白底，正面是“良民证”三个字，下面是编号。反面是持证人的一寸头像，并钤有两方印，一方是宪兵队的钢印，一方是伪警察局的木印，下面是持证人的两个指纹，分别是左食指和右食指。人们出入城门全凭这个“良民证”。临沂城的四城门皆由鬼子站岗，男警察检查男人，女警察检查妇女。农村村民是没有“良民证”的，只有伪保长和部分伪甲长才可有“良民证”。所以日军占领的8年中大多数农民就再也没有进过临沂城。城内居民有什么婚丧嫁娶，乡间的亲戚要想进城就得花钱到警察局打“条子”。乡村的村民平时休想进城做买卖。城内的好多商业因此垮了台，有的只好迁到农村去经营了。而城内的两个小集也中止了，南关大集也被迁到阁子门外。

鬼子汉奸这一措施并未难倒当时的游击队。当石印局印“良民证”时，游击队通过内线弄到了一批，又仿制了钢印、木印。所以，许多游击队员也配备上了“良民证”，照样进城打击日伪。抗战胜利，临沂城解放，广大人民重见天日，人们又可以自由进出城了。城关四集全部恢复，1946年还恢复了教场山骡马大会，斯时人山人海，无不歌颂共产党的伟大。

但是好景不长。1947年正月十七，土匪头子王洪九随国民党军队又侵占了临沂城。

这王洪九当过日本的“皇协军”，学会了用“良民证”迫害人民的手段，他进城后又实施“良民证”的害民办法，而且比日本鬼子还狠毒。他的“良民证”分为两样，一种是白底蓝字，一种是白地红字。红字的称做“红良民证”，是发给共产党的干部家属和当过共产党街道干部，以及参加过民兵、识字班与当过教师的人。这持有“红良民证”的人出入城门要经过严密的查问甚至还要搜身，所以这些人基本上就不敢出入城门了，做买卖的从此也断了生路。更严重的是过去日伪只在四门查“良民证”，而王贼则封闭了东门和北门，这南门不仅要查，而且东西哨门南阁子门也要查。南关大集被赶到了城南付家屯，城里人赶集要出城跑很远，城关居民无不骂王洪九比日本鬼子还狠毒。

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整整过了一年零七个月。1948年10月10日，临沂城二次解放，从此城乡居民自由出入再也不用“良民证”了，使用“良民证”的历史在临沂永远消失了。

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者提出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以此作为他侵略亚洲各国的借口。战争开始前即将“八纮一字”、“王道乐土”等反动口号大肆宣扬，狼子野心暴露无疑，其目的就是要奴役亚洲各国人民。按照“八纮一字”，它首先吞并了朝鲜，又将我国东北变为傀儡“满洲国”，强迫台湾居民“日本化”，在中国大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将城市村庄变成一片焦土，还说成是“王道乐土”，抓“劳工”抓“慰安妇”还说成是“中日亲善”。

再看各地的伪政权是什么货色，日特物色的人选是旧军阀、土匪、叛徒、无耻政客、流氓、黑社会成员……以临沂为例：曾在临沂作恶的老军阀方永昌，当上了青州道道尹。老军阀钱光汉的弟弟钱四毛，当上了城关伪区长。流氓头大赌棍齐华亭当上了商会会长，他儿子齐孝贵当上了伪警察局长。总之，伪政权内没有好人。

日本人也完全控制了经济命脉。在临沂夺取了大小各煤矿，没收了发电厂，交通只有日本一家汽车公司，通过日商各洋行收购各种战略物资，同时向国人出售毒品海洛因。文化教育更是进行奴化教育，强迫学生学习日语，唱日本国歌……。

更可甚者，道、县两级政权皆由日本顾问当家，沂州道道尹和临沂县县长皆是日本



王洪九占领后的临沂城一角

派来的傀儡，个个都是日本的走狗。侵略军在临沂的组织一应俱全，司令部、红部、宪兵队、特高课、顾问团、军医院、仪仗队、军犬队、战马队、慰安所等。但好景不长，随着抗战的发展，日军节节败退。我军首先解放了蒙阴城，又解放了费县县城，最后只剩下临沂孤城了。随着日本战败投降，住在临沂的日军逃往枣庄，向铁道游击队投降了。临沂解放后，这些日军又被押回了临沂。从此“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蒙古族临沂繁衍 明王孙沂州生息

临沂的韦姓和虞姓中部分居民是蒙古族的后裔，查阅这两姓的族谱和墓碑及志书得知，他们皆是明初赐姓和以后迁来临沂的。

韦姓的始祖察罕帖木儿（哈喇那海），从明太祖征战有功，被授羽林前卫指挥同知，籍直隶涞水县，其子从燕王靖难有功，得世职，至成化年间时有名录者选沂州卫指挥使同知，遂藉于临沂。他们族中出了几个武进士，其中韦邦臣是世袭沂州卫指挥同知，万历己卯壬午科中癸未科进士，其子韦傲弦亦世袭职，他是万历丁酉庚子丙午三科中丁未科进士，可谓父子皆进士。韦祚兴在志书中有传，他字晏虹，号心耕，明末曾与其他将领坚守州城，明亡后，不再出仕，居家城西朱保村，以书画自娱，平时栽花种竹与同好引酒赋诗，悠游林下40余年。

韦氏子孙现多居朱保韦家屯等村，家族繁盛兴旺，成为临沂的一个望族。

虞姓原籍直隶三河县，其始祖彦帖木，先从明太祖征战有功，授金吾右卫指挥僉事，其孙虞异于成化十七年调沂州卫，子孙世袭。查其族谱，三传至明宣宗时，宣德帝赐姓为虞，其子虞异于成化年选沂州卫指挥僉事，遂定居临沂。五传至虞有光时，与弟有庆从总兵杨肇基平息白莲教，屡建奇功，崇祯五年，殁于军。明亡后，其子孙居于城南五里堡村，不再仕清，至今子孙繁衍成一大族。

以上这是韦虞两姓明代因武职而来临沂定居的过程，他们与当地汉族通婚，相处日久，其语言风俗习惯已与当地汉族无异了。他们将草原畜牧的知识带到临沂，教给了汉族同胞，过去农耕时农民为让牛驴高兴出力，唱着与蒙古草原相同的歌调，俗称“打唱了”。但随着农业机械的推广，这“打唱了”的声音也逐渐听不到了。

蒙古族称小巷为胡同，临沂城没有一条街巷称胡同，而城西乡好多村庄的小巷称胡同。如张家胡同，王家胡同等，这也是当年韦氏家族留下的蒙古族的语言痕迹，可惜的是随着乡村旧房的改造，胡同已消失了。

临沂县自清雍正十二年改称兰山县，原来县境内南端真有一小山名兰山，不在现在的兰山区内，而在今罗庄区的南端。兰山虽不很高，但满山青翠。山前有一村庄也叫兰山村，村前有一小河，清澈涟漪，过去村民不多，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每逢战乱时，外人多去避乱。

说来话长。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时，迁来一户人家，他们的出身一向不为人所知，明朝之后，清朝到处捕杀明王族后裔，这时突然来了一位老者，和村中朱姓人家认了本家，接着在本村内买地建房后，将亲属迁来居住，但从来不说他们的出身，但有的事很奇怪，他们家的子弟只读书，从不参加科举，更无人做官，从不跟官府打交道，更奇怪的是此村原名朱家庄，他家来后建议改为兰山村，似乎这朱姓怕人注意，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家族的河南口音也变成本地化了。

时至民国，他们家才流露出他们家族是明朝唐王的后裔，因唐王在南方监国称帝被清朝所灭，其子孙的一支即从河南南阳逃到了临沂，成了一般平民才免于祸。现在其族人已分居各地，不在兰山村了，这也是改朝换代时移民的一段事例。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沂河桥

“齐头水”多年为患 留人滩开发景区

临沂城东沂河河面最宽处五华里。春秋冬三季有木桥过行人，夏季则要靠船渡。过去河上既无拦水坝又无水库，大雨过后上游来水非常迅猛，特别暴雨后，山洪一泻而下，像一堵墙一样向下推进，人们名之曰“齐头水”，行人过河时若遇上根本无法逃避，往往被大水冲走，故年年皆有遇难之人。最大的一次灾难是1960年8月7日上午7时40分，由临沂开往新沂的（431次）客车，行至沂河石桥中心时，突遭洪水，车被淹没，车内47人除9人抢救脱险外，其余全部遇难。更让人痛心的是车内多数是解放军和返校的大学生。痛定思痛，从此临沂人下定决心要在沂河上面建现代化的高桥以防水患。

随着上游水库的修建和拦水坝的增建，大水被有序调节，再也没有“齐头水”了，“齐头水”也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沂河的水滚滚向南流去，至现在的后滩村，向西南拐去，故在河西岸形成了一个大河滩。一般沂河上游淹死人顺水而下很难找到尸体，有经验的人知道到后滩大沙滩去往往能找到，故人们将这一河滩称之为“留人滩”。

1960年老桥大水遇难的38人的尸体，同样也是水消后在“留人滩”找到的，后滩村民中的老人很有经验，他们会发现哪些沙滩下有遇难者的遗体。

1964年金雀山路沂河大桥建成，群众称新桥，从此结束了人们夏季过河的不便。而今数座大桥建成更是方便了交通。小埠东橡胶坝建成后，临沂变成一座水城。河两岸的滨河大道更是形成了一道风景线，而当年的“留人滩”也成了风景秀丽的景区，“留人滩”也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了。

王学德及其书法艺术

王庆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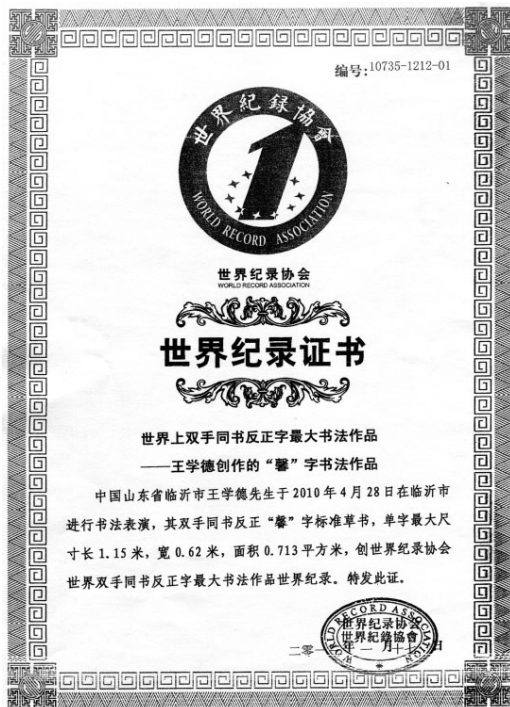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它以独特的笔墨形式，用点与线构成的艺术语言，向人们展示着中国汉字结构形式的形体美和中华文化深层内涵的深刻意蕴美。大凡有成就的书法家，无不对中华书法艺术的深层文化内涵深刻领会，并与自己的文化艺术风格相互融会贯通，以独到的艺术风格，凭借笔墨的尽情挥洒，以展示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面貌。在将中国书法艺术一步步推向艺术象牙之塔的同时，自己也在不断地艺术探索中逐渐成为了书法大家。来自临沂琅琊王氏家族的著名书法家王学德就是这一行列中的佼佼者之一。

王学德，斋号芟禾春，山东临沂人，1949年生。他自幼酷爱书法，在乡里书法名人和祖父的指点、鼓励下，不停的写写画画，每每入神，13岁就写了一手好字，被乡里誉为“小秀才”。

1976年他大学毕业后，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赴西藏支援边疆建设。工作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他仍然利用工作之余学习书法，并在书法界渐有名气。

但当他临习过众家法帖之后，忽然感受到一种莫名的迷茫，他在自题诗中写道：“无师自通枉费言，循规蹈矩承先贤；灵犀随处名新意，水到渠成示天然。”他开始走上了寻师之路。事由天成，1983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在成都大街上看到一幅题





匾，上书“山东烤馍”四个苍劲的正楷大字，落款是：“琅琊王砥如”。他被这几个大字吸引了，千方百计打听王砥如的住址，见面后细细交谈，才知王砥如是全国著名书法家，而两人又是临沂琅琊王氏家族人，与书圣王羲之是同族。从此，他成了王砥如的学生。十年努力，终得这位全国“研‘欧’第一人”的真传。

1995年10月，他又拜全国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柳倩为师，当时他带了四幅字：楷、行、草、榜书，柳老特认真，就这四幅字看了足足两小时，然后高兴地说了一句话：“路子走对了”。随即写了一幅字，上下款落全，便收为弟子。自此，他就跟柳老系统地学习书法、诗词、楹联。经过数年努力，他的书法艺术大有长进，同时还练就了一手率真流畅、挥洒自如的左手书反字，双手同书反正字的硬功夫。柳老是这样评价王学德的书法：正楷基础厚实，用笔中锋，点画不苟，且不呆不板，基本掌握了欧楷的规律和神韵。行书，架子稳当，点画硬朗，字如其人，刚正不阿，且率真灵便，带有二王风格。草书基本掌握了‘易识、易写、标准、美丽’的四大原则，其用笔流畅自然，流露出自己的情韵雅怀，但还需多练，才能达到纯熟。若能肆意奔放，可写狂草。其榜书气势磅礴，越大越显功力。他的左手书反字，双手同书反正字，自然大方，心手双畅，活泼奔放，极具表演力，卓然不群，无人能及。这在中国书法史上算得上是：创新意、辟新径、添新款。

他的老师马萧萧在《王学德的书法艺术》里写道：他最初从师于王砥如先生学楷书，以欧体为主，在楷书的点画、结体、神韵上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他又遍临了颜、柳、赵诸家。所以他的楷书写得很好。笔画扎实，结构严谨中显出神韵，在当前书坛一片浮躁中能够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写好楷书，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的草书受到诗人、书法家柳倩公的亲手指导，练过标准草书千字文，掌握了草书的规范，又临习了孙过庭《书谱》及张旭、怀素诸家帖本，所以他的草书既规范又灵动。至于他的左右开弓同时书写反正字的功能，这是一种特殊的才技，得到很多人的称许，这种成就也是很不容易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他不仅苦学精练书法，还注重书法

诗画赏析

理论、诗词楹联、声律等综合知识的学习。他的书法作品、诗词、楹联多次入展全国大赛，并多次获奖。2007年，他参加“毛泽东诗词书法全国大赛”，“纪念欧阳询诞辰1140周年书画大赛”，“第四届盛世中华杯”全国书画大赛中获得三个金奖。2009年依他精湛的书法艺术被评为“全国十佳新闻人物”，参加了在京西宾馆举办的“庆祝建国60周年新闻人物座谈会”，并在“盛世华章”书画创作交流笔会上进行了表演。他的诗词、对联被《中华诗词联艺术家大辞典》、《中华楹联年鉴》、《中国奥运冠军题赠嵌名大典》和《中华魂诗词联宝典》收录出版发行。个人传略和作品入编十多部典籍，作品被国内外多个单位和个人收藏。他现在是中华楹联学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世界书画家协会理事，中原书画研究院高级书画师，北京诗联书画研究院研究员，并被授予“德艺双馨艺术家”、“跨世纪艺术名人”、“禅佛书画家”、“二十一世纪中华书画百杰”、“当代杰出书画艺术家”、“中华书画艺术精英”，诗词联作品获“2004年度百杰创作奖”，在“2008·中国奥运冠军题赠嵌名”活动中，对联作品获优秀奖，被授予“中华吟坛题赠嵌名妙手”，同时获2008·金镶玉艺术奖。2008年还获得“中华魂”百杰创作奖。

后来，永不知足的他在老师马萧萧的指导下，更加系统的学习书法艺术和诗词、对联。他曾写道：古贤法书指路灯，学人学艺不可轻。满舵进取明方向，不求新意是白丁。这首诗反映了他对书法、诗联艺术的植根继承和创新发展的的心声。我相信，他一定会在艺海中永不懈怠的拼搏奋进，最终到达理想的彼岸和艺术的象牙之塔。

(作者王庆新，原中国楹联学会秘书长。现任北京华夏诗联书画院院长。)



“东莞”地名南迁 与青、徐士族南渡 (二)

李 泮



李泮，1937年生，山东寿光人。195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2年毕业后参军入伍，在北京军区的师、军、军区机关和院校服役37年，1999年退休。大校、教授、研究员。著有《中国军事经济史·宋元明》、《话说画眉》、《探寻寿光古国》、《求实求是集》，在军内外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凸显了封建权力的残暴和丑恶。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后，杨皇后伙同杨骏修改遗嘱篡夺皇权；次年贾皇后杀死杨骏逼死杨皇后，灭杨氏数千族人；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杀贾皇后；公元301年，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起兵杀死司马伦；公元302年，司马颙与司马乂攻打司马冏；公元303年，司马颙与司马颖又攻杀司马冏；公元304年，司马越杀司马乂；公元305年，司马越又起兵反司马颙；公元306年，司马越杀死司马颖，毒死晋惠帝，立晋怀帝。八王之乱是一幅群兽狂斗图，司马氏集团的全部残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现在这个狂斗中，由此引起300年的战乱和分裂。西晋的灭亡和“五胡十六国”混乱政治局面的形成，犹如祖逖对司马睿所言：“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



八王之乱（绘画）

一、西晋末年和南北朝时的第二次北人南迁高潮

在司马氏的混战中，各王为赢得优势，纷纷利用和引导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于是匈奴贵族遂借赴国难之美名，长驱入邺；东瀛公司马腾引乌桓羯朱袭司马颖，于是乌桓遂长驱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鲜卑大掠妇女’，‘沉于易水者八千人’。从此大河南北，变成为匈奴、鲜卑贵族统治的世界，由八王之乱引起了中原更大的胡汉移民狂潮。”

“八王之乱”的直接的政治后果，就是西晋政权的灭亡和“五胡十六国”导致北方的分裂、割据、战争、杀戮，从而经济的破产，社会慌乱，人民大量死亡或流离失所，活着的人纷纷往东、往南逃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浪潮。

《晋书·王导传》载：“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就是说十分之六七的北方豪族、士族男女都逃到江南去了。

《晋书·地理志》载：“永嘉之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一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

《晋书·郗鉴传》载：鲁人郗鉴初率乡里“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峯山，三年间，众至数万。”，后又率众屯广陵（今江苏扬州）。

东晋早期的几十年中，北人南渡是个接连不断的过程。王仲犛先生将这个过程划分为七个时期，即：

1、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移镇江东，北方流民相率过江，这是第一个时期。

2、大兴四年（公元321年），祖逖病死，郗鉴自邹山退屯合肥，祖约自谯城退屯寿春，其后遂尽失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区，流民渡江者转多，这是第二个时期。

3、永和五年（公元349年），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汉中，这是第三个时期。

4、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大捷，苻坚败亡，黄河流域再度分裂，中原流民相率过江，这是第四个时期。

5、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死后，又失河南，流民南渡者转多，这是第五个时期。

6、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瓜州，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六个时期。

7、宋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七个时期。

按照此说，北方的战乱，黄河流域的世家豪族和自由民的大规模、集体南迁，前后延续了160多年，是几代人前后相继的行动。学者统计，西晋末和南朝时，南迁北人大约有90多万，占了整个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

北人南迁地，主要是长江流域，即当时的益、荆、扬三州。而扬州地区，即东晋的政治中心，聚集的南迁汉人最多，大约有26万。而这26万北人主要是山东人和与之相邻的苏北人。这26万山东、苏北人主要迁居在长江南岸的建邺（南京）、京口（镇江）、晋陵（常州）及长江北岸的广陵（扬州）等地。

二、侨寓江左的东莞郡、县

晋元帝司马睿要在江南建邺做皇帝，也就是要把晋的政治、军事中心由洛阳移到建

邳，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支持和保驾护航。现成的、与他关系极为密切就是琅琊王氏。

元帝司马睿与琅琊、与琅琊王氏的关系，历史久远、错综复杂。元帝司马睿，是琅琊王司马伷的孙子，司马睿与其父司马覲均袭封琅琊王。司马睿与琅琊人王导关系密切，王导经常劝司马睿回到琅琊封地去。当司马睿以安东将军出镇下邳时，就请王导为安东司马，做为自己最高最亲近的谋士。

元帝渡江，就是听从了王导的建议，即“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邳。”

元帝渡江时，跟随大量琅琊人，“晋乱，琅琊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

元帝过江后，身边参赞机务的也多为琅琊国人，如琅琊王氏、颜氏、诸葛氏、刘氏等，《晋书·诸葛恢传》载：“时王氏为将军，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任一国之才。”是说元帝过江后特别重用“一国”，即琅琊国的人才。因此，跟随元帝渡江的琅琊人可用万计。为使这些以氏族、家族为纽带，世家与宾客、部曲结为一体的庞大人群扎根江南，在江南能安居乐业，元帝于太兴三年（公元320年），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琊侨民。成帝司马衍又于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60里）境内侨立琅琊郡。为区别原山东琅琊郡，江乘琅琊郡称为南琅琊郡。北方的琅琊郡有临沂县（琅琊王氏就是临沂人），于是在南琅琊郡的江乘界内也设立了临沂县。这样琅琊、临沂这些北方的地名，就随着琅琊人的渡江南迁，也落地江南了。

根据谭其骧先生的统计，南迁汉人有90多万，这90多万北人主要徙居在长江流域，这是东晋政权的政治、军事靠山。为了保证这90多万北人的生活、生计及对东晋皇权政治、军事上的长期有效地拥戴和支持，必须用优惠的政策安抚和维系这庞大的人群。为此东晋政权实行了王导提出的“侨寄法”。

所谓“侨寄”，就是把迁到长江流域的北方人，按照在北方时的州、郡、县名，重新命名新地，如《宋书·州郡志》所载：“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就是说在江南又设立了北方的这些州，但这些州并不在原来的地方，非旧土也。南迁北人是以家族、氏族、村落、乡党、闾里甚至于县邑的群体性迁移，是老少祖孙亲属的整体性迁移。北方人的宗族、地域观念很强，实行侨州、郡、县制，把这些北方人安置到江南，就保持了原来族群、乡里的稳定性，使他从观念、习俗等方面，真正把新居当成自己的家。

“侨寄法”的另一功能就是设立官位，安置南迁士人。南迁后王导劝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用官位来安抚南迁世家豪族。大量设置侨州郡县，也等于大量设置官位。北朝颜之推在《观我生赋》自注中说，中原土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家谱》，东晋政权要依靠这百家，就必须给这百家官职和特权。司马睿登基后实行大赦，文武百官一律升级二等，凡上书“劝进”的官员再升级一等，凡签名“劝进”的平民，也擢升为“吏”，这就必须设置大量官位来安置这成千上万的大大小小的官吏，这也是大量设置侨州郡县的必然。

关于侨州、郡、县的设立，《晋书·地理志》载：“是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帝（元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割吴郡之海虞（《读史方舆纪要》载：今常熟县即古海虞城。）北境，立郟、朐、利城、祝其、原丘、西隰、襄贲七县，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琊、南东平、南兰陵等郡。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属南徐州。”

这段记载说明，元帝时，割海虞北境立了郟、朐等七县；在江乘立了南东海、南琅琊等四郡；在武进立了临淮等三郡。上述各郡、县都属南徐州。

《晋书·地理志》还载：“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东莞、南平昌等郡

以属徐、兖二州。”说明明帝时，又在江南侨立南东莞等十一郡，属徐、兖二州。但南东莞的位置、属县、郡治等，《晋书》无载。《宋书·州郡志》载：南东莞太守，领县三：莒、东莞、姑幕。户1424，口9854。南东莞郡，虽辖三县，但人口并不多，三县只有1424户、9854人。但无论如何，南东莞郡是由南迁的原山东的莒县、东莞县和姑幕县三县的侨民组成的。这1424户，都是三县的那些家族、氏族构成的，史书虽无记载，但可根据文献中那些东莞代表人物的事迹，粗线条地复原出南迁东莞人的发展脉络。

（一）徐邈、臧琨家族

《晋书·徐邈传》载：“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徐邈家族应是侨寓南东莞郡的北人主体。根据《宋书》记载，南东莞郡总户数为1424户，徐邈，可以说是位流民的统帅，由他引领到江左的就有千余户。因此徐邈在南东莞郡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徐邈，少好学，尤善经传，与乡人臧寿（此臧寿与臧琨应为一入）齐名。因此，建元中（康帝司马岳时）为太子前卫率，领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经。

徐广，徐邈弟。《晋书·徐广传》载：“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家世好学，至广尤为精纯，百家术事，无不研览，著成国史，迁骁骑将军，领徐州大中正，散骑常史，领著作尚书。”《宋书·徐广传》载：“永初元年（421年）诏曰：‘秘书监徐广，学优行谨，历位恭肃，可中散大夫。’广上表曰：‘臣年时衰耄……臣坟墓在晋陵，臣又生长京口，恋旧怀远，每感暮心。’”徐广生长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墓地在晋陵，晋陵应是这个家族的居地。晋陵，原毗陵，今江苏常州市。因此，徐氏家族的居地在今江苏常州。

徐豁，东莞姑幕人，父徐邈，叔徐广。晋安帝隆安末，为太学博士。桓玄辅政，为中外督都。永初初，为徐羨之镇军司马，尚书左丞，山阴令。元嘉五年，以为持节，督广交二州军事，广州刺史。

臧焘，东莞莒人，武敬皇后兄，宋武帝刘裕的妻舅。《宋书·臧焘传》载：“少好学，善三礼，操行为乡里所称。晋孝武帝太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谢安侄）举焘为（国学）助教。”晋孝武帝太元中，臧焘被谢玄举为国学助教。谢玄出兖州刺史时在江北的广陵（今扬州）。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加领徐州刺史，身兼兖、徐两州刺史，北府兵的首领，就把广陵和京口（今江苏镇江）连为一体。同此推断，初任国学助教的臧焘，是在江左，不是在山东的东莞。《宋书·臧焘传》还有如下文字：因母家贫，臧焘和其弟臧熹，弃临沂令之官位，回家躬耕自业十余载，父母丧亡，居丧六年。可见臧焘曾任南琅琊临沂县令。宋高祖刘裕镇京口时，与焘书曰：“顷学尚废弛，后进颓业……想复弘之。”于是臧焘“参高祖中军军事，入补尚书度支郎，改掌祠部。”说明臧焘是刘宋朝中的重臣。《宋书·臧焘传》还言：“时太庙鸱尾灾，（臧）焘谓著作郎徐广曰”，说明臧焘与徐广同为刘宋朝中的大臣，是同僚。

臧熹，臧焘弟，好经籍，习骑射。“行参高祖镇军事，员外散骑侍郎，领东海太守。”

臧质，臧焘之子，是个出类拔萃的文武之材。《宋书·臧质传》载：“质年三十，屡居名郡，涉猎史籍，尺牍便敏，既有气干，好言兵权。太祖谓可大任，欲以为益州事，未行，徵为使持节、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徐兖二州刺史。”

（二）刘穆之家族

刘穆之，东莞莒人，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世居京口，少好《书》《传》，博览多通，与宋高祖刘裕患难之交，是高祖的左膀右臂，如高祖所曰：“前将军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作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岂臣以寡乏，负荷国重，实赖穆之匡翼之益。”刘穆之晚年为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入居东府，总摄内外。

元兴十三年（公元417年）刘穆之卒。刘裕称帝后，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并叹曰：“穆之不死，当助我治天下。”

刘穆之三子，长子刘虑之，仕至员外散骑常侍；中子刘式之，通易好士，累迁相国中兵参军，太子中舍人，黄门侍郎，宁朔将军，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少子刘贞之，中书黄门侍郎，太子右卫率，宁朔将军，江夏内史。

刘秀之，东莞莒人，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世居京口。祖刘爽，尚书都官郎，山阴令。父，刘仲道，高祖克京城，补建武参军，与孟昶（丹阳尹）留守，事定，以为余姚令。刘秀之天生聪慧，徐广外甥、尚书祠部郎、南台治书侍御史何承天以女妻之。景平初，为无锡、阳羨、乌程令；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元嘉二十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宁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刘秀之善于为政，躬自节俭，政甚有声。卒后，上甚痛惜，诏曰：“秀之识局明远，才应通畅，诚著蕃朝，绩宣累嶽。可赠侍中、司空、持节、都督、刺史、校尉如故，并赠封邑为千户。谥为忠成公。”可见刘秀之在刘宋朝廷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刘钦之，刘秀之兄，为朱龄石右军参军，出为无锡、阳羨、乌程令。

刘粹之，刘秀之弟，晋陵太守。刘粹之既然为晋陵郡的太守，刘粹之家居应在晋陵（今常州），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南东莞在今常州地域。

《刘岱墓志铭》中的刘氏族。1969年，在江苏省句容县袁巷公社小龙口出土《刘岱墓志铭》，铭文摘要如下：

“齐故监余杭县刘府君，高祖（刘）抚，字士安，鼓城内史；曾祖（刘）爽，字子明，山阴令；祖（刘）仲道，余姚令；父（刘）粹之，字季和，大中大夫；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刘岱，字子乔，山阴令淬太守事，左迁尚书札白衣，监余杭县。”

铭文清楚记载，刘岱（刘府君）是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人；刘岱的父亲是刘粹之，大中大夫；刘岱的祖父是刘仲道，余姚令；刘岱的曾祖父是刘爽，山阴令。墓志铭中的这些记载，与《宋书·刘秀之传》中的如下记载：刘秀之，东莞莒人，祖（刘）爽，山阴令；父（刘）仲道，余姚令；弟（刘）粹之，晋陵太守，完全相合。刘岱是刘秀之弟刘粹之的儿子，刘秀之的侄子。既然刘岱是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人，刘秀之及从叔刘穆之等刘氏家族，其南迁后的居地也是南徐州东莞郡莒县。



士族南渡（绘画）

（三）东莞郡县的具体方位

臧焘家族、刘穆之家族，都是南徐州东莞郡莒县人，徐邈家族是南徐州东莞郡姑幕人，南徐州的东莞郡及所属莒县、姑幕县的具体方位在何处？

宋《九域志》载：“东晋侨置南东莞郡于晋陵南境，侨置莒县为治，又侨置姑幕等县属焉，此其旧址也。今有大姑、小姑二城，《祥符图经》晋陵县西有传落城，或曰即姑幕城，音讹也。”

南宋《毗陵志》载：“晋陵境内尚有南兰陵、南东莞等到侨郡，及莒、东莞、姑幕等县。”

《武进县志》载：“323年，在晋陵境内侨置南东莞郡和莒、东莞、姑幕三县。”

粗略地说，南东莞郡就在晋陵南境，大致在武进县境，即今常州南境。

但《宋书》刘穆之、刘秀之传均载，他们是东莞莒人，“世居京口”。为什么不说法“世居晋陵”，而说“世居京口”？

“世居京口”的第一含义，是刘穆之、刘秀之之父、祖、曾祖等先辈已久居京口，刘穆之这一辈，不是第一代南渡的徐州移民；“世居京口”的第二个含义，即“京口”是个宽泛的概念，泛指一个大区域。

通过《刘岱墓志铭》类推，刘穆之、刘粹之的曾祖刘抚，是晋代人物、彭城令，应是东莞南迁的第一代移民；二刘的祖父刘爽，东晋尚书都官郎、山阴令，是东莞南迁的第二代移民；二刘的父亲刘仲道，晋余姚令，已经是东莞南迁的第三代移民了。刘氏家族世代为官，刘抚、刘爽、刘仲道，都是东晋政权下辖的南徐州的官吏，有的还是北府兵的将领，而京口是徐、兖、幽、冀等各侨州的治所，又是北府兵的大本营。用军事术语说，京口是个大军区、大防区，下辖长江下游北岸的若干军事要地，《晋书·蔡谟传》载：“是时，谟所统七千余人，所戍东至土山，西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因此京口防区，含晋陵地域。在这个大区域内，有大量的侨寓郡县。田余庆先生也有相同的说法，他说：“京口、晋陵地区自然条件虽然不好，但多空荒无主之地，可以容纳相当数量的流民，从而又可以从流民中简拔士卒以为北府之用。郗鉴率部过江后能够长期在京口立足，而且始终拥有实力，背景就是如此。”

再就是历史上京口和晋陵有个互为隶属关系的阶段。京口，古丹阳，秦汉称丹徒、京口。因此，京口、丹徒实为一地，在今镇江。但《宋书·地理志》载：丹徒，本属晋陵，秦改曰丹徒。孙权嘉禾三年，改曰武进。晋武帝太康三年，复曰丹徒。按此说，丹徒就是武进，而丹徒是京口，因此京口也就是武进。

《宋书·地理志》还载：“晋武帝太康二年，立毗陵郡，治丹徒，后复还毗陵。永嘉五年，元帝改为晋陵。始自毗陵徙治丹徒。太兴初，郡及丹徒县悉治京口。”这里也说，毗陵（晋陵）治丹徒，而毗陵（晋陵）郡及丹徒县悉治京口。

按照上述记载，京口就是丹徒，而丹徒就是武进。由于推论，“世居京口”与“世居武进（今常州）”在当时侨寓地重叠、杂乱和朝令夕改的特殊情况下，具有相同的含义。

徐氏、刘氏家族的准确居地在那里？徐广说“臣坟墓在晋陵，臣又生长京口”，这应该是个最有说服力的注释，即徐、刘家族，就职、生活在京口，但家族居地在晋陵。



颜真卿：刀光剑影度一生

王爱军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这首熟悉的《劝学》诗，出自唐代的颜真卿之手，然而真正让他名动天下的并不是诗，而是书法。他的书法丰腴雄浑、骨力遒劲，与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不过比他的书法更让人惊心动魄的，是他一辈子刀光剑影的人生。

为拜名师两次辞官

颜真卿是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祖籍为山东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他出生于诗书世家，五世祖颜之推曾写下著名的《颜氏家训》。不幸的是，在颜真卿3岁那年，父亲就病故了，家里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贫困。



颜真卿继承了良好的家族文化基因，他非常喜欢读书，文章写得很漂亮，但他对书法情有独钟。这让母亲很为难，吃饭还是问题，哪儿有钱去买那么多笔和纸供他练字呢？

颜真卿看出了母亲的心事，有一天，他手里拿着一只碗和一把刷子，高兴地对母亲说：“我有不花钱的纸笔了，您别发愁了！”母亲疑惑地看着他。他说：“这只碗是砚，这把刷子当笔，黄泥浆可以当墨！”他在碗里装满了泥浆，走到墙壁前挥笔写了起来，写满后又用清水把字迹冲洗掉，说：“这就是纸啊！”

母亲笑了，颜真卿也因此练就了一手好字。

26岁时，颜真卿考中了进士，在朝廷里当了校书郎，后来又外放到醴泉（今陕西省礼泉县）任县尉，负责管理地方治安。这件工作相当繁杂，起早贪黑，没日没夜，但颜真卿总要挤出时间练字。人们看到他写的字，都赞不绝口，可他内心里却十分苦恼，因为字写到这个程度，没有名师的指点，就再难有长进了。他想到去拜一个人为师，可想起此人的脾气，又有点犯怵。

这个人就是张旭，擅长草书。他性格怪僻，最喜欢饮酒，为杜甫所列的“饮中八仙”之一（其他7位分别为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璣、崔宗之、苏晋、焦遂）。喝得大醉后，张旭常常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有时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因此被时人送予了“张颠”的雅称。

为了表示自己拜师的诚意，颜真卿毅然辞去了官职，赶到洛阳，投到张旭门下。张旭仔细地看了他写的字后说：“你的字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国家正是用人的时候，你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哪能在写字上花那么多功夫呢？”

话说得很婉转，可颜真卿听得出其中的拒绝之意。他也不敢强求，只好告辞回到了长安。没过多久，他再次在朝廷中得到了任职的机会，可他一直对未能拜张旭为师耿耿于怀，于是又一次辞官。张旭被他的诚心所感动，点头收下了这个弟子。

然而让颜真卿失望的是，入门几个月，张旭要么就是将自己书写的字和前代名家的字帖给他，要他“倍加工学”，要么就是带着他游山玩水、赶集看戏，“领悟自然”，丝毫没有把诀窍传授给他的意思。有一天，颜真卿实在忍不住，对张旭抱怨说：“我来拜门求师，是想得到您笔法的精微秘诀，为什么只让我临帖、参悟呢？”

张旭不高兴地说：“我是见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察笔法之意，见公孙氏舞剑而得落墨神韵，除了勤学苦练和师法自然，哪有什么诀窍啊！”

颜真卿从张旭的话中，明白了为学之道，于是他再也不去寻找捷径，而是埋头苦学，揣摩前辈笔法，把从自然万象中领悟到的神韵凝于笔端，终成一代书法大家。

粉碎了安禄山的“闪电战”

颜真卿学好书法后，再次出仕，曾在朝中任监察御史，可是他也像许多艺术家一样，不通世事，一味耿直，结果在天宝十二年（753年）被贬到平原郡（今山东省德州）任太守。诗人岑参为他送行，不无担心地写道：“郊原北连燕，剽劫风未休。”然而，这个地方最可怕的不是气候的恶劣，而是憋着劲准备造反的安禄山。

到任后，颜真卿“废苛政、黜奸小、除奸诡、进忠良”，深得百姓爱戴。著名边塞诗人高适称赞他“自承到官后，高枕扬清风。豪富已低首，逋逃还力农。”当然，颜真卿对安禄山的野心也心知肚明，悄悄地做起了防范。

颜真卿以防汛为名，修筑城墙、赶制兵器、收揽壮丁，积储粮草。为了避开安禄山的耳目，他每天都一副文人做派，吟风弄月，甚至还亲自主编了一部研究音韵的著作《韵海镜源》。安禄山派人来检查工作，他在好吃好喝好招待之余，还即兴写了一幅字，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著名碑帖《东方朔画像赞碑》。安禄山笑了，把颜真卿真的当成了一只知

道舞文弄墨的书呆子。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起兵谋反，对唐王朝发动了出其不意的“闪电战”。叛军所到之处，守令要么开门出迎，要么弃城匿窜，没有敢勇猛地打一场的。没多长时间，叛军就直逼首都的最后一道防线潼关。唐玄宗李隆基束手无策，狼狈不堪，一边仓皇出逃四川，一边哀叹：“河北24郡，难道就没有一位忠臣吗？”

这时候，颜真卿挺身而出，不等皇帝的诏令，誓言讨贼。他辖下3000兵马很快就扩充到万人，并与时任常山郡（今河北省正定县）太守的族兄颜杲卿约定互为犄角，共同抗击叛军。

平原郡久攻不下，安禄山寝食难安，又气又急。攻陷洛阳后，他派段子光带着洛阳留守李愬的首级，前来招降颜真卿：“看到了吧，如果不投降，就是这个下场！”

颜真卿不为所动，冷笑说：“我认识李愬，这并不是他的首级。来人！把这个叛贼给我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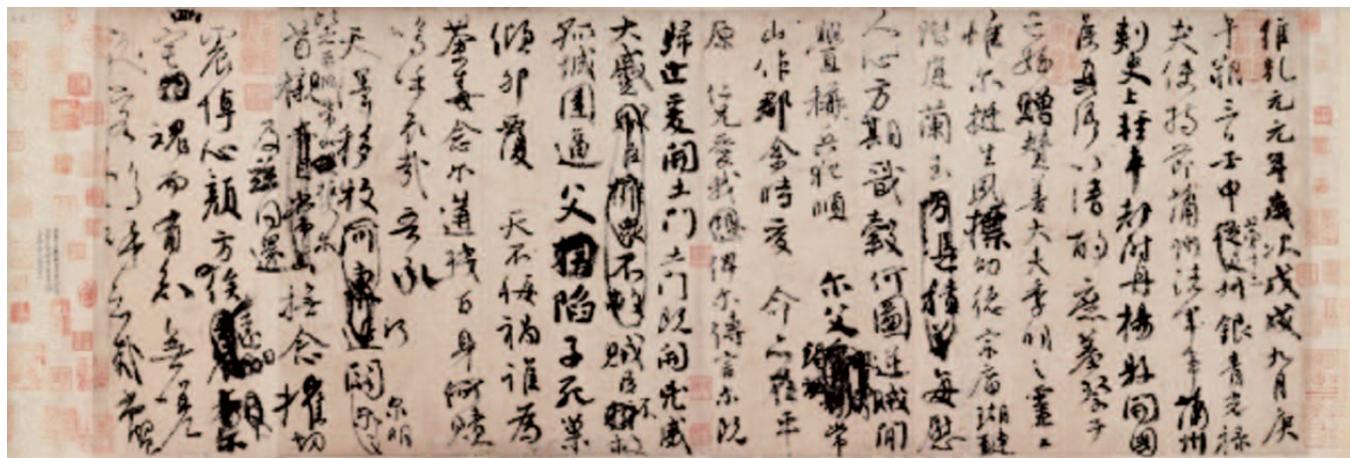
此举一下子稳定了军心，河北17郡又相继归顺朝廷，颜真卿被推为联军盟主，统兵20万，横绝燕赵，军威大震。天宝十五年（756年），他指挥联军在堂邑（今山东省聊城市）大破叛军，歼敌2万余人。

当时，颜真卿手中并没有精锐的部队，凭借的只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武装力量。但他却打赢了安史之乱以来的第一场胜仗，“颜真卿”3个字于是成了一面旗帜，连守在安禄山老巢的嫡系将领刘客奴都派人跟他联络，准备归顺。颜真卿当即派人从水路给他送去了10多万军资，为了坚定刘客奴的信心，他还把自己不到10岁的独子当人质。

河北诸郡的归顺和堂邑之战，截断了叛军和老窝之间的联系，安禄山只好终止进攻潼关，回师河北。颜真卿的这一番举动，为大将郭子仪、哥舒翰等正规军重整军备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唐玄宗听到这些消息，激动地对身边的人说：“我不了解真卿的为人，他做事竟这样出色！”

在这场关乎唐王朝存亡的战斗中，颜氏一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先后有30多人为国捐躯。在常山战役中，颜真卿的族兄颜杲卿寡不敌众，被敌军俘获。安禄山命人将他押解到洛阳，亲自审问。颜杲卿拒绝投降，安禄山当着颜杲卿的面，砍下了他的儿子颜季明的脑袋。颜杲卿大义凛然，痛骂叛军，结果被用铁钩钩断了舌头，依然骂不绝口，最后被残忍地处死。

数年之后，颜真卿满怀悲愤地记述此事，写下了著名的《祭侄文稿》。这篇用行书写成的祭文一气呵成，国仇家恨全部凝聚在了指尖，其中有好几处因为笔写干又顾不上蘸墨而形成的枯笔，让人感受到他当时苍凉悲壮的心情。这幅作品被后世誉为“在世颜书第一”，是唯一可以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比高下的书法珍品。



四朝为官得罪了五个宰相

因为在“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颜真卿被调回中央，深受重用。不过他的文人气质加上嫉恶如仇的性格，让他在充满尔虞我诈的官场显得特别另类。他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肃宗时任过尚书，代宗时被封为鲁郡开国公，德宗时被奉为太师，虽然官一朝比一朝大，但往往都是新帝登基时把他召回中央，提拔不久就因为得罪掌权者而被贬到地方。他得罪过5位宰相，特别不招领导待见，贬职成了家常便饭。

唐玄宗时，杨国忠当宰相，前朝名相宋璟的儿子宋浑得罪了他，遭到贬职处分，满朝大臣噤若寒蝉，没人敢吭气，只有颜真卿站了出来，对杨国忠说：“奈何以一时忿，欲危宋璟后乎？”身为皇帝小舅子的杨国忠脾气非常不好，颜真卿的话虽然只是劝解之言，却让他如鲠在喉，结果就是让颜真卿落得个与宋浑一样的下场。

唐代宗时，元载为相，在朝中结交了许多私党，他怕群臣议论并报告皇帝，就给代宗打了个报告说：“群臣向您上书报告事情，多数都是谗言诽谤，请求每次议论朝政时，先让他们报告给各自的长官，长官报告给宰相，由宰相判断是对还是错，然后再向您报告。”这就相当于从制度上保证每件上报给皇帝的事，都要经宰相过一遍筛子。代宗正为每天乱七八糟的事心烦，就被说得有点心动。颜真卿当即上书批评此事：“古人说，‘苍蝇飞舞声嚶嚶，飞上荆棘停住身，进谗说话没定准，搅乱各国不太平。’所以古代贤君都是广开四方视听，陛下却想自己堵住耳朵、蒙住眼睛，听不清、看不明，那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只准宰相报告事情，这样的事旷古未有，即使是李林甫、杨国忠也不敢公开这样做！”

在颜真卿的强烈反对下，元载堵塞言路之举没有得逞。但没多久，颜真卿就莫名其妙地被贬到硤州（今湖北省宜昌市）。

颜真卿得罪的最后一位宰相是历史上著名的奸臣卢杞。卢杞曾到郭子仪府上拜访，吓得郭大元帅赶紧让家里的女眷回避。后来家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卢杞长得神头鬼脸，女人们看了肯定忍不住要笑，他一定会记恨在心，一旦得志，你们和我的儿孙，一个都活不成！”颜真卿显然没有郭子仪这份智慧，他依然不改爱点炮的习惯，弄得卢杞脸黑得更加难看，准备把颜真卿排挤出京城，落个耳根清静。颜真卿听说了，找到他说：“您先父卢中丞的头颅被安禄山送到平原郡时，脸上满是血，我不忍心用衣服擦，亲自用舌头舔净，就凭这点，您忍心不容忍我吗？”卢杞听了惊惶地下拜，内心则对颜真卿更加恨之入骨。

其实颜真卿得罪宰相，谁官大跟谁对着干，并不是想出风头，而是他为人的一贯理念使然。只要是看谁做得不对，哪怕是皇帝老子，他也敢说敢管，更不用说皇帝身边的那些红人了。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有一幅《争座位帖》，它的来历，最能体现颜真卿的这种性格。

有一年，唐代宗设宴款待从外地前来参拜的郭子仪。按照礼法规定，宴会上文武官员的座位顺序，应该按照官职的大小排列。但负责安排座次的官员郭英义，为了讨好代宗宠信的太监鱼朝恩，竟把官职地位更高的尚书们都排到了鱼朝恩的后面。宴会上鱼朝恩十分得意，时任刑部尚书的颜真卿气愤地对身边的人说：“鱼朝恩不过是个善于拍马屁的小人，没有什么功劳，他的座位凭什么排在前边！”同僚们赶紧劝道：“他是皇上的红人，谁惹得起？还是算了吧！”颜真卿回答说：“不行！这有关国家的尊严，不是件小事。这个座次我一定要争！”

回到家，怒气难平的颜真卿奋笔疾书，不一会儿，《与郭仆射书》（又称《争座位帖》）就诞生了。这篇作品历数了鱼朝恩的种种罪恶，痛斥了郭英义溜须拍马的无耻行

为，笔力雄健，气势夺人，充分展现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成为他的书法代表作之一。

明知是火坑也要往里跳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节度使李希烈叛乱，朝中议论着准备派兵讨伐，这时卢杞悄悄给唐德宗出了个主意，他说李希烈这个人“年少骁将，恃功骄傲”，一般人都看不在眼里，如果能找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去劝说他，一定能“不劳军旅而服”，不用费一兵一卒就能将叛乱平息了。

唐德宗自然很高兴，说：“那派谁去合适呢？”

卢杞说：“颜真卿是朝中元老，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没有谁比颜真卿更合适的了！

满朝文武听说此事都吃了一惊，因为谁都看得出来，卢杞是在借刀杀人。于是不少人劝颜真卿说，你不如以年老体弱为理由推辞不去。颜真卿慨然回应说：“君命也，将焉避之！”说完，他带上诏书，连家都没回就奔向前线了。

事情果然如卢杞所料，颜真卿一到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就被1000多个杀气腾腾的武士包围了，明晃晃的刀剑在他眼前直晃。颜真卿镇定自若，脸上的颜色一点也没改变。李希烈见状，假意喝退了武士，笑着对颜真卿说：“手下人不懂事，您别见怪。这次起兵，我是被逼无奈，还请替我在皇帝面前说几句好话。”

颜真卿说：“你只要归顺朝廷，自然不会获罪。”

李希烈根本听不进劝告，把颜真卿扣押起来。不久，朱滔、田悦等4个同样反叛的藩镇派遣使者到李希烈处，上表称臣，劝他称帝。李希烈很高兴，命人把颜真卿叫来，看一看自己的众望所归。四镇使者借机拍马屁说：“早就听说颜太师有威望，现在李元帅就要称帝号，而颜太师恰好到来，这是上天把宰相赐给元帅啊。”颜真卿厉声喝斥他们说：“说什么宰相！你们知道有个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他便是我的哥哥。我年岁这么大的人了，只知道恪守臣节而死，难道还会受你们的引诱胁迫吗！”4个家伙不敢吱声了。

文的不行，李希烈决定给颜真卿点颜色看看。有一天，他命人在宿舍庭院中挖了一个大坑，然后把颜真卿架过来威胁说：“你如果不归顺我，就活埋了你！”颜真卿神色安然，对李希烈说：“既然我的生死已经决定，何必玩弄花样！赶快一剑砍死我，你心中岂不更痛快些？”弄得李希烈没了脾气。还有一次，李希烈叫人在院子里架起一堆干柴，点起熊熊烈火，然后把颜真卿带到火堆前。一个叛将对他说：“再不归顺李元帅，就活活烧死你！”颜真卿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一句话没说，纵身就向火堆扑去，吓得那个叛将赶忙把他拉了回来。

颜真卿情知难逃此劫，早就从容地做好了准备。他给朝廷写了遗表，给自己写了墓志铭和祭文。在祭文之中，他写道：“天之昭明，岂可诬乎！有唐之德，则不朽耳！”贞元元年（785年）8月23日，颜真卿被李希烈派人勒死于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龙兴寺中，终年77岁。

欧阳修评价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意思是，颜真卿是位君子，他的品德和性格，人们初见也许会心生敬畏，然而愈久会觉得愈可爱。颜真卿的人生如书，把刚直忠烈的品格融入了书法之中；他的书如人生，把字的端庄与道劲化成了处世的性格。这样的书法，让我们钦佩；这样的人，让我们高山仰止。

“柞城故城”考

喜上眉梢

《山东省古地名词典》载：“柞城，亦作柞王城，始建于春秋。遗址在今兰陵县驻地卞庄镇东北4公里处，今称‘柞城故城’。城址轮廓尚可辨识，城周长3915米，有金水河一条为护城河。城内现有城里、北城里、椅子圈三个村庄。城址内曾出土过春秋至汉代的遗物。据传，宋以前城址完好。北宋末年，金人毁此城。后金又重建此城，称柞国，名柞王城。皇统末（公元1148年）国除，城复废。”

除此之外，柞城历史沿革，各种史志资料对此记载极少，城址也曾被俗称为“钟离城”、“凿城”、“绷城”，今通称“柞城”，旧称之名来历无以考证。依据地下丰富的文物遗存，可以断定柞城的史前文化可上溯到大汶口、龙山时代。

柞城故城，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古城遗址。古城周围现有柞城村、柞城前村、柞城大小东村、柞城后村、阚家庄村、柞城西村等七个村庄，古城内包含南城里村、北城里村、椅子圈村三个自然村落。

柞城故城遗址，南北分为大城和北廓两个部分，有点相似“凸”字形：大城在南部，近似矩形，自北南流发源于东北部群山脚下的金水河从北面逶迤而来，向右绕过城东北角后，形成为东面护城河。南城墙长845米，东城墙长1070米，北城墙长905米，西城墙长1095米，一周全长3915米。北廓，处于大城北部，与其紧密连接。北廓部分也略为正方形，因与大城相对应，乡人称之为“小城”，传说是喂马的地方。根据位置与形状综合考察，所谓的“北廓”，或者说是“小城”，很有可能就是古城的“瓮城”。

故城里有一处古文化遗址，东西长280米，南北宽40至60米，上为黄土和灰土，瓦砾遍地，其中包含夹砂灰陶鼎足、灰陶绳纹鬲足、素面灰陶豆等文物残存。城址内还曾出土云纹瓦当和铭字“千秋万岁长乐”瓦当。想必古城以内曾有汉代的大型建筑。

柞城故城遗址北部的高台部分属商代遗址，城址系东周至西汉的故城。近年来，市、县文物部门先后多次对柞城古城进行考古勘探挖掘，在城址周围相继发现了柞城汉墓群，城前村有大汶口到汉古文化遗址，椅子圈有龙山至商周遗址和小北山汉墓群等。通过解剖城墙，发现柞城古城始建于战国，延用至汉，宋代时城毁，城内出土的“茶大夫之玺”铜印和城东小北山出土的“疏大夫规冢”墓碑与柞城在战国时期建城的历史基本吻合。

1974年“文革”之际，在城西岭地上纸房村的一座古墓出土的两件石避邪，为汉代石刻的艺术精品。同时还出土一件错金铭文铁刀，在宽约1厘米厚的刀背上有镶嵌金丝铭文“永初六年”、“五月丙午”、“三十炼”。可以看出，汉代制造刀剑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古人采用“百炼成钢”之法，东汉永初六年（112）的“三十炼大刀”，就是

用“炒钢”为材料，反复锻打“三十次”。无论从刀剑的锻炼之法，还是镶嵌工艺，以及精湛书法，都展示了古人精湛的艺术。该刀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979年，在古城内曾出土一枚桥纽铜方印，印面边长2.6厘米，阴文篆刻五字“茶大夫之玺”。此似战国官印，“茶”应是当时的一个地名，或者古国、古城。

对于“茶”，作者严细考证，在临沂市以北，还真有“茶城”。《山东古地名词典》载：“茶城，春秋古城，据传，辛亥革命前在前茶城二贤寺中曾有一古石碣，碑刻‘茶城，春秋古城，杞梁攻莒，伤股而退之城。亦乐毅攻齐歇马之地。茶城遗址在今莒县城阳镇莒城西北24千米处，果庄河北岸，果庄乡下茶村前。经实地考察，遗址呈正方形，占地240亩。有断续城墙，还有点将台、烽火台等。’”

1980年冬在古柞城遗址内东南隅一个城墙脚下，出土了东汉时期的14件青铜器，其中11件是铜壶，大多采用模铸法或凿刻法雕刻，其中6件带有铭文和纹饰，诸如“元和四年”、“延熹元年造作工”、“永元二年堂狼造”、“董氏造”等铭文。唯有“元和四年”铜壶是柞城古城内出土的汉代精品青铜器。这批青铜器的发现，对于研究临沂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其中铭文“繆公”二字的青铜壶对考证兰陵县历史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铜壶的圈足部位细线阴刻龙形纹，口沿立唇处阴刻隶书铭文“繆公”二字，据地方志记载，东汉至魏晋时期，繆姓为苍山的一个名门望族，有史可考者为汉末名儒繆斐，以忠孝闻名，入仕朝廷，六辟公府举任侍中。繆斐子繆袭，为汉末至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繆斐家族显赫于东汉时期，从其祖籍地理、家族地位来看，这批埋藏的青铜器，极大可能与繆斐家族有密切的联系。迹象表明，这批青铜器有可能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际，在入侵者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主人于逃跑前偷埋于城墙脚下的。

柞城故城，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出土文物丰富，是临沂市保存最好的一座周至汉的土筑古城遗址。1979年被苍山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临沂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12月7日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临沂保卫战

本 编

在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之际，山东省档案馆集中公布了山东抗日战争具有代表性的十个战役战斗档案。首个公布的是抗日战争中具有代表性的临沂保卫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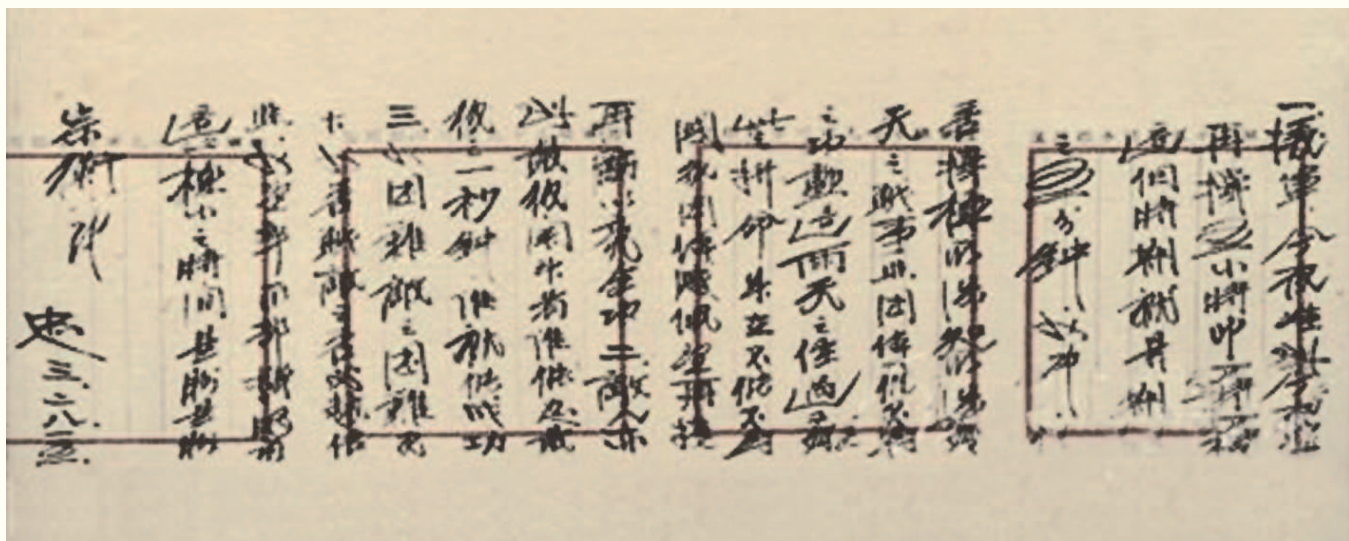
临沂保卫战是台儿庄大战的序幕战，第五战区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和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协同作战，创造出打死打伤日寇6000余人的光辉战绩，奠定了台儿庄大战胜利的基础。



张自忠 国民政府军第五十九军军长



庞炳勋 国民政府军第三军团长兼
第四十军军长



张自忠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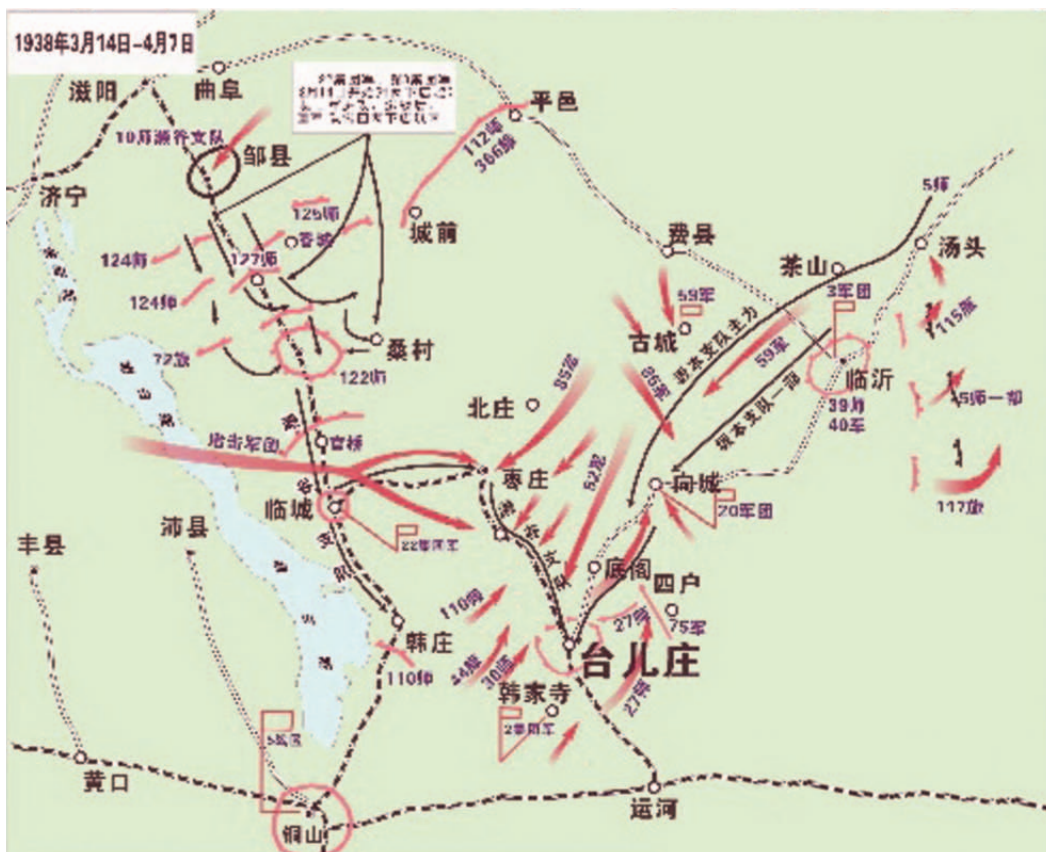
略谈临沂保卫战的某些细节

Gt1952

笔者已过世的老父亲就是当年驻守临沂城防国军地方部队的一个排长。当年，他和他那些不怕死的弟兄们拼死保卫国土，抵抗了鬼子几个月，直到有一天，他的战士发现国军部队纷纷撤退，他才带着他们排里还剩下的9个弟兄从临沂城墙防区撤出了战场，其中一个伤员，他只记得是个河南人，背到半路因伤势过重死去了。国军在抗战初期，也和共军一样，也有辉煌的一页。

下面，笔者分三个方面，描述一下听到的关于临沂保卫战的某些细节。

其一，参加临沂保卫战的国军部队士气高昂。国军高级长官训话不畏日军炮



台儿庄战役示意图

火，鼓励士兵英勇杀敌，“鬼子也是肉长的，也是一枪两个眼”，这是笔者老父亲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应该说国军高级长官在关键时刻起到了表率作用。加之参战士兵大多是本乡本土的山东青年，父母亲人相距不远，守家护院舍得拼命，临阵脱逃者几乎没有，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严阵以待。临沂保卫战一开打，中国军队士气就占了优势。

其二，百姓支前热情空前高涨。沂蒙山人素来豪爽，加之中国军队又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园，临沂四乡乡绅发动百姓杀猪宰牛，担酒送饭，守军阵地上一片欢腾，国军弟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快哉。笔者感觉当时的场面应该赶上了我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阵势。只是，随着战局的恶化，老乡们看着没希望了，才纷纷四乡逃难，到了战役的中后期，老乡们跑的连个人影都没了，别说是老乡送酒送饭了，就连起码的军需都没有保障了，国军弟兄们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饿着肚子和鬼子拼命。

其三，国军打仗充满了智慧。

智慧一：在临沂城的外围有一条河叫沂河，是一道卫护临沂城的天然屏障。沂河上有几座木制桥梁，供两岸百姓通车走人。国军在战役开打前，乘着夜色的掩护，用大锯将水下的桥墩锯开，但并不拆毁桥梁，少量人员依然可以通行。战役开打后，国军放过了日军少量的侦察部队从桥上通过，日军指挥官得意忘形，以为是中国军队逃命要紧，连桥梁都没来得及破坏，立即指挥他的战车部队和步兵从桥上冲过沂河。当鬼子们端着刺刀伴随着装甲车的轰鸣嚎叫着冲上几座木桥的时刻，灾难降临了，由于超载，木桥轰然倒塌，鬼子的车辆人马都栽进了河里，虽然河水不深，不会淹死人，但在水里行动不便的鬼子便成了国军炮兵弟兄的活靶子，只用了点烟的功夫，几十个东洋武士就魂归东洋。

智慧二：临沂城的城墙两面是用青砖砌成，中间用厚实的粘土夯实，非常结实。国军弟兄们就利用这一特点，在城墙上方分距离打下数个竖井，然后向城墙四周开挖，并在城墙的正面掏出上中下三层射击孔，组成了稠密的火网。笔者想，这种阵地应该和后来冀中的地道战非常相似，扬己之长，避己之短；避敌之长，克敌之短，你打我时叫你打不着我，我打你时就要打准你消灭你。实战中，鬼子猛烈的炮火打塌了城墙上的假工事，可躲在地下工事里的国军弟兄们却毫发无损，相反的是，鬼子的冲锋次次都被国军上中下三层火力打的稀烂，鬼子尸横遍野，到死也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智慧三：战役过程中，国军广泛使用中正式步枪，此枪射程远，精度高，故障率低。往往是一个特等射手旁，数个装填手装弹，枪换人不换，标尺三，“小的瞄下沿，大的瞄中间”，快速射击，火力不亚于一挺捷克轻机枪。笔者也曾问过父亲，为什么不使用机枪，电影上火力猛烈的不都是机枪吗？父亲回答，机枪近处杀伤力是不小，但杀伤中远处的目标就不如步枪打得准了，而且弹药消耗量太大，部队打不起。父亲还让笔者看了他的右手食指，他的右手食指确实比他的左手食指粗得多，老爹憨厚的笑笑，告诉笔者，这就是那时扣多了扳机的后果。笔者当时想，这也不见得都是临沂战役的后果，应该是父亲长期军旅生涯形成的。

王小古年谱 (上)

刘瑞轩

1915年 乙卯 1岁

王小古，原名崇古。4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现为灌南县）新安镇繁荣街一户“破茅三两间”的家庭（到十八岁，因父亲经商致富变成地主兼商人之家）。

祖父王兆霖，曾做过地主谢苏州的管家。王小古出生前已去世。

祖母为人勤劳、会织席子。

父亲王映人（1881-1958），字杰甫，上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学过医、卜、星、相。为人正直热情，常替乡邻写状子，打官司，颇受人尊重。年轻时生活贫困，替人织过布。壮年做小贩卖书，曾开一家书店。

母亲于氏（1877-1961），出身中农，勤劳能干，虽不识字，但心灵手巧，会织布、编席、编筐、剪纸。主持家务，对子女管教甚严。

兄长王崇飞（又名小朋），这年三岁。后毕业于灌云师范，做过小学教员、校长。

1920年 庚申 6岁

在家中上私塾。由父亲教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攻读甚勤，不久即可背诗过百，亦学作短句。父亲曾命题写“时人媚俗未可知，早有徐熙卖胭脂”。小古当即口占“等闲纸贵洛阳城，不教崇古一秃笔”。在父亲指导下，每天临池不辍，习写大仿。

1921年-1922年 辛酉-壬戌 7-8岁

继续在家中上私塾。由父亲教念《千字文》、《诗经》等启蒙读物。书上有画，小古“喜欢用小纸仿着画，用毛笔勾线，从不涂改，也不用铅笔、橡皮”。

课余搜集香烟盒内《西游记》《水浒》的彩色画片，作为学画的蓝本，每天把玩观赏。这段家庭启蒙教育，培养了小古对艺术的兴趣和爱好，为以后在艺术上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923年 癸亥 9岁

上私塾。除读《论语》等课本外，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并对书上绣像爱不释手，经常照着描画。至今故乡仍有人保存这时



王小古（1915-1982），中国当代著名画家，原名王崇古，又名笑古。江苏灌南县人。他长期从事美术教育。1952年起调任山东临沂师范，后又在临沂艺术学校、临沂聋哑学校、临沂教育学院任教。历任临沂师范美术教师、临沂教育学院和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曾担任临沂地区工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临沂市政协副主席。生前是中国美协山东分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期画的人物画稿。

1924年 甲子 10岁

兄长崇飞从新安镇完小毕业。兄长二人学习上互相切磋，生活上互相帮助，感情十分深厚。

1925年—1927年 乙丑—丁卯 11—13岁

在新安镇第三完小上小学四至六年级。爱好语文学，吟诗作对受到老师称赞。

上五年级时，参加校演剧队。音美老师王士林多才多艺，对小古影响甚大。王老师为演戏画的大幅布景，令小古大开眼界。于是，买洋红、洋绿等颜色，开始用颜色作画。练习时间长了，也能画出深浅浓淡来。

课外时间，小古经常到镇上有名的花鸟画家王逸岑、陈子培家登门求教。逐渐对花鸟草虫产生兴趣，并尝试对照实物观察写生。

祖母以为“画人画鬼，糊不上嘴”，原本反对小古学画，但有一年端午节，小古根据乡俗，绘制了一批钟馗像，卖了一些钱，祖母一变而为支持画画了。于是购宣纸、毛笔、国画色，正式画国画。亲朋同学时有索画者，使小古名声鹊起，学画劲头更大。

摹仿秦玺汉印、西泠八家，用萝卜、石料练习刻印。

1928年—1929年 戊辰—己巳 14—15岁

患黑热病，在家养息。十四岁时，祖母去世。

1930年2月—1932年7月 庚午—壬申 16—18岁

十六岁考入灌云县中学师范部（一年级下插班），去县城板浦上学，二年半毕业。图画老师潘仲西，系上海美专毕业，特别器重小古，在他指导下，对《芥子园画谱》《古今名人画稿》《海上十大家》等画册，不断进行临摹。对有的佳作背临到逼真的程度。又领到书画收藏家刘竹亭家观摩古代书画，开扩了眼界，画技亦不断提高。同时，广泛涉猎文艺书籍，提高文化素质。

有一次，在课堂上为语文老师画素描肖像，十分逼真，轰动全校。



1930年9月，参加姚万传等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官吏贪污的学生运动，亲自起草呈文，上告县国民党执行委员孙友仁、委员朱颐、李白英。

1932年8月—1933年7月 壬申—癸酉 18—19岁

师范毕业，改名王笑古（意思是有了自立能力，不再崇拜古人）。经潘仲西老师介绍，到板浦小学任美术老师，月薪20元。购《故宫日历》《故宫唐宋元明清画集》二十余册，及《恽南田设色花卉》《恽冰设色花果》等画集，不断观赏、临摹，使画境又一开扩。

这时，家庭由于开“新民官盐店”而暴富，每年收入1500银元。在镇上购置房产十二间，购买土地60余亩，并成为槽坊、布店、中西药房的股东。正如小古晚年在《自叙吟》中所云：“十八家剧变，暴发耻乡邻。”

1933年8月—1934年7月 癸酉—甲戌 19—20岁

经吴养山介绍，到灌云县中正镇精勤小学，任美术老师，月薪26元。后因校长易人而离开。

19岁，在该校结识了苏北画家唐鲁臣，唐收小古为弟子。唐为清代仕女画家王素（小梅）的再传弟子。他既画仕女，又工花鸟，以售画维生。因年老右臂麻痹，不能作画，要小古为之代笔。唐答应将绘画要诀传授给小古。师徒同吃同住三年整，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才分手。后唐鲁臣因爱国被日本鬼子杀害。

从20岁起改名小古，其含意自己解释道：“小则小矣，古也不古；有小方见大，无古不成今。”

1934年8月—1935年3月 甲戌—乙亥 20—21岁

经宋光显介绍，到板浦小学任美术老师，月薪20元。为宣传抗日，在老家为新安小学绘制《日寇铁蹄下的祖国》《济南惨案图》《蠹蚕动态图》等壁画。

1935年3月—1937年8月 乙亥—丁丑 21—22岁

经宣伟宗介绍，到条河小学任校长，月薪28元。1935年秋，创作工笔《自画像》，并题诗一首：“不堪溯问舍求田，弹指韶光二十年。伴得槐庭春日永，笑看人海与人天。”作《李白醉酒图》并题诗。

1936年，由父母包办与李寿祥女士结婚。

1937年8月，与灌云县大伊山的厉铎同学前去投考苏州私立美专国画系。该校设在苏州沧浪亭，校长为著名油画家颜文樑。因日寇南侵，只上两个月即辍学，回乡继续教小学。

1937年底—1938年1月 丁丑—戊寅 23岁

由江位东介绍，到条河小学任校长，月薪28元。后因苏北沦陷离校。

1938年2月—1938年6月 戊寅 24岁

由同学李宗棠介绍到涟水黄圩《消息报社》，担任缮写，月薪15元。因工作不适合己意而离开。

与苏州女诗人曹石兰订交，小古作《石兰草图》相赠，曹以诗答谢：“妾愿变为花上蝶，随风飞舞到君家。”

1938年7月—1940年9月 戊寅—庚辰 24—26岁



由姑父袁茂生介绍到涟水县灰墩区袁家庄任塾师，每月薪水300斤小麦，由学生交给。

1939年2月，灌云县一带沦陷。

在袁家庄，遇到师范同学刘小川、刘家栋和学生王榴来、袁以高等十多人，利用三支步枪、一门土炮，曾两次配合民兵一起打日本鬼子。

因学生生活困难，小古便发挥绘画特长，绘制日寇的钞票，发给学生使用。后被日寇宪兵队得知，派人查办，小古因此逃离。临行前，赋诗一首：“青锋飞快不须磨，常似探囊入鬼窝。四万万民齐有待，山河指日凯旋歌。”

1940年9月—1941年2月 庚辰—辛巳 27岁

为寻求抗日途径，投笔从戎。在江苏宜兴，由王馥白介绍参加国民党江南挺进第二纵队，任四团三营中尉书记，月薪81元。

1941年2月—1941年8月 辛巳 27岁

由王馥白介绍，到溧阳县中任美术教员，月薪60元。因校长调换而离开。

近年，诗咏渐多，得颂百花诗上百首。惜皆散佚。

1941年8月—1942年9月 辛巳—壬午 28岁

由王馥白介绍，到溧阳县田赋管理处任第三科科长，后调任城厢分处任主任，月薪210元。

因学火画，鼻孔被熏烤流血，累月未愈，只得回乡养息。

1942年，长子开微出生。

1943年 癸未 29岁

在新安镇家居养病。本年夏，奉区长程昆峰之命，与汪凤洲、惠赉虞等人一起修《新安镇志》，并写序，画程昆峰的祖先程彭像。

在自家画室，临摹宋代花鸟画、恽南田没骨花卉及王石谷的山水等名画。

为朋友卜星光画《鹰雀图》，题曰：“个中滋味难民尝。”

1944年 甲申 30岁

拒绝干汉奸小学校长。由周影珍介绍到新安镇北大周庄任塾师，每月薪300斤小麦。次子开明出生。

1945年 乙酉 31岁

清明节时，被土匪绑架，半路逃脱，到大吴庄同学吴书家，辗转回乡。

是年，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卜星光、周欣等接触，受到进步思想影响。曾送信给卜星光使之逃脱，免遭逮捕。为抗日武装滨海大队连长刘班绘制新安镇详细地图。帮助同学唐世琦了解镇上日伪军人数。为我部队收复此镇提供了保证。

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

姓氏百家漫谈——周姓 (下)

赵丹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中共领袖之一（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大后任中央副主席）和共和国开国总理及全国政协主席，与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前几个五年计划都是由他亲自主持制定并组织实施的。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战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教科技工作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均给予了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其中如“两弹一星”的立项与组织研制等，都凝聚了他的心血。他主管制定并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政策，他在万隆会议上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他先后出访亚、非、欧等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的世界各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为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其中，他和毛泽东紧密配合，巧借“乒乓外交”（俗称以小球推动地球），以超人的智慧与交际艺术，打破坚冰，实现中美、中日关系的历史性突破，即是明证。从新中国成立到他逝世，中国已与1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成功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中间，有些外交工作还是与军事斗争密不可分的，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作为主持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与毛泽东一起指挥了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又亲自领导了中国代表团与美国的停战谈判，并组织实施了对朝鲜战后恢复、建设的援助工作。他的这一非凡的外交才干与精湛外交艺术，赢得了世界上众多领导人的衷心佩服与称赞，尼克松、基辛格和田中角荣等美、日领导人均对他的非凡智慧和彬彬有礼的风度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肯定和赞扬，称其不愧为世界级的伟人。其中基辛格称“周恩来是我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的最有魅力的人”。并说“他含蓄、敏感的风格帮我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许多隐患”。当他于1976年1月逝世后，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布托在唁电中这样



写道：“亚洲一盏伟大的明灯熄灭了，人类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文革”期间，在那个沧海横流的动乱年代里，周恩来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为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破坏，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维持国民经济建设，特别是在林彪集团被粉碎后，迅速启动文化科技教育的各项建设，解放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和民主人士出来工作，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等，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以致身心交瘁，一病不起。1975年，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他拖着病体作政府工作报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号召，鼓舞了八亿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

记述周恩来为党、国家和民族所做的丰功伟绩，不能不提到他的人格魅力。众所周知，周恩来在党内外、国内外均享有极高的声誉，作为中共党的领袖之一和开国总理，他既是党性楷模，亦是人性楷模，在他身上，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实现了最为完美的结合。他的感人魅力，不是来自抽象的理论和空泛的号召，而是来自他七八十年如一日的身体力行：他有一颗伟大的爱心，善于体贴他人、关爱他人。如他和张学良于1936年4月9日第一次在延安会见后，两人便结下了终身不渝的友谊。1962年，周恩来通过辗转数次的渠道，为被幽禁于台北的张学良送去了由他用毛笔书写的一封密信，此信只有16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这封信怕万一被人发现后会给张学良带来新的麻烦而没有署名的信，使与世隔绝的张学良夫妇在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慰藉。周恩来在病危时，还数次嘱咐有关部门负责人，千万不要忘了幽禁于台湾的张学良。上世纪50年代，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学者马寅初在其撰写的《新人口论》中首次提出了“要控制人口增长”的论点，并将其作为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马寅初的这一利国利民的真知灼见非但未受到最高领导人的重视，反而因此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继而被罢官。后来在国内广为流传的那句“错批一人，多生三亿”的苦涩总结语，即源于此。此时，正值“反右”斗争席卷全国之际，有关部门主张将马寅初划为“右派”，周恩来闻讯后严正指出：马寅初有骨气和正义感，是有名的经济学家，不能将其划为“右派”。由于周恩来的坚决制止，马寅初方幸免于难。1972年，91岁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周恩来接到其家属联名写的要求动手术的报告后立即批示：“医院应当从手术着想，组织会诊。议后望告。”卫生部接到总理批示后，当晚即转告北京医院，参加会诊的专家们无不为了总理对老知识分子的殷切关怀所感动，决心尽全力动好手术，以挽救马老的生命。后手术非常成功，马寅初得以活到105岁高寿。周恩来病逝后，悲痛欲绝的马寅初坐着轮椅向总理遗体告别。当轮椅围绕总理遗体转完一圈后，马寅初又坚决要求再转一圈。绕完第二圈后，他又提出要站起来向总理遗体鞠躬。家人只好将其搀扶着，向周总理遗体行了令人动容的鞠躬礼。原红极香港的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本名邝健廉）受祖国感召，于1955年回到广州。翌年，她进京演出，周恩来自己掏钱买了戏票，悄悄来到前门外的大众剧场观看了她和马师曾演出的《搜书院》。周恩来对她的精湛表演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称“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后周恩来在广州开会时，还特意去华侨新村看望红线女与她的老母亲。周恩来逝世后，红线女一直将周恩来晚年的那张油画像庄重地安放在家里正中的茶几上。

“文革”中，周恩来尽其所能地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和知名人士。1972年，继陈毅之后，中央统战部长徐冰、一机部长陈正人和内务部长曾山相继去世，极大地触动了周恩来，他不顾江青一伙的阻挠，下令要求卫生部立即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无论这些人是否“解放”，应一律接回城市检查身体。不少老干部后来动情地说，正是由于总理给了这次机会，才保住了他们的性命。周恩来不仅对革命老干部、科学家、文化名人给予了关心与保护，他心中时时挂念的还有广大劳动人民。1961年，他出访归来，翌日的报纸上

即刊出新闻稿，称“周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周恩来看到该报道后即把值班人员叫来，用手指着报纸说：“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他接着指出，天灾人祸搞得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我作为总理，居然还“神采奕奕”，这样宣传，“上不合乎国情，下不安于民心”。1973年，周恩来陪同来华的越南领导人访问延安。当他看到曾用小米养育了革命的延安人民生活还十分清贫时，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当天，他与延安地委的负责人就如何扶贫问题长谈到深夜。至西安后，他又对前来送行的延安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反复叮咛和交代：中央一定给特殊的政策发展老区经济，你们一定要带领人民群众将延安的生产搞上去，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历史记载，在打天下的中共领袖们中，周恩来是唯一一位在革命胜利后重回延安的中央主要领导人。

周恩来清廉如水，公私分明。他外出视察工作，连茶叶都是自带，从不枉花公家一分钱。周恩来在外交场合十分注重自己的仪表，因为他是八亿人民的总理，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形象。1971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周恩来的外事活动骤增。每逢有重大的外事活动，他总要先到北京饭店来理发。由于过度劳累，总理理完发后，往往便躺在理发椅上睡着了。十几分钟后，总理打盹起来，多要在此吃一碗面条，然后赶往人民大会堂去与外国贵宾会见或会谈。每次饭后，他均吩咐秘书如数付理发费，交饭钱和粮票。总理认为，从中南海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理发，这段路程应算作是私事，故每月都要从其工资中扣除一定数额的钱交作车费。

周恩来作风严谨，求真务实，为了顾全大局，他任劳任怨，有时甚至忍辱负重。他从不允许突出宣传自己，一生甘为绿叶。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他谨慎低调，但广大人民对他的丰功伟绩却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与邓颖超没有子嗣，却抚养了如李鹏、孙维世等一批先烈遗孤，同时把大爱倾注给了亿万人民。正如一首歌所唱的那样：“总理您把心血拧成线，为咱人民做衣衫。”他那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高尚品德与行为，深深感动了亿万干部群众，赢得了人民的真挚爱戴与拥护。当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的噩耗传来时，神州大地立刻沉浸在无比悲痛的海洋中。全国人民冲破“四人帮”的阻挠，自费购配黑纱（不少人在黑纱上还绣有“国孝”二字），为无儿无女的好总理戴孝送终。是日，笔者所在的临沂被一层厚厚的霜雪所覆盖，沂蒙大地一片缟素。老人们都说，这叫天地同悲，百草戴孝。在首都北京，百万人伫立于寒风中哭送总理的灵车。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花圈如山，天安门广场上贴满了千万首悼念总理的诗词，其中有两首诗，至今令笔者铭记于心。一首写道：“相逢无语泪先盈，启齿欲言已失声。万众一心由衷曲，愿将百死换一生。”另一首则写道：“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撒万家。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有年年一月八”。笔者之所以能记住上述两首悼诗，因为它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心声，是那个悲痛的日子里人民悼念总理的真实写照。

“功与日月长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周恩来总理已离开我们近40年了，但不少人至今一提起“敬爱的周总理”，仍然热泪盈眶。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神州大地，对周恩来总理的思念与崇敬，不仅仅是在庙宇高堂，而是深深植根于百姓们所居处的市井坊间。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已镌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在中国，不仅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铭记着周总理，就是那些90后乃至新世纪出生的孩子们亦都怀念着这位从未谋面的周老爷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涌现出一百多个“周恩来班”，“周恩来精神”的传承可谓后继有人！“周恩来精神”具有自己独特的“DNA”，那就是奉献、担当、坦诚、亲民。正是这些基因决定了其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地位与特质。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时代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更需要继承和弘扬“周恩来精神”。一位哲人说得好：“周恩来精神”是中国精神瑰宝中无可取代的经典，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世世代代”。

在绍兴周氏族中，还有一位与周恩来同宗的伟人，他就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

迅。鲁迅，本名周树人。1918年5月，他首次使用“鲁迅”这一笔名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大胆揭露批判了人吃人的封建礼教，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他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猛烈抨击封建文化与封建道德，成为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上世纪20年代，鲁迅陆续出版了《呐喊》《坟》《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及续编等专集，中篇小说《阿Q正传》和短篇小说《孔乙己》《药》《祝福》等家喻户晓的代表作。其中《阿Q正传》塑造了阿Q这一不朽的文学典型，批判了一些麻木的国人以“精神胜利法”进行自我安慰，以图苟活的劣根性。从1927年至1935年，他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杂文集。鲁迅的小说，思想深刻，艺术纯熟，语言传神，其笔下塑造的许多人物，如阿Q、孔乙己、华老栓、祥林嫂、闰土等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艺术典型。他写的杂文，不少是政治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精品，具有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坚韧的战斗精神，被誉为投枪和匕首。

鲁迅还是一位革命家。他在进行文学创作、学术论著和译校工作的同时，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展反文化围剿的革命斗争，对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他还编著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辑录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鲁迅善诗，其诗作多为格律体，兼具极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其中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等，已成为广为传诵的名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还涌现出一位红军初创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就是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周逸群。周逸群早年留学日本，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二期学习，系该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作为周恩来所器重的学生，他受周恩来教益与影响颇深。1927年，时任北伐军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师师长的周逸群，率部随周恩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翌年，与贺龙一起开辟湘鄂西苏区，创建工农革



命武装。后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委，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几大代表性苏区和红军几大主力之一的重要领导人。1931年，周逸群遭敌伏击壮烈牺牲。

在民主革命早期，在临沂地区还有一位令人景仰的周姓革命先驱，他就是沂水同盟会负责人周建镐。周建镐，字次丰，号瑞麟，后多以名号行。为寻求救国之道，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赴日本留学。其间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成为沂蒙地区最早的同盟会先驱之一。1906年回国后，奔走于沂蒙山区，宣传革命思想。翌年，他创办了沂水县第一公学，以此为基础，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同盟会员。1908年2月，又创办了沂水第二公学，在其影响下，该校教师和年龄大的学生大都参加了同盟会。1909年，山东同盟会负责人刘溥霖（亦系沂水人）在济南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但经费匮乏。周瑞麟得知沂水县署要向省解款的消息后，遂驰告刘溥霖，使该款于押送途中被革命党人截获，充作革命活动的经费。1914年2月，周瑞麟被反动当局逮捕，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最后死于济南狱中。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在沂水建立“瑞麟小学”，以纪念这位民主革命先驱。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后期，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因敢于抵制“大跃进”运动的左倾思潮而闻名全国。周小舟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翌年8月赴延安，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建国后，先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这位毛泽东主席的湘潭老乡，生性耿介，心胸坦荡，当他看到“大跃进”运动给湖南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后，便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果断下令在全省解散了农村公共食堂，挽救了一大批农民的性命，成为全国范围内最早解散人民公社食堂的省份，比中央下令解散食堂的时间早了近两年。在其后的庐山会议上，他与黄克诚、张闻天一起大胆支持彭德怀对“大跃进”左倾错误的批评意见，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忧国忧民、勇于担当的政治品格。结果，他随即被定为“彭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遭到错误批判和组织处理。1979年，在周小舟去世13年后，其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在科教界，一批周姓人士颇有重要建树。其中，周培源系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1928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工学院博士学位。1955年任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在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流体力学湍流理论方面，均有重要研究成果。如在湍流理论研究中，提出用求剪应力和三元速度关联函数满足黏性流体的动力学方程的方法，创立了先求解后平均的湍流理论。作为教育家，他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并任北大校长，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周仁系中国钢铁冶金学和陶瓷学的开创者。他研制成功电炉炼钢，开我国这一高科技工艺的先河。他在对中国历代古瓷进行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景德镇陶瓷的研究》等学术专著。周志宏亦是一位著名的冶金学家，曾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上海宝山钢铁总厂首席顾问。作为我国研究金属内部组织的开拓者，他在钢中魏氏组织和马氏组织的形成与机理研究方面有重要贡献，在我国较早研制出钨铁、硅铁、高速钢、冲模钢、磁钢和不锈钢等。他提出并试验成功氧气顶吹转炉炼钢法，应用该理论于1967年在上钢一厂建成了我国首座氧气转炉，被誉为钢铁冶炼技术上的一次革命性创举。周同惠系中国著名分析化学家。中科院院士。他在药物中，



周培源（速描）

创立了几十种合成药和植物药成分的分析方法，在将电化学分析和各种色谱技术用于药物分析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1986年，他负责筹建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在对国际奥委会禁用的五大类百余种药物的气相色谱、高效液相色谱及气质联用的检测和确证方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在社科研究和文学艺术领域，周姓亦不乏造诣精深和成就斐然的大师级人物，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有：周汝昌系著名红学家。他于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被学术界誉为内容博赡的红学研究巨著。其所著的《曹雪芹小传》，是公认的研究曹雪芹身世、生平的唯一系统而全面的学术论著。所著的《恭王府考》，对大观园历史原型研究方面，作了新的探究。周谷城系著名历史学家。曾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等。他在美学、逻辑学和社会学方面亦颇有较深的造诣，撰有《中国社会史论》和《史学与美学》等。周鲠生系著名国际学家。在我国外交与立法方面有重要贡献。所著《国际法》一书，概括了近、现代国际法学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法学界具有重要影响。

周立波系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等。《暴风骤雨》是最早反映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则围绕农业合作化运动对社会、家庭及个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两部长篇前后相联，可谓反映中国农村变革的史诗性巨著。197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周立波的作品思想深刻，笔调轻松幽默，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个人风格，他与孙犁、赵树理和柳青一起，被誉为描写中国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四大圣手”。周而复亦系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白求恩大夫》《燕宿崖》和《西流水的孩子们》等。周巍峙系著名作曲家和音乐活动家。历任中央实验歌剧院院长、文化部代部长等职。他参加并领导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的创作。代表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周璇系电影演员和著名歌唱家。她出身贫寒，1930年辍学习艺，先后在上海明月歌舞团和新华歌剧社从事声乐演出，有“金嗓子”之誉。1937年在影片《马路天使》中与赵丹合作，成功塑造了歌女小红的艺术形象。所唱《四季歌》和《天涯歌女》声情并茂，婉转悠扬，成为广为流传的经典歌曲。周信芳系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艺名麒麟童。他继承和发展民族戏曲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善于通过外部动作表达人物的内心感情，注重吐字行腔，演唱苍劲有力，充满激情和气势。一生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表演风格，在京剧界影响甚广，世称“麒派”。代表作有《四进士》《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清风亭》等。出版有《周信芳戏剧散论》和其艺术经验集《周信芳舞台艺术》等。

从《沂蒙革命根据地志》 看沂蒙红嫂和红嫂精神

张 丽

《沂蒙革命根据地志》，由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耗时4年编修而成，今年6月出版发行。志书分上下两册，200多万字，共十卷，首设概述，卷后设附录。时限上起1921年7月1日，下迄1949年9月30日，记事范围突破临沂行政地域限制，以沂蒙山为中心，鲁中、鲁南、滨海地区为主。志书系统详实地记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沂蒙革命根据地创建、形成、发展以及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全过程，堪称“一方之全史”。

《沂蒙革命根据地志》中有大量沂蒙红嫂事迹的记述，本文撷取其中精华并进行归纳总结，从沂蒙红嫂的群体形象、组织形式、主要活动三个方面挖掘红嫂们的光辉事迹，浅析沂蒙红嫂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发掘沂蒙红嫂精神的时代价值。

——题记

据《沂蒙革命根据地志》（以下简称《根据地志》）记述，1939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进沂蒙山，临沂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和华东地区的党政军首脑机关长期驻扎在这里。临沂作为山东和华东解放区的首府，曾被誉为“小延安”。“村村有烈士，乡乡有红嫂”，沂蒙地区420万人中有120多万群众参军支前，15.5万名妇女以不同方式掩护了9.4万革命军人和抗日志士。这一组组撞击人心的数据，是沂蒙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革命斗争史，其中焕发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凝聚成了荡气回肠的沂蒙精神。众多的“沂蒙母亲”、“沂蒙红嫂”和“沂蒙姐妹”，正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涌现出来的沂蒙巾帼的典型群体，千千万万个英雄的沂蒙女性的光荣事迹也凝聚成了一股感人至深的力量——沂蒙红嫂精神。

一、沂蒙红嫂是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女性的群体形象

沂蒙红嫂，是对沂蒙山区一个伟大母性群体的称谓。从乳汁救伤员的红嫂原型明德英，掩护战士和伤员、办地下托儿所、保护党的绝密文件的“沂蒙母亲”王换于，到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站在冰冷的河水中肩扛门板搭成人桥的李桂芳等32名沂蒙女性，沂蒙妇女中涌现出大批支前模范。她们家喻户晓的事迹谱写了一曲

曲血乳交融的军民鱼水情，这种大仁大义和至善至爱的慈母情怀成为人类战争史上惊世骇俗的绝唱。

沂蒙乡乡有红嫂。《根据地志》中，不仅浓墨重彩详细记述明德英、王换于、祖秀莲、李桂芳等典型人物的光荣事迹，还将已故红嫂陈元君、乔洪玉、尚梅兰、张发荣等的事迹收入人物志专门记述，更加大力气搜集和挖掘之前鲜为人知的抗战女性，把她们的的事迹贯穿战事的记述中，使沂蒙红嫂拥军参战的群体形象范围大大扩展，形象更加丰富，有些实录姓名，有些却只留下姓氏。她们为掩护伤员舍生忘死，受尽酷刑；为抢救伤员的性命，以性命相博；为护理伤员，历尽千辛万苦；为保存党的机密文件，与敌人斗智斗勇。

沂蒙红嫂的形象和事迹，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女性与战争的故事。有人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但是当战争的炮火无情地摧毁家园和亲人时，经过血雨腥风洗礼的女性就无法退隐到战争的幕后。相反，变得柔韧而坚强的女人会参与到抗战中来。如果说用自己的乳汁救护伤病员的明德英一开始是缘于母性的博爱和对军队的报恩之情，那么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影响和培育，沂蒙人民的反抗和斗争渐渐由一种自卫状态进入一种自觉的情境之中。“早期凭靠质朴的本能、原始的同情为革命贡献自己力量的红嫂们也逐渐转化为自觉地、有意识地直接参与革命斗争，更有许多先进红嫂光荣地加入到党的队伍当中来，成为革命队伍的先锋和骨干。战争消灭了人性，沂蒙红嫂的人性却在战争中得到升华。”从此，“忠诚博爱、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沂蒙红嫂，成为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女性的形象代表，永远铭刻在革命历史丰碑上。

二、沂蒙红嫂拥军支前的组织形式

沂蒙妇女世代栖息在穷乡僻壤，受尽了旧社会的凌辱和压迫。在党的引领下，饱受压迫的广大农村妇女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出家门，走上社会，参加



识字班，加入妇救会，从家庭到社会，从生活到政治，以空前的姿态与速度，向妇女彻底的解放奋斗着。随着沂蒙妇女们参与革命的意识逐渐转化为自觉，她们参与革命斗争的组织形式也逐渐从个人走向集体。

（一）个人和家庭

沂蒙红嫂战前战后的忙碌，基本都以家庭为依托，凭借个人高尚的觉悟，付出繁重的个体劳动，并积极动员亲人投身革命事业中来。为了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沂蒙妇女打破了“儿子是父母传宗接代的希望，丈夫是妻子的顶天柱”的传统观念，涌现出了大量“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事迹。“一门双英”、“一门三英”、“一门四英”的模范家庭，几乎每县每区都有，甚至出现了“一门七英”的罕见典型。《根据地志》中还记述了，动员未婚夫参军的郯城县劳动模范孙桂英，开夫妻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的沂南县刘玉梅，把自己的家变成党的活动中心的沂南县王自生。她们都是把自身连同家庭，一起交给了党的革命事业。

（二）基层组织

根据地中，沂蒙红嫂拥军支前的组织形式还包括县乡村社组织。《根据地志》记述，鲁南战役中临沂市推进社组织妇女昼夜加班，为前线战士织毛袜4万多双；赵钊县三区妇女一夜为前线蒸馒头1万多斤，五区妇女一天一夜为部队赶烙煎饼7.2万斤。上级分配4000公斤谷子加工煎饼，女村长李自兰带领妇女完成任务，97名妇女10昼夜做军鞋、军袜4000双。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1947年，有34名妇女当选为乡长，111名妇女当选为副乡长，985名妇女当选为乡委员。沂蒙妇女们依托基层组织，参与基层组织，并积极投身到更大的为革命事业奉献的组织中来。

（三）识字班

沂蒙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很多地方办起了以青年妇女为主体的识字组、识字班。《根据地志》中记述，1941年，山东省妇女救国总会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宣传大纲中发出号召，要求各地加强对妇女的文化教育工作，组织识字班、识字组，建立女子小学等。以农村姑娘为主体的识字组、识字班像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出来。她们的思想一经解放，便迸发出极大的学习热情。识字班不仅是一种学习组织，而且是开展抗战和根据地建设各项工作的政治组织，它把广大妇女吸引和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成为妇救会和党组织的得力助手，在拥军优属、动员参军、生产支前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抗战历史上看，没有任何一个学习或者组织形式能够像沂蒙识字班这样坚持年月之长、发挥作用之大、产生影响之深，尤其是对广大妇女的教育引导，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沂蒙模式。

这些接受了革命真理，提高了觉悟的劳动妇女，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伟大的革命战争中，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正如朱瑞所言：“这种新女性的觉醒，力量的伟大，奔腾，真的有如暴风，可以旋转世界，可以改造乾坤。”

（四）妇女救国联合会

各级妇女救国联合会，是沂蒙红嫂拥军支前更高形式的组织形式。《根据地志》卷三“抗日根据地（上）群众团体”一章中记述，1940年7月至8月山东省“联合大会”召开后，从省级到县、区、乡，妇女救国联合会基本上全部建立。它们在动员民众开展对敌斗争、参军支前、生产运动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各级妇女救国会积极组织动员参军工作，组织做好支前后援工作，组织广大妇女参加减租减息、反奸诉苦、土地改革等运动。据《根据地志》记述，1947年1月，临沂市朱陈区劳模店村男人大都外出支前，妇女则在家搞土改，4天丈量土地250亩，菜园18亩；

临沭县大蔡庄妇女不但将村中的7万余元合理分配给贫苦农民，而且从地主手里要回了地契，当众焚毁。

三、沂蒙红嫂拥军支前的主要活动

沂蒙革命根据地中沂蒙红嫂的身影活跃在拥军支前的各条战线，她们的拥军参战活动总结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动员参军。《根据地志》记述，各村妇救会专门成立动员参军委员会，广大青年妇女提出“宁为抗日阵亡将士遗妇，不做怕死懦夫娇妻”“宁为死难者孤女，不做活汉奸的掌上明珠”等口号。1944年春节期间动员参军时，莒南县洙边村团支部委员梁怀玉在动参大会上，响亮地提出“谁第一个报名参军我就嫁给谁”。二是支援前线。由于大批青壮年参军上前线，支援部队的后勤工作大部分由妇女完成。1942年甲子山战役中，莒南县曹家庄子妇救会长张秀菊带领全村妇女支援前线，送去煎饼千余斤和军鞋、花生、鸡蛋等慰问八路军。三是救护伤病员。《根据地志》中记述，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沂蒙根据地有42466名妇女参加救护八路军伤病员，所救护者有19776人；有155065名妇女以不同方式掩护94394名革命军人和抗日工作人员。四是参加生产运动。各级妇女救国联合会组织广大妇女成立纺织小组，开展生产竞赛。1942年，仅滨海区就有10万名妇女走上生产第一线，植树7307万棵，替军属代耕土地3010亩，开荒3000余亩，掘井31眼。1945年，蒙阴、莒南、临沭、沂南等八个县就评出妇女劳动模范、女英雄218名。

四、沂蒙红嫂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

追寻沂蒙妇女一路穿越战争硝烟的成长轨迹，我们便不难看出红嫂们身份角色的转换和“红嫂精神”的形成历程。沂蒙红嫂精神是沂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山东党政军与沂蒙人民共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典范。

首先，党的群众路线是铸就沂蒙红嫂精神的基石。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开始，就实行了拥军爱民这项重要政策。《根据地志》记述，1943年春，滨海军区部队开展了拥政爱民突击月活动，两个月内，部队为群众挖粪、拉犁、推磨、干农活。帮群众干活时，指战员们自带干粮，不要任何报酬。正是由于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把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给沂蒙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从而激发了他们对党、对人民军队的真诚热爱和誓死捍卫。所以，党的群众路线唤醒了沂蒙人民的政治觉悟，更感染了沂蒙妇女们的奉献情怀，引导了她们公而忘私的价值取向。

其次，沂蒙红嫂精神是践行群众路线的精神食粮，是当前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现实教材。沂蒙红嫂精神既有鲜明的区域性和历史性，又有滋润养育中华民族的普适性和时代性，不能被当作宝贵的历史文物封存起来。我们应当深入挖掘，汲取精神涵养，武装党员干部，为党的发展、巩固以及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提供经验和范例。如果说，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自上而下的，那么，沂蒙红嫂精神可以说是自下而上的，这种上下互动才助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应该首先自上而下主动、推动、带动、引领这种互动，并且从自身做起，真正切实践行群众路线。

药学校佼的个中三昧

——研读鲍玉琳

刘凤才

杏林两枝花，医、药本一家。医者“妙手回春”，离不开药者“药到病除”。中国药学源远流长，从神农尝百草，到东璧著《纲目》，上下五千年，代有药圣出。时至今日，药学中西合璧，共造人类福祉。而药学的真谛，就是只有孜孜以求、并真正领悟把握了万花筒般药学世界中的“个中三昧”即其诀窍或精义，才能真正成为一名有成就的优秀药师。鲍玉琳，正是沂蒙药学界的一位佼佼者。

鲍玉琳是临沂市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主任药师，市药学会副秘书长，市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市医学会临床药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彰显其专业水平与成就的职务更是不一而足、不胜枚举，如中国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药理学会药物基因组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药学会十届理事会理事、山东省药学会、山东省药理学会等下设6个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她还先后被中国药学会授予全国优秀药师，被临沂市委市政府授予“跨世纪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荣誉称号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深刻认识与掌握了从事药学的“个中三昧”——丰富学识、良好医德、敬业精神。而她又用这“个中三昧”，在



市人民医院立起了一座里程碑，铸成了一片金奖牌，在药学部搭起了一座药患真情桥，建设了一个团结和谐的大家庭。

“国字号”铸起的里程碑

从事药学30年，鲍玉琳获得过数不清的褒奖与荣誉。她是一个对个人荣誉十分看淡的人，然而对为院集体获得的一面“国字号”牌子，她却格外珍重，充满了自豪与欣然。

这个“国字号”，是2011年10月，临沂市人民医院被评定批准为“卫生部临床药师培训基地”。这是国家最高档次的药师培训资质，是对市人民医院药学部水平与实力的最高认可与肯定。市人民医院一位领导说：“这是全院首次获此殊荣，是本院历史上最大的一块牌子，是里程碑式的！”

鲍玉琳所以十分珍重这个“国字号”，是因为它凝聚了她30年的心血与汗水，辛勤与努力。

她生长在一个充满浓厚杏林氛围的家庭。妈妈是当时临沂地区人民医院的临床医生；姐姐从事护理工作。1974年底，17岁的鲍玉琳“上山下乡”，到莒南县涝坡人民公社当了下乡知青。1976年，她参加招工，被分配到莒南县人民医院壮岗分院药房工作，开始了药学历程。1978年，在母亲的敦促下，她用功备考，被山东医学院录取。而学习药学专业，则受到了母亲的很大影响。母亲做了一辈子临床医生，深知临床的风险。她疼爱玉琳，让她选择了当时看来风险相对较小药学专业。

1982年7月，鲍玉琳大学毕业。作为当年全临沂地区唯一的一名药学本科生，她被分配到地区人民医院药剂科工作。从此，她从一名普通的药师，一步一个扎实脚印，一步一个进步台阶，在专业道路上，不断成长，日臻成熟，一直到晋升为主任药师，先后担任药剂科、药学部主任。在专业上，她锐意进取，多有突破，多有建树。共获得省市级科研成果8项。

这些年来，她先后在省和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主编、参编药学专著6部，在国家和省市级学术会议及各种培训班上讲课40余次；先后被多家国家和省市级药学机构、期刊聘为成员、编委等等。2008年，在中国药学会年会上，她获得“全国优秀药师奖”，全省只有两位药师获此殊荣。

2010年，她直接把目光盯向了争创“卫生部临床药师培训基地”。这是一个国家级项目，在药师培训上具有国内最高权威性，当然要求特别严，门槛特别高，不用说一个地级市医院，就是省级医院，没有雄厚实力与相当水平，要获此殊荣，都只能是望尘莫及。前两批参与评定与被批准的都是省部级及各大学附属医院，这次是第三批。对自己的实力与水平早已心中有数、充满自信的鲍玉琳，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为市人民医院夺得这个“国字号”。

2012年3月，以扎实的材料在上海市参与了申报；7月，在哈尔滨市参加了全国答辩。最后，在热烈掌声和一致首肯中，临沂市的答辩获得了全票通过。此次评选，全国有3家以“地级市”名义获得批准的医院，除去青岛、大连外，货真价实的地级市医院，只有临沂市人民医院。

获得这个“国字号”，鲍玉琳对药学事业的追求更加增强了信心与自信：只要坚持不懈，付出常人不能付出的努力，一切不可能皆可以变成可能！

把“两关”铸就的金奖牌

在药学部琳琅满目的奖牌中，还有鲍玉琳特别珍视的另一块“金牌”，是2011年4月中

国医院协会颁发给临沂市人民医院的“第二届全国医院药事管理优秀奖”。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充分证明临沂市人民医院可以保证公民用药的“安全、有效、经济、合理、方便、及时”。在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人们最关注的“救命药、实惠药、放心药”问题上，临沂市人民医院做得不但过关，而且优秀；不但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而且能够实行严格有效的职业道德等自律性管理。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是政府管理机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对医院的褒奖与肯定。这块金牌，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努力与成果：专业水平，内部管理，行业风气，职业道德。获得这块金牌，鲍玉琳又有自己的“个中三昧”，就是严把“两关”：

一方面，严把出药关。面对让人眼花缭乱、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的千万种中西药品，药师不但要负责拿药，还要知药、懂药、辨药；面对分化越来越细的数十个专业医生的处方，药师不仅要出药无误，还要核处方、审用药、合理荐药；面对安全、有效、经济的治疗新需要，药师也不仅只是守在药房坐等上门，还要走向各科临床一线，与医生紧密配合，共同负责用药。无论是哪个环节与方面在用药上出现了失误或问题，药师都脱不了干系，成了承担“终极责任”者之一。

鲍玉琳清晰得记得，十几年前的一天，一位药师不慎给患者发错了药，虽然没有导致人命且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是仍然惹出了大乱子。数十名情绪激烈的患者亲友将其包围，将鲍玉琳团团围在其中不依不饶，事态最后虽然得以平息，但是更让鲍玉琳清醒地看到了药剂工作的风险与责任。

鲍玉琳没有退缩与躲避。她知难而上，挺身迎险，反复教育大家明白“抗风险先得自身硬”的道理，给全科提出了“熟悉专业无极限，强化责任最大化，工作之中零差错”的目标，采取了种种有效措施。她在部里建立了“差错事故通报制度”；为了大家便于接受，推动改进，又改为“差错事故学习制度”，用自己的案例教育自己，让大家通过学习，来认知差错，改进工作……在她的带领和全部同志的努力下，药学部的工作质量不断提升，日臻完善。有一次，上海市药学会组织全上海各大医院的30多名药学部主任来临沂市人民医院参观，负责人感叹地说：我们还要上哪里学？这里就是模式，就是标准！

为了实现用药不但安全，而且有效、及时、经济等目标，达到“合理用药、药到病除”的最高境界，鲍玉琳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引进国际国内先进的临床药师制模式，在许多专业科室逐步推行“医、药、护”互补的治疗团队，在部里工作量本来就很大的情况下，选调学历最高、业务最棒的药师经过规范化培训后派到各相关专业科室，担负起配合临床医生合理用药的职责，在临床药学专业上，走上了提前与国际接轨的路子。2008年，市院被确定为山东省临床药师制的试点单位。2009年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临床药师工作经验总结会，会上，鲍玉琳代表市院作了典型发言，详细介绍了本院临床药师团队的培养和管理以及实行药师会商制的做法，得到了卫生部有关领导和与会专家的一致肯定和好评。

另一方面，严把入药关。一是价格关。有一次，一位药商向鲍玉琳推介一种药品，标价100元，如果要每盒便宜两元，似乎是一种很大的优惠。对各种药品如数家珍、烂熟于心的鲍玉琳拿过药品一看，毫不客气地说：“你这药，别说每盒优惠两元，就是再折70元，也还贵了，最多值10元。”药商十分尴尬，悄声对同伙说，“倒霉，这回撞到茬上了。”二是质量关。让儿童吃药是一件难事，所以各生产厂家都千方百计地将儿科口服药品做成便于其接受的不同剂型与香型。目前国际上公认儿童们最易接受的是草莓香型的药剂。为了掌握儿童各种用药的口感，每一次引进儿科口服液体制剂，鲍玉琳都要亲自尝一下味道，并要求大家也这样做。有一次，一位药商来推销儿童用“布洛芬混悬液”，鲍玉琳问：“是草莓味的吗？”对方信誓旦旦地答是。没想到鲍玉琳立即打开一瓶倒进了嘴里，一搭口，一股异常的辣味直卡嗓子，鲍玉琳十分生气地质问：“这哪是草莓味？连大人都

难以下咽，孩子怎么吃？”药商面红耳赤，掩面而去。三是购药关。作为医院药学总负责人，鲍玉琳承担着终极责任和压力。她相信具体负责药品采购的同事们，但也决不放弃法律和职责赋予的监督责任。有几次，她甚至当起了“业余侦探”，悄悄地跟踪了解商家与部里的商洽活动，最终才得以放心。回过头来，她又光明磊落地跟同事们讲了此事。同事们说：不要说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良心，就是为了对得起你鲍主任的信任，我们怎么能做幕后交易呢？

“几个一”构建的药患情

她坚持把医德教育与培养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她并不对大家“起高腔”、提什么“高标准”，她说：“老百姓看病治病太不容易，不要埋怨他们闹事，这说明我们还是有事可闹。我们天天讲视病人如亲人，我看不用说当亲人了，人人能做到视患者如熟人就行了。”因此，她从小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即有大举措，也在点滴细节上下工夫，可谓用心良苦，成效显著。仅例举她在药学部践行的“几个一”，就能足见一斑：

“一站式服务”。2002年，鲍玉琳随团到新加坡各大医院进行参观学习。在新加坡樟宜医院的门诊药房，她看到病人手持处方在窗口审方、调配、复核、计价、收费、发药一个地方完成，病人无须分头、多次排队，实行的是“一站式服务”模式，这让鲍玉琳大开眼界，大受启迪。

回国后，她力倡力推在本院实行“中西药一站式服务”，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当然，这对自己和本部的同事们，无疑需要增加一倍的知识储备与工作量，需要增加一倍的责任与压力：一个药师既要懂西药、又要知中药，一张方子既要拿中药又要取西药。她教育引导同志们：只有我们多付出、患者才能少付出，我们费心费力、病人才能省心省力，医生工作起来才更方便。我们天天说一切为病人着想，一切为临床服务，这不正是我们必须做的吗？在调动起大家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后，鲍玉琳给每个人配备了相关的中西药理、药物学专业书籍与手册等，要求大家每天早晨至少拿出半小时看书识药。功夫不负有心人，时间不长，每个中西药学人员都终于成了多面手，适应了工作需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后，2003年底，“一站式服务”在全院推开，立即得到了广大患者和各专业临床科室的一片赞扬，当年获医院党委颁发的“最佳医技科室奖”，并奖励全科员工出去学习旅游。大家群情激奋尝到了改革的甜头。直到几年后的2007年，在上级部门的认可下，此模式才在全国各级医院逐步实行。

“每天上班第一件事”。药品价格事关亿万百姓，上级、舆论、社会监督像一只只紧盯着各药品部门的眼睛，执行稍有疏忽或不利，责问追究立即四起。国家对药品价格的调整特别是下调已经进行了20多次，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出新规定。作为临沂医院药事管理的最大单位，市院药学部自然首当其冲。鲍玉琳清晰地记得，1994年有一次药价调整，为了在规定时限完成任务，全科员工齐上阵，紧锣密鼓、加班加点，把千余种药品翻了个底朝天进行重新价格核准，结果时限一到，还是发现有一种药品价格被遗漏了。她刚推开办公室门，新闻媒体的摄像机就对准了她，请她作出解释。此事让她深深感到了责任的重大。以后，她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打开电脑，认真查询今天是否有国家关于药品调价的新规定及查处假冒伪劣药品的相关文件出台。此后若干年多少次，药学部再也没有出现需要“作出解释”的事情发生，而是得到了上下一致好评。

“一层门诊一个药房”。今天的市人民医院早已今非昔比，规模数十倍增长，门诊、病房高楼林立。看病、取药的衔接与便捷，成为广大患者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为了方便患者，在医院领导支持下，医院坚持各科门诊、病房、药房同步规划、建设、设置的路子，实现了对患者的同步服务。医患双方，无不叫好。

“养成一个姿势，办成一个问询处”。医院有两个最醒目、最直接的窗口，一是挂号，二是药房。虽然都不直接为患者看病治病，但往往是给患者留下最重要的第一印象、体验最深刻的第一感受的地方。为了让广大患者在自己的窗口得到最好的服务，鲍玉琳除了给大家提出“零差错”的硬指标，还给大家规定了“两个一双”的“亲情温馨态”，就是必须面带真情微笑，双目注视患者，双手接过处方。从形式上看起来这只是一种姿势，但却能让患者感受到药患平等，亲如家人，更体现了一种尊重与温暖。鲍玉琳还要求大家：“要把药房办成一个问事处，每个人都要成为熟悉医院基本情况、大小地方的百事通、问不住，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正是在她的严格要求下，大家养成了这样一种姿势，成了医院的“百事通”，广大患者在取药或问询离去的时候，都情不自禁地转身向药房及药师们留下“蓦然回首的深情一瞥”。

“学会说一句委婉的话语。”有一次，一位患者把孩子放在药房取药的台面上等着取药，结果孩子一泡尿把窗台淹了个满台湿。等候取药的人很多，药师急着打扫卫生又急着为病人拿药，不由大声地埋怨起孩子的家长：“这里是放孩子的地方吗？”结果吓得孩子哇哇大哭起来，孩子的家长一看吓到了孩子，也由起初的歉意转为了愠怒，现场不亦乐乎。鲍玉琳闻知此事，立即教育药师：“就是患者的差池，你说话也不应当这么直接嘛！如果你把话改成‘同志，孩子放在这里有危险，请您注意孩子安全’，结果不是截然不同吗？”药师十分信服地点头称是。从此，对患者要学会说一句委婉的话语，成了药学部员工的一门功课。

“发一张药患联系卡”。在药学部的各窗口，都放置着一沓精致的小卡片，上面醒目地印写着“临沂市人民医院药患联系卡”，清晰、详细地标明了取药窗口、药物咨询、服务监督等联系电话，并附有亲切的感谢与祝福词语。患者无论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建议，都可以立即通过这张卡片，与相关方面取得沟通，得到及时的回答。这也是鲍玉琳在为患者服务上的一个细节设计。就是这张小小的卡片，在密切药患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药学部与广大患者中间架起了一座真情的桥梁。

“为问路患者耐心指一次道”。这来自她的切身感受。有一次，一位患者向她问中医科张志发主任在哪里门诊，她做了认真指点，但是患者可能不识字，可能出于着急紧张，就是听不明白。要不是手头有急事处理，鲍玉琳就亲自把他送过去了。无奈脱不开身，只得耐心地再三给他指点，患者终于似明若暗地走了。鲍玉琳有点后悔，正在挂念时，她接到了张志发主任的电话，说患者找到他了，并请代为向她表示感谢。

“让患者用一次手机”。这条要求，也来自于鲍玉琳的一次切身经历与体验。有一次，一位患者亲属从鲍玉琳身边急匆匆路过，突然十分难为情地向她央求：“大夫，能用一下您的手机吗？我的家人得了急病，急等联系事，可是俺没有手机也实在没找到电话……”看到他的模样，听着他的央求，鲍玉琳心中一震，一股油然的同情感猛烈地撞击着心头，她二话没说，立即掏出你的手机递到了他手中，并安慰他尽管打电话，把事联系好。那位患者亲属用完电话后，对鲍玉琳感激不尽，再三致谢。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更让鲍玉琳知道了人在急需帮助时的心情与难为，何况是患者及亲属呢？她把自己的体验讲给全部同事们听，并请大家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伸出帮助之手，全部同志为之动容。

鲍玉琳对自己和同事们提出这种“一”的要求不胜枚举。正是这一点一滴的“一”，象一粒粒金沙，最后铸成了最为社会称道的医德金牌。

“五台”构建的大家庭

鲍玉琳在医院药剂岗位上30年，自1993年先后担任药剂科、药学部主任。光阴冉冉，

木已成林。在院领导支持和她的具体领导下，药学专业迅速发展，药学部规模日益扩大，目前已成为全院人员最多的科室，共有员工160多人，21个下属单位。总结多少年带领团队的经验，她的“个中三昧”就是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团结，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员工，像维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领导与集体，并用真心诚意、殚精竭虑，为大家提供、打造、维护了“五个台”：

为班子成员提供工作舞台——药学部的团队核心，既有老同志，也有年轻人，性格上各有特点，能力上各有优势与弱项。鲍玉琳这个多年的主要负责人，年龄处于中间，又要总揽全局。她给自己的定位是：不当“只我一家、别无分店”的武大郎，而是要当好一个队长兼教练，紧紧依靠一班人，充分调动集体力量，对每一个同事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老虎一座山，给猴子一棵树。给他们提供适合自己长处、干好工作的舞台。而当他们遇到困难、出点问题时，她这个队长兼教练则主动站出来，解难题，扛责任。同时，她要求班子成员严于律己，作出表率，要求员工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要求员工不做的自己首先坚决不做。她说，“我们做错一次，就得允许员工错十次甚至百次，在这方面不是数字对等的关系。不仅如此，我们还得正确对待批评，错了就得先批评自己，就像孩子们打仗，明智的家长总是先批评自己的孩子一样”。她常对班子成员和同事们讲：“一个团队就象一家人。负责人与助手间就像夫妻关系，‘主内主外’既要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又要相互配合相互体谅，都是为了把这个家庭带好管好；相互间说话不必拐弯抹角，做事不必左顾右盼，有不同意见相互间可以拌嘴争论，只要能把这个家带好管好，拌嘴争吵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同事间应当是兄弟姐妹关系，要齐心协力，为全家操心出力。”从上任伊始，多年来，她对大家反复要求的就是两个字：“团结，家和才能万事兴，团结才能事业成。”2009年初，部里新提拔了两位年青副主任，鲍玉琳说要和他们谈谈心。两个副主任拿着笔记本，毕恭毕敬地准备记录主任的教诲与指示，但是鲍玉琳却把他们请进了一个静谧雅致的小茶馆，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时间，和他们聊的全是“团结”二字，使他们倍受教益。在鲍玉琳的带领下，药学部被评为院里的和谐科室。多年来，药学部向院里输送了数名中层干部，被大家戏称为“中层干部培训基地”，有的科室更是主动找上门来，请鲍玉琳提供人才支持。他们说，“药学部出来的人，不闹矛盾，不会在班子内打仗。”院长对鲍玉琳说：你这个药学部主任，可以当个很好的组织部长嘛！

为年轻后俊搭建进步平台——鲍玉琳常常对大家说，“我别没什么大本事，就一付肩膀，只要大家有志于药学事业，对大家成长有利，大家可以任意踩，我心甘情愿。”为了大家特别是年轻有为的药师们的学习进步，她多次向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争取出国培训名额；并利用多年与卫生部药事管理研究所建立的良好关系，为年轻药师搭建平台。当然，她有自己的标准与要求：走出去的药师们，回来后必须取到“真经”，先给同事们讲一课，检验一下学习成果。如果出而无获，学而无果，讲不出个道道，不但不给报销外出学习经费，而且下次的学习机会也要先考虑其他人。

对广大员工因势利导引上高台——鲍玉琳认为，一个员工关心自己正当合法的报酬，是天经地义之事。如果一个员工连自己的切身利益都不关切，那他还能关心什么？怎么能用心做好工作，追求上进？同时也要让大家明白，报酬需要付出，多劳才能多得，干好才能得多。在她的正确引导下，全部同志把心思与精力都用在了多干工作、干好工作上，形成了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部里的整体工作也不断获得新成绩、新进展。

为激情青年提供思想讲台——随着药学部事业的发展，青年人越来越多。他们充满朝气，思想活跃，精力旺盛，爱唱爱跳，8小时工作外总得有个发挥甚至渲泻的地方，有的青年员工喜欢上了网上游戏、卡拉OK等娱乐。她细心地琢磨“8小时外管理”，在部里建立了一个业余“读书会”，并购置了简单的音响设备，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说是读书会，内容却百花齐放，形式百家争鸣，大家人人是学员，又可以人人当老师，每个人对人

生、事业、专业、爱情、家庭、社会等等有什么看法感受，甚至心中有什么郁闷与纠结，都可以走上讲台，尽情演说发挥。可以讲，也可以唱，可以清唱，也可以卡拉OK。鲍玉琳一边与大家同讲同乐，一边潜心地倾听着青年们的心声与呼唤，不断地加以引导、改进和提高。就是这个读书会，使广大青年心情舒畅，使药学部成为了一个“没有报怨的世界”。

在个人利益面前退到后台——让药学部员工最折服的一点，就是鲍主任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风格。鲍玉琳总说，工作是大家干的，成绩与荣誉是属于大家的。多年来，只要是科室说了算的荣誉，不论大家如何心悦诚服地推举她，她从不应允。上级评选的先进、优秀，她也动员班子成员们，更多地让给大家。市里评选的“ADR（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先进个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奖项，从2006年起至今连续6年，鲍玉琳没参评一次，而是让给了同志们。在荣誉面前如此，在物质利益面前鲍玉琳同样如此。有一次，科里的奖金发放表上报到财务科，财务科的同志一看，鲍玉琳的奖金数额比有些员工还少，大为诧异，以为药学部报错了，找到负责发放奖金的张庆民副主任核实。张主任说：不错，我们部从未规定过主任的奖金应当是最高的。

多年来，在药学部有一种十分温馨亲切的氛围：在工作场合，员工们都尊敬地称呼鲍玉琳“主任”，而在非正式场合，人们都亲切地叫她“大姐”。尊一声主任，同振事业；叫一声“大姐”，亲如家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有个好主任很幸运，有个好大姐很幸福！

能够用自己的真诚与心血，构建这样一个和谐融洽的大家庭，鲍玉琳也深有感慨：“作为主任，我在工作上什么时候都有压力；但是作为大姐，我从来没有烦恼。我每天都快乐地面对工作，享受工作带来的快乐！”

这已经不是药学的“个中三昧”，已经达到了人生“个中三昧”的高境界。

人生如山，为梦而登

高雪萍

陈州，兰陵县人，著名励志演讲家、残疾歌手。他的故事曾多次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朝闻天下》、《开门大吉》、《开讲啦》及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等节目中播出，引起巨大反响。

陈州命运多舛，1983年出生，6岁父母离异，8岁流浪四方，13岁从火车上摔下失去双腿，18岁学会唱歌，他以木盒为腿，从四处乞讨到流浪卖唱，他用歌声行走中国，走过全国700多个城市，娶妻生子，过上幸福小康生活，从无腿乞丐成长为励志演讲家。

他的童年较同龄人相比极其不幸，刚满5岁时，父母就因感情不合而分



居，6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失去了父爱母爱，陈州的童年是不幸的，1991年，年仅8岁的他被法院判给了爸爸，没多久，爸爸把他托付给了50多岁的爷爷后，远离家门。由于爷爷、奶奶经济困难，陈州从小就没上过学，11岁时，就靠着爷爷教的一点快板和家乡戏开始外出“闯天下”了，佳木斯、北京、沈阳等地到处留下了他那幼小的足迹。1996年，陈州流浪到潍坊市昌乐县爬乘一辆火车时，不小心摔了下来被碾断了腿，等他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医院里，被高度截肢，从臀部往下仅保留了10厘米。一年后，在家备感孤单的陈州趁爷爷不备，用一块厚厚的轮胎皮绑在屁股下面，用两手撑地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再次离开了家门。之后，他在街头要过饭、给人擦过皮鞋、卖过报纸、修过电视……流浪的日子里，下雪的时候，陈州钻到垃圾堆里取暖；饿的时候，甚至和狗抢过骨头；被乞丐头头抓起来，三天一顿饭都不吃；被几个地痞流氓围起来要钱，被揍的鼻青脸肿，好几天爬不起来……

每一天过得心惊胆战，每一天都在为找寻下一顿饭努力。生活的艰难与沉重，让陈州幼小的心灵几次闪过自杀的念头。经过一段时间的迷茫，陈州最终选择了坚强面对。虽然没有了双腿，但他有健全的意志和心理，他决心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养活自己。

后来，流落到浙江嘉兴的陈州，遇到了一个街头卖唱的无腿残疾人，陈州在参加的演艺节目中提到：“就是这个朋友，教会了我唱歌，后来，我就用美妙的歌声引来了身边美丽的凤凰。”

1997年，在浙江嘉兴街头，陈州遇到了一个在街头卖艺的残疾人。两人相视一笑，陈州被邀请到“舞台”中央，为观众献歌一曲。陈州动听的歌声打动了观众，也打动了那位残疾艺人，两人最终成为合作伙伴。大约1年后，陈州开始了独自一个人在街头卖唱的生活。

陈州动听的歌声和自强不息的身世打动了许许多多的听众。在广东，为了激励工人，许多企业邀请陈州到外来务工人员中开个人演唱会。而他年轻貌美的妻子，就是在江西九江街头唱歌时认识的，当时的她是他最忠实的听众。

2002年7月，陈州流浪到江西九江，那时候，陈州在九江一个叫烟水亭的地方唱歌，几首歌之后，人群中，陈州在他的右前方发现了一个女孩，因为她的掌声是整个人群中最响亮的。连续三天，她都出现在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掌声。后来，他们顺其自然，从相遇相知到相恋。从相遇的那一刻起，九江一连下了28天的雨，28天的梅雨造就了陈州一生的幸福。在恋爱期间，陈州心里有过自卑，家长有过反对，但重重阻碍没有吓到他们，他们风雨中相依，还生下了一对漂亮的儿女。

听众的支持和妻子的爱，给了陈州更大的力量。他说：“我现在一方面要靠唱歌养家糊口，另一方面也要在唱功上慢慢磨练，因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能有参加全国歌手大赛的机会，我一定会争取，即使失败了也不怕。”

而今，陈州已先后游走过全国大部分省市。唱歌之余，他还以坚强的毅力先后攀登上山西的五台山、安徽的九华山、浙江的普陀山和福建的武夷山。没有双腿，他用坚强和自信支撑起自己人生的舞台，





用歌唱一步步实现着自己心中的梦想。他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我希望用我的歌声带给大家感动，用我的自信带给大家更大的自信。”

陈州说：“不要总在意自己的鞋子不够漂亮，世界上还有没有脚的人。”而陈州的鞋子就是他亲手制作的两个普通的木盒子，一个大一个小，一个重，一个轻，一个三斤半，一个四斤半，重的右手拿，这样保持行进中的平衡。这既是他平时走路时穿的鞋子，也是他强有力的双腿。陈州就是穿着这双“鞋子”走南闯北，到目前为止，街头演唱达3000多场。

2008年，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陈州在北京。无情的震灾深深刺痛了这位不屈的硬汉，怀着沉痛的心情，他当即即为灾区人民捐献了500元善款。捐款后，陈州依然无法平静自己，思来想去，他决定录制一段视频，专门为灾区人民唱一首歌，鼓舞大家挺起胸膛，重建美好家园。陈州选择了郑智化的《水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在简陋的弄堂里录制好了这段视频。视频中，陈州举起一张纸，上面写着“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随后，他用低沉的话语说：“四川遭灾了，我想帮他们。为什么？我在那儿要饭的时候，人家给过我饭吃。”接着，陈州浑厚的歌声响起。后来，陈州干脆开着自己的三轮车前往灾区，他在灾区唱歌为灾区人民带去力量。他说：“大地震震垮了我们的家园，但是震不垮我们的精神。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汶川一定会以崭新的面貌，重新站立在我们面前。”他骑着三轮车，行驶了8天8夜赶到地震灾区，为灾区义演37场，捐了自己仅有的35000元存款。

陈州多次依靠双手“登”上泰山，山西的五台山、安徽的九华山、浙江的普陀山、福建的武夷山……到处都留下了他坚强不屈的身影。他喜欢登山，喜欢“山高人为峰”的感觉。从18岁开始，他登上了全国90多座高山，光泰山就登了13次。正是靠着登山磨练出来的意志，陈州才有勇气去坚持自己的梦想。2010年他与妻子喻磊领结婚证的时候，陈州的经济困难，根本没有能力举办一场像样的婚礼，这件事一直让陈州难以释怀。于是，他开始梦想着凭借双臂登上五岳的顶峰，在五岳之巅给妻子一个独一无二的婚礼。从东岳泰山开始，陈州依次征服了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北岳恒山，8月12日完成了最后一站西岳华山，成为全球“双手登五岳”第一人。他在2012年8月23日（农历七夕）登上已攀登过11次的东岳泰山，用双手的力量“一步一步”爬上了泰山之巅，与妻子一起迎接新一天的到来。他和妻子在泰山之巅补办了婚礼，陈州完成了自己对妻子爱的诺言。

别人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幸福？他总说，如果有一天，你能和老婆孩子拥吻在五岳之巅，你就能体会我的幸福。

一块空地，简单的音响设备，一个话筒，陈州却总能用自己的歌声让人驻足。没有音乐老师，爱唱歌就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华丽舞台，支撑身体的两个小木箱，就是最华丽的舞台；没有获奖经历，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收获。陈州的人生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人生就像爬山，一开始很有激情和冲劲，慢慢地会感到疲惫想要放弃，但是只要坚持不放弃，就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 **人民网专题报道《沂蒙革命根据地志》出版发行。**8月25日，人民网以《〈沂蒙革命根据地志〉出版发行》为题，对《沂蒙革命根据地志》的出版发行进行了专题报道。

专题报道具体介绍了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位置及其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战略地位；高度赞扬了在沂蒙地区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党政军民为民族解放、革命胜利和新中国诞生做出的巨大贡献；详细阐释了《沂蒙革命根据地志》编纂的过程及志书的体例、记述时限、记事区域范围等；充分肯定了《沂蒙革命根据地志》出版发行对于更好地发扬革命传统，继承党的优良作风，弘扬沂蒙精神，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要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 **市史志办贯彻落实全省史志办主任座谈会议精神。**8月7日，临沂市史志办召开党组会和全体人员会议，传达贯彻全省史志办主任座谈会议精神。

在办党组会议上，市史志办主任、党组书记朱海涛传达了全省史志办主任座谈会议精神，研究制定了贯彻落实意见。一是认真按照全省史志工作电视会议和本次全省史志办主任座谈会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认真学习青岛市崂山区村村修志先进经验，做好我市村镇志书编修工作，选择合适时机，组织市、县区史志办相关人员到崂山区实地参观学习。二是针对上半年各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一步安排部署下半年工作任务，特别是在《临沂市志》、《临沂年鉴》编修、编纂等方面，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速度，党组成员要按照责任分工，靠上去抓落实，各科室要按照工作职责，量化分解工作任务，明确责任到人，确保工作任务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

好。

● **市史志办党组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8月18日，市史志办党组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市纪委监委驻二组书记、市委第18督导组组长王培栋同志和督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并代表市委督导组对会议作了点评。市史志办主任、党组书记朱海涛主持会议，史志办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办公室有关人员列席会议。会上，朱海涛代表办公室党组作对照检查，共查摆出“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13条；办公室各党组成员共查摆出问题53条，其中“四风”问题37条。

市纪委监委驻二组书记、市委第18督导组组长王培栋对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进行了点评。他指出，市史志办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实事求是、不走过场，气氛既紧张严肃又和谐宽松；问题聚焦准确、自我剖析深刻、整改措施实在，会议氛围团结和谐，是一次认真、严肃、务实、团结的会议，达到了预期效果。

朱海涛代表办公室党组表态：一是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二是要强化纪律约束力；三是要完善长效机制；巩固好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 **市史志办机关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进行民主评议党员。**8月29日，市史志办机关党支部召开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组织生活会。会上，支部全体党员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结合征求到的意见建议，对照“四风”突出表现，列出问题清单，深刻剖析问题，深挖思想根源，不避讳过失，不遮掩问题，不回避矛盾，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同时，根据理想信念、遵守纪律和立足本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廉洁自律等方

面的表现情况，对支部全体党员进行了民主测评。

● **临沭县启动村镇志编修。**9月16日、17日，临沭县史志办主任王敬涛带领工作人员分别赴曹庄镇朱村、白旄镇指导《朱村志》和《白旄镇志》编修工作，并带去样书和编纂资料。

在朱村与白旄镇，王敬涛分别就编修村、镇志的重要意义作了讲解，并介绍了志书编纂的方法步骤，建议曹庄镇与白旄镇尽快召开会议，成立志书编纂机构，确定编纂人员，制定编修方案与志书篇目，提前启动资料征集等有关工作，为志书编修打好基础。下一步县史志办将组织专家对《朱村志》和《白旄镇志》的编修工作进行跟踪指导和帮助。

《朱村志》和《白旄镇志》是临沭县编修的首部村志、镇志。

● **沂南县史志办积极指导基层修志工作。**7月23日，沂南县地方史志办公室领导带领业务骨干到界湖街道修志办进行业务指导，就街道志编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社区、村、修志编纂人员提出的相关意见建议，进行指导与解答。

● **《临沭年鉴2013》出版发行。**9月1日，临沭县第七部综合性地方年鉴《临沭年鉴2013》出版发行。

《临沭年鉴2013》共70万字，设大事记、概况、党务、政务、军事、群众团体、政法等24个部类，系统、全面、真实地记载了2012年临沭县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等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重要成就。